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9.月號 總64期

No. 64 Sep. 1988

• 有形之手 回天無力

趙紫陽淚揮中南海

內情  
追記

上海學生大示威

• 胡平 與 朱高正

對談 民主運動

蔚為大觀的 中飽私囊術

中央情報局關於中國的研究報告 (中)

# 老鄧

# 不如小戈

· 肖曉 ·



戈爾巴喬夫寫信邀請索爾仁尼琴回國，包括「古拉格羣島」在內的索爾仁尼琴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即將在蘇聯公開出版。這兩條消息都非同小可。

中國人對這兩條消息格外注意。誰都知道，在蘇聯的一大批持不同政見者中間，索爾仁尼琴一向被歸為最「右」的一個，他的「古拉格羣島」無疑是本世紀批判共產主義暴政最力的一部經典之作。這樣的人能請回國，這樣的書能夠與蘇聯人民公開見面，戈爾巴喬夫此舉，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

當然，這也是大勢所趨。俗話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共產主義思潮一度是最有力的思潮，共產主義運動一度是最強大的運動。只是時至今日，它顯然已在走下坡路了。二十世紀的歷史曾經走過了一段大彎路，這段彎路給人類帶來了多少苦難，真是不堪回首！聊堪慶幸的是，我們終於開始轉回了正確的方向。在我們的前面，困難、反復想來還是有的，但這個大趨勢，恐怕是瞎子也不會看不見的了。

談到中國目下的改革，自去年年初反自由化以來，形勢一直未有根本好轉。方勵之的講演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至今尚禁止在國內發行；楊巍被無端判處兩年徒刑；中國民聯被打成反動組織；胡平被吊銷護照并禁止回國；中國之春成員被選為一個區區的大學留學生聯誼會負責人而招致中國官方的橫加干涉。這一系列倒行逆施，縱使是蘇秦、張儀復生，也無法對之辯護。

戈爾巴喬夫邀請 索爾仁尼琴回國

## 「古拉格羣島」

## 得在蘇公開發行

【美聯社西德波昂十五日電】設在莫尼黑的巴伐利亞電台十五日報導，於十四年以前被放逐的蘇俄反政府作家索忍尼辛，已接受蘇俄領導人戈巴契夫的邀請，願意返國看一看。

該電台並且說，索忍尼辛寫的所有的書，包括「古拉格羣島」及其續集，均將在蘇俄出版。

該電台說，索忍尼辛計劃於今年十一月或十二月返回蘇俄，在國內停留一個月，而且在那時簽一份合同，同意在蘇俄出版他寫的書。

該電台說，索忍尼辛願意返國的消息，是由該電台駐紐約記者傳來。

索忍尼辛尚未對此報導置評，目前他與其妻娜托雅住在美國佛蒙特州。

該電台駐紐約記者在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說，索忍尼辛的妻子本週稍早告訴他，戈巴契夫曾寫了兩封信給索忍尼辛。

在過去的一年中，鄧小平幹得不如蔣經國；在新的一年裡，鄧小平幹得又不如戈爾巴喬夫。以鄧小平八十多高齡、三起二落的經歷，竟然一誤再誤。今後寫歷史的人，又怎麼能不對他搖頭嘆氣呢？

# 「顧全大局」質疑

## 再論中共必須作出民主的承諾

· 觀察家 ·

路邊

中國大陸是個特權社會，而最大的特權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爲了維護這個特權，共產黨有種種說法。最初的說法是：共產黨是最先進、最偉大、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和社會發展趨勢的先鋒隊，所以，中國非由共產黨領導而不能進步。並且，共產黨的勝利也說明歷史作了這一選擇。可是近四十年來，共產黨劣迹昭彰，威信如江河日下，最後連它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唱「偉大、光榮、正確」的調子了。於是它又換了一種說法：「如果沒有共產黨，中

國目前不可能再有第二種政治力量能擔負起領導中國改革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這種說法至少比原來謙虛了一點，從天命退到了現實，從非我不可的霸道氣概，退到了「無可替代」的無奈（無賴？）地步。可是，這種說法也越來越無法自圓。如果共產黨不是拚盡全力地壓制黨外力量，誰敢說中國不會出現第二種、第三種、乃至第N種堪與共產黨相匹敵或者勝過共產黨的政治力量？再說，在台灣恰恰就存在一支現成的能替代中共的政治力量。萬一國民黨將它一軍，共產黨何言以對？

最近，面對日益增強的對其領導權的挑戰，中共越來越多地唱起「顧全大局」的調子。工人對物價上漲不滿而怠工，中國領導人說：要顧全大局；學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他們也說要顧全大局。言下之意似乎是，生活的惡化和政治上的控制都是改革過程中的暫時現象；是中共帶領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民主」過程中的必要一環。所以希望人民群眾體諒黨的苦衷，不要破壞黨的戰略佈署，要和黨「同心同德」共渡難關。

從心底裡說，我們非常願意相信以上說法，也非常願意顧全大局。但是問題是，中國人民到目前為止還不知道大局的結局如何，共產黨沒有作出任何明確的承諾，那麼他們「顧全」什麼呢？

中國人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顧全大局」的人民。在一九五九—六二年，在餓死兩千萬人的困境中他們都沒有給執政黨以任何難堪。他們這次會問，我們顧全了大局，那麼後果如何呢？換句話說就是顧全大局後能得到什麼？

顯然，要想讓中國人民再一次顧全大局，

中共必須向人民作出明確的承諾。

首先，這個承諾應是具體的。過去中國人民也曾得到過很多承諾，如實現共產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中國式的民主，等等。但這些承諾都是虛無飄渺的口號，永遠是看得見，摸不着的水中月、鏡中花，也就是說，中國人民永遠都要「顧全大局」。這種承諾明擺着是把人民耍着玩的，他們今天不能再上這個當。所以要使中國人民顧全大局，中共必須作出具體的、有期限的、可以衡量的承諾。例如，什麼時候能夠將通貨膨脹率降低至百分之二以下；多少時間基本完成市場轉軌的改革；什麼時候可以開放勞動力市場；什麼時候可以開報禁、黨禁，等等。

其次，其承諾必須要有未履行諾言的責任承擔內容。中共過去也曾許過很多很具體的諾言，如三年趕上英國；本世紀末人均一千元元的收入等。可是這些諾言常常實現不了，結果不了了之。這樣一來，中國人民不是又白白顧全大局了嗎？人們在顧全大局時要犧牲或壓抑很多他們應有的權利和利益，若中共的許諾如此兒戲，不等於又把人民耍着玩嗎？在西方國家，一個執政黨若不能基本實現自己的承諾就要下台。因此，共產黨也要爲它的承諾作一個承諾，若實現不了它的承諾，要麼讓出執政權，要麼補償人民在「顧全大局」時期的損失。

最近，欣聞趙紫陽贊成開放黨禁。趙總書記有此氣量確實值得青史留名。（別說「中國之春」總爲了批評共產黨而批評共產黨，共產黨若做了好事我們照樣表揚。絕不搞雙重標準）。不過，中共若能就開放黨禁的意向在報刊上公開作一個具體的、有期限的承諾，我們中國民聯也願「顧全大局」。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孫中山先生墨跡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八年九月號總六十四期目錄 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 ● 觀察家

1 ■ 「顧全大局」質疑——再論中共必須作出民主的承諾 路邊

讀者·作者·編者

4 ■ 黃金與民主自決沒有關係

劉英等

## ● 國內快訊

6 ■ 上海學生大示威內情追記

劉錄

15 ■ 學運高潮迭起，中共圖窮匕見

摘自世界日報

16 ■ 趙紫陽淚揮中南海

黎音

17 ■ 中共總書記贊成開放黨禁

齊林

18 ■ 蔚為大觀的中飽私囊術

石磊

20 ■ 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李國愚

## ● 經濟問題

22 ■ 有形之手，無力回天

房志遠

## ● 海峽兩岸

26 ■ 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于大海

29 ■ 台灣民主政黨政治的發展

邱垂亮

## ● 民運策略

31 ■ 胡平與朱高正對談民主運動

孟雲傳依傑整理

38 ■ 我們相信民主嗎？——與朱高正商榷

胡平

42 ■ 民主運動與政治良心

錢達

## ● 思想論壇

44 ■ 清末自強運動及其對改革的啓示

田焜

50 ■ 政治專制不為經濟發展所需

包賽

52 ■ 一個值得澄清的情況

——簡介日本國會選舉情況

范柏

## ● 參考資料

自去年以來，海峽兩岸的政治形式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為中華民族走向民主帶來了一線曙光。然而海峽兩岸的民主派對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看法如何呢？我們從本刊刊登的大陸反對派代表胡平和台灣反對派代表朱高正的對談中，可以看出兩岸的反對派人士在民主的內涵和爭取民主的手段等方面的不同看法和意見分歧。兩種觀點的事非，我們留給讀者評論。

本期發表的劉錄的日記，是到目前為止對前年年底上海學生大示威現場實況的最詳細的近景記錄。作者在描寫他的見聞的同時還摻進了他個人的感受和心情，使人感到分外真實可信。

隨着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中共改革派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從本刊透露的兩篇內部報導「趙紫陽揮淚中南海」和「趙總書記有意開放黨禁」，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共上層人物的處境、心理狀態和今後的打算。

于大海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到目前為止大陸留學生第一篇公開系統地正面評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的文章。本刊發表此文是為了讓所有的大陸留學生從共產黨餘威的陰影中走出來，參加兩岸統一問題的討論。

李國愚的「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石磊的「蔚為大觀的中飽私囊術」是對當今大陸社會的真實寫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政權危如積卵的程度。

本刊摘登了索爾仁尼琴在美國的一篇講演。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連如此反共的人物如今蘇共都不得不允許其回國發表著作，中共今天對中春的態度與此相比，可謂相形見絀。

- 54 ■ 中央情報局關於中國的報告(下)
- 61 ■ 亞·索爾仁尼琴在華盛頓的演說

聞仙倩譯  
鄭月華譯

● 留學生園地 ●

- 68 ■ 家務事
- 70 ■ 天熱起來了
- 71 ■ 出國歸國，魂繫蘋果
- 73 ■ 老馬領事和小劉領事
- 28 ■ 中共不應介入留學生聯誼會選舉
- 75 ■ 故園鴻書
- 76 ■ 我所瞭解的讀者對中春的評價
- 78 ■ 你們真傻！  
——某位留學生的獨白

車少莉  
齊光  
司馬韋  
肖昆珠  
李力  
石磊

● 時事評論 ●

- 79 ■ 簡言鄧小平的寫傳觀
- 80 ■ 贖買中共的一招
- 81 ■ 發人深醒的幾件小事
- 82 ■ 葉甫圖申科的反思
- 83 ■ 拿國共錢，辦民主事
- 72 ■ 大陸剪影

黎音  
申一帆  
肖昆珠  
劉康  
阿修伯  
陵申

● 文藝園地 ●

- 74 ■ 制鎗
- 43 ■ 和共和國同齡(詩歌)
- 25 ■ 詩三首
- 53 ■ 我的夢(散文)
- 84 ■ 不速之客
- 87 ■ X磐(紀實小說)

顏啓  
唐捷  
奪華  
說不明白  
張潤  
張淳



### 「中春」需要高度理性的文章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我是從國內來美進修的。近來購閱了兩期「中國之春」，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震動。在來美以前，我最尊敬的政治家就是孫中山先生，到此後發現民聯亦是孫先生忠實的追隨者。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的方針是孫先生三民主義在現實中國大陸政治形勢下的發展和繼續。我認為這十個字至少反映了數百萬有覺悟的中國人內心所追求的目標。通過閱讀民聯幾位領導人的文章（如胡平、王炳章、余叢、房志遠等），我的確感到民聯是具有高度理性、追求民主的和平組織，其成員乃中國之精英，他們敢於犧牲個人及親屬的安全，我很佩服。不幸的是民聯被大陸政權宣判為「反動組織」，它只能利用美國為陣地向專制發起

攻擊了。

作為一種雜誌，中國之春刊載一些嘻笑怒罵的文章我完全可以理解，不過我還是 Paul Farber 胡平等人有高度理性的文章，覺得這些文章才反映民聯的嚴肅、理性的實質，而有些雜文或許會對民聯的形象有不良影響。

民聯發生財務危機我很同情，但由於我個人收入微薄，無力捐款，尚請諒解。我很願意利用空餘時間為民聯做一點工作，不要工資。如有可能，請和我聯係。另外，我耽心大陸政權會派人混入民聯內部（假如我現在是被派來混入的，怎麼辦？）。所以我經再三考慮，決定暫不公開姓名。您們如和我聯係，也不必用某個人的真實姓名（除了知名者以外），我覺得，只要能為民運做一點有實效的工作就行了。所以，請原諒我用筆名。

何平

一九八八年七月九日

### 黃金與民主自決沒有關係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先生：

本人自「中春」六十二期，見于大海先生所寫國民黨政府遷台時，將國庫中的一百七十噸黃金運到台灣。就這一點，我願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關於「一百七十」噸「黃金」，最近由許多報導及個人接觸大陸留學生之經驗看來，大陸同胞仍存在於一個觀念，亦即「台灣今天發了，全靠當初的那一百七十噸黃金。但事實上，此項推理，十分值得推敲。

就「一百七十」噸黃金而言，成現今日台灣的經濟地位，是幫助了一部份，但絕不是大

部份。今日台灣繁榮富裕是靠著台灣同胞吃苦耐勞精神及國民黨經濟政策的正確，一點一滴相乘累積而成。記得小時候，我的父母有好幾次拿着金戒指變換錢給我看病，而當時一錢黃金也只能買幾斤豬肉。戰亂期間，黃金與物價之比值遠遠低於現在的比值。再說，就算是于大海先生所說的是真的，國民黨政府也是把黃金拿來建設台灣，而相信留在大陸上的黃金遠遠超過此數。再比較二者之間的礦產、資源等，甚至人口密度，均可很明顯地看出二者之「差異」。而目前台灣是煩惱錢太多，不知道該如何花，反觀大陸仍在食物配給，二者之間民主程度更是無法相比。

關於民主自決，本人是堅決反對的。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絕不可獨立。但本人實在看不出這「一百七十」噸黃金與民主自決有何相關。本人以為有關台灣自決似應從歷史及血緣上探討，與小小財富似乎沒有太大關連，不知諸公以為然否。本人心中的願望是中國能統一，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強國，且人人安和樂利，至於用何種主義、何種政府，根本在於那種主義、那種政府能達到此目的。

劉英

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九日

### 不同意「二、四、八」的說法

余叢先生大作「從滿清之復亡看中國今天的改革」很精彩。但其中的「二、四、八」一說不能令人信服。「進行行政改革，二千萬幹部的既得利益會受到衝擊。」其實不然，因為

原來的行政制度壓抑人才、束縛主動精神、極大地限制地方的獨立性，正為許多幹部所不滿。「結束一黨專制，四千萬黨員不會答應」也不合乎事實，因為所謂「一黨專制」從來不是整個黨、全體四千萬黨員都在專制別人的政。一黨專制實際上只是一小撮黨的領袖們在專政，共產黨領袖把他們的寡頭專制叫作「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假如你信以為真，那麼要改變它豈不是要得罪整個無產階級，甚至得罪全體人民？「打破大鍋飯，八千萬國家職工會不習慣」，更是沒根據。說什麼「國家包養制」，似乎這八千萬人是國家在養活他們，其實剛好相反，是他們在養活國家。這個「國家」是一個山大王，把人家的勞動成果全都抓在自己手裡，除自己花用外，再對八千萬人搞平均主義的再分配。這種制度，不但使勤勞能幹的人平白受到榨取，也打擊了每一個人的生產積極性。

結論很清楚，一般幹部、黨員，尤其是一般職工，決不是改革的阻力。目前改革遇到巨大困難，廣大民衆的不滿也越來越多，這些都有着更深刻更複雜的原因，值得大家深入討論。但顯然，把困難歸於民衆的承受能力不夠，恰好是搞顛倒了。

· 萬莉 ·

### 再談葛駿鋒案件

報上披露葛老師案件後，貴刊曾有一些評論。鄙人認為還有討論的必要。因為它牽連到今後衆多的出國學者。且中國當局誤認為這辦法有效，我們也從中看到當局壓制知識分子的新花招。過去毛澤東式的思想改造、反右、文

化革命、反自由化等辦法，形象已相當難看。現領導就刪去毛的「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做法，改革成算經濟帳，加上法制的包裝，執行其預定的目標。這仍然是迫害。鄧小平掌權以來，雖然他也想提升知識分子的功能。提出科學技術現代化、幹部隊伍知識化、接見知名學者、許諾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等。但由於堅持四項原則，毛澤東思想中對知識分子的壓制態度仍被繼承下來。經濟改革中就不能把知識分子放在全國人民的平等位置上。前些年強調的是部份農民先富起來、工人富起來。很少有人敢討論知識分子有否先富起來的權利。在報道改革成果時也是以農民的收入、人口平均收入為例。很少有報導知識分子生活的實質改善。新近調整的政策中雖允許知識分子在完成本職工作後，利用業餘時間搞「創收」，却規定創收中的百分之五十要上繳單位。

先富起來的農民或工人出國不要保證金，未富起來的知識分子，不管公費或自費，出國都要保證金。理由是償還自受高等教育以來的一切費用。在他們的帳簿裡，只記錄培養知識分子的支出，不記錄多年來知識分子為國家作貢獻的收入。這樣知識分子只能是透支戶，只能在未老多病、壯年早逝的貧困線上掙扎。連飄洋出國、半工半讀、掙點錢來補償這負性收支平衡的權利也要限制。如果我們不據理力爭，類似葛老師的案件會增多。

鄙人建議已簽過這種協議的學者，若想保持在外半工半讀的權利，就應該自願地寫封信，聲明對這種強制性的、不合理的簽字持保留態度，以便單位上法院告你時，有申辯的餘地。如果有這種要求的學者不止一個，可以聯合起來表達共同的意見，人多力量大。請求當局

終止這種做法，或同出國學者代表簽訂較合理的協議，償還合理的金額。這樣做絕不是上海市公安局於八七年十二月答記者問中所說的「反對中國政府的破壞活動，策反出國人員」。而是真心誠意地支持國內的改革和法治。因為管理者制定的法規，只有建立在被管理者認同的基礎上，才會具有公正的效力。否則，任憑管理者單方行事，今天一個政策、明天一個細則、後天一個協議書，被管理者就無法活下去。只能用今天一個公開信、明天一個請願書、後天一個簽名運動來反饋求生存的願望。這樣做也絕不是胡啓立常委在今年三月對統戰部主要負責人講話中所說的「挑戰」。連應戰的字眼也用不上，僅是被迫的反應。如果這樣的反應也不能被容忍，當局堅持用巨額罰款、甚至判刑坐牢的方法。這怎麼辦呢？我們只好去請教有切身體會的過來人，最好是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比較肯記住過去的事，而且有一句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

請教問題的最佳候選人，應推中共中央政治局胡啓立常委。因為他是四十年前類似境遇的過來人；又做過青年工作，深深懂得學生們的心；現身居高職，統管意識形態工作。這個問題當然是他的份內事。鄙人堅信他不會忘記他的學生時代，更堅信他決不會背叛年青時代的事業。據小道消息，胡啓立常委正在遠抗上海市公安局的法令：「不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中國境內流傳的『中國之春』一律予以收繳」。他在發行、在流傳、在閱讀「中國之春」。推測他能讀到登在這個刊物上的信息，或許會滿足讀者的要求，樂於談他的經歷：四十年前的中國學生是怎樣面對罰款、判刑和坐牢的。

· 一位讀者 ·

# 上海學生大示威

## 內情追記

劉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日記摘抄)

雖然拿到了美國大學的獎學金，但日子過得也不怎麼舒坦，天天啃書本，做實驗，還要應付各種考試，整日裡神經繃得緊緊的。然而

，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再忙碌也難免犯傳統「士大夫」的痼疾，緬懷故土，追憶往事，這裡或曰HOME SICK。爲了松弛自己的神經，排却孤獨，「醫治」思鄉病，我們能爲自己開出的最好處方就是暫時的「擺脫現在」，鑽入往事的雲霧之中：閱讀家信，重溫昔日情人的熾熱文字，還有就是像翻閱史書般地品味以往的日記、筆記。我覺得，爲什麼我們久患HOME SICK，却同時一想到回國就有些不寒而慄，下面所摘錄的文字，似乎最能激起我的一系列沉思。或許，大陸的同學們讀了以後，也會有同樣的所思所慮，甚至比我的更多。

不過，筆者尚需申明，署名確系我的化名，個中的緣由大家都原諒，但其中的內容，均系當時所見所聞所思的實錄，有些像流水帳式的記錄，甚至文句不太通順的也都保留着原貌。所有這些，都有原本上的筆迹爲將來的史家作證。因我相信，歷史會證明一切，我們民族也遲早會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那一天。另外要向讀者說明的是，本人只是一個向「中國之春」雜誌投稿者，并非中國民聯成員，也沒有人來勸誘或強加於我什麼，我主動發表這段日記的另外一個目的，則是爲了對曾經激動過我，而且至今還在刺激着我思索種種問題的那段令人難忘的歷史作個側記。

筆者，一九八八年七月四日夜於美國中部某大學

十二月十八日（一九八六年）星春四 多雲

小孫(1)晚上帶隊去交大參賽。回來後即與衝衝地對我說：「××，有動了(2)！交大的學

生明天要上街示威游行了。」他們貼出的大字報也真扎勁(3)：「同學們，星期五去游行，大家準備好防身器具，以防政府走狗襲擊」。

真新鮮，一向講實惠的上海學生也會關心起政治。以前的「一二·九」不都是那些「以天下爲己任」的北京學生搞的嗎？交大的外地學生多，大概是他們在唱主角。

據小孫說，事情起因於星期一晚上。交大的一些學生去萬人體育館觀看一個美國藝術團演出。美國人開放，邀請觀眾共舞。交大的學生好動，真的躍入其中跳了起來，這下子他們可犯了大忌。散場後，參加共舞者統統被公安局抓走。這幫書呆子，到了警察那裡還講什麼「憲法」、「人權」，什麼以前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在另一種形式下重演了。這幫警察大概平時抓慣了小流氓，只動手不動口已經成了性，一惱火就動了手。據說其中有個研究生，書讀得多，話自然更會講，被揍得也最厲害。這些學生也實在是太書生氣了。什麼「人權」，抓你的時候有沒有拘留證？還講什麼「憲法」，這還不是北京幾個老人制訂，再搞一群人舉手完事；至於「華人與狗」，上海灘上不到處是戒備森嚴，唯洋人與高等華人才能得到入內的賓館、友誼商店嘛？！

現在的學生倒真與我們這些「未老先朽」者不一樣，見殺雞反而跳得更厲害。他們去找校長申訴，要求警察賠禮道歉。大學校長哪有這等權力？再則，他與公安局不都是「黨內同志」嗎？只是「分工不同」罷了。

不知他們是否能真的鬧起來。上海一發生民主示威，影響將不得了。當局怎麼辦？北京又會怎麼樣，聽說北京學生前階段曾有風波，後又平息了。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兩堂課。學生們都有些為交大學潮事而躁動不安。我還是小心一些為好，以防有人打小報告。學生人多勢眾，他們狗咬刺蝟無處下口。教師一有閃失，就變成「煽動」鬧事了。再則，也犯不着為這事砸了明年公派去美的好事。

下午照例政治學習。幾個頭頭都去院裡開緊急會議，大概是關於學潮事。書記不在，「政治學習」自然而然地成了牢騷會。大家都說如今的一切太不像話，學生應該衝擊他們一下。可是，「老九」(4)畢竟排行太後面一些了，誰也不說自己想參與。家住交大新村的老X今天話最多，他繪聲繪色地敘述了江澤民昨天在交大的狼狽相，聽了真令人感到痛快。江昨天去交大，他想起以校友身份阻止學生上街，被學生反駁得無言以答：既然是校友，為何「吃裡扒外」，不去懲辦違法打人警察，反而要我們忍氣吞聲。聽老X說，後來有個情緒極為激動的學生衝上台去，搶走話筒大聲嚷道：「他這個市長是上面指定的，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就讓他去做上面的市長吧，我們不承認他。」這下子，學生們都哄了起來——可以想像，江該有多少狼狽！他大概面對順民慣了，碰上這些要與他平等相論的人，就無以應對了。聽說他四十年前以前也在交大開過「學運」，沒想到四十年一個輪迴，他也有今天。

晚飯時在食堂遇見易X(5)，一付緊張張相。此人也真豈有此理，竟「關心」起我來了：「小X，當心一點，別卷進去，否則沒好處。」不過他倒透露了一些新聞。交大學生沒被攔住，衝出了一千多人。同濟大學也出來了，他們那裡還有教師參加。

呵呵！八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要向共產黨唱「青春之歌」了，不知楊沫老太太輩得知後有何感想？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間多雲

現在已經是二十一日凌晨一時半，剛從外灘步行回家。

上午聽了住在校外的教師有關學潮的紛紛議論，憋不住了，午飯後便匆匆回家。坐車行近南京路，因交通被阻，干脆改為步行，也好看個究竟。

約一時半趕到外灘，只見漢口路前面人山人海，一片沸騰。同時，中國紡大等校學生，足有二千多人，雲集在市政府門口。學生們高舉用床單做成的橫幅，上書的標語有：

「江澤民，你錯了！」

「反對鎮壓學生運動！」

「抗議警察毆打學生！」

「還我同學！」

「還我自由！」

「自由民主萬歲！」

學生們群情激昂，高呼着口號。仔細聽來，呼喊的口號與拉出的標語略有不同。還有：

「打倒官僚政府！」

「不要集權統治！」

市政府大門緊閉着。台階上站滿了武裝警察，與學生相距十餘米對峙着。警察沒帶槍，但穿着的大衣顯得鼓鼓的，大概裡面藏着電棍子一類的打人器具。看他們這付兇神惡煞樣，好像準備隨時撲過去。——這番情景，顯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字招牌多麼可笑，這裡是「人民」的政府。

市政府大樓的高音喇叭時而播放着通告，

大聲嚷嚷着要學生守秩序，不要妨礙交通，等等。廣播聲一響，學生隊伍就發出一片「哦：哦：……」「噓：……」聲，時而又高唱起「國際歌」——怎麼唱「國際歌」？這時應唱「馬賽曲」。可能他們不會唱，也許唱「國際歌」更策略一些。不過，他們唱得也十分有趣：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鬪爭，

……」

只有這四句，接下來的歌詞就聽不大清楚了，更多的人只是哼曲子，大概有些人是真的記不住下面的歌詞。

聽旁邊觀看的市民介紹說，今天學生比昨天多。早晨警察抓了一些學生，他們要求放人。

約一個小時後，沿着金陵東路向人民廣場走去，聽說那裡的學生更多。行至半路，遇見了交大的隊伍，他們把校旗也扛了出來，不過，用被單做成的橫幅更多。跟在交大後面的有：復旦、上海醫大、上海師大、財經大學。隊伍十足走了十五分鐘以上，估計至少也有三千人。他們的標語，除與同濟相同的外，還有：

「新聞自由！」

「新聞界必須予以報導！」

「誰指使警察鎮壓學生！」

「一二·十九，外灘一夜，千古奇冤！」

「我們要做人！人！人！」

這是人民廣場向外灘開發的隊伍。我也加入了其中(6)，並與幾位同學聊了起來。得知，昨天晚上交大、同濟的同學在市政府門口通宵示威，要求公安局公開道歉。因時逢寒冬臘月

，大部分同學穿得單薄，在半夜時分抵擋不住寒流襲擊便陸續回校了。約在凌晨四、五點鐘光景，外灘尚有五六百學生。當局見人少以為可欺，下達了「清除道路」的命令。利那間，早已待命在四周的武警部隊紛紛衝出。聽同學介紹說，猶如共產黨電影裡所描繪的國民黨憲兵鎮壓學生一樣，只聽見哨子聲、命令聲、嘹亮的跑步聲，大批年青力壯的警察衝入學生示威隊伍，有的二對一，有的三扭一，抓起學生就往已經準備好的汽車上扔。學生們奮力反抗，可是，怎敵得過訓練有素的武裝警察。交大有一位女同學反抗強烈，並大呼口號，惹惱了抓她的幾個警察，挨了一頓揍，腿也被折斷了。事件發生後的幾個小時，消息傳到交大（也傳到了其它學校），這還了得，聽說同學被抓，沒參與的同學也被激怒了，甚至一些青年教師，也宣佈停課，一起上街示威，一定要回自己的同學。

據同學告，下午也有同學被抓。一支隊伍（何校不詳）想從淮海路上的美國領事館門口經過，警察不讓，發生了衝突，最後還是被警察的棍棒驅散了。

回到市政府大樓前時，同濟大學的隊伍已經離開。然而，這支以交大為首的隊伍口號更響亮。他們示威了一陣後也向南京路走去。但不久，又有一支支人數不等的學生隊伍游行走來。好像一個學校自發地組織起了好幾支隊伍，還有幾個小的學院隊伍。幾十支民主示威隊伍，猶如幾十條蛟龍，在上海各條主要街道上穿梭奔馳着，整個上海變成了一片民主示威的海洋。

上海燃燒起來了！入夜了，示威的隊伍還是不斷。學生所到之處都受到市民們熱烈鼓掌歡迎。每當一支示威隊伍走來時，四周圍觀的

人群再擁擠，也會自動讓開一條路，並報以熱烈的掌聲——這番情景同平時上海人爭先恐後地擠公共汽車，搶購緊俏商品恰恰相反。一些看上去不太有文化，平時玩世不恭喜歡胡鬧的小青工此時也都顯得十分認真，看他們的神情都很激動興奮，一掃往日油腔滑調，見熱鬧就怪聲起哄的習慣。秩序竟會那麼好，真奇怪，也真有諷刺意味。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曾敘述到巴黎公社蕩滌了巴黎街頭的污泥濁水，如今，對共產主義已經徹底失望的學生民主示威却改變，却淨化着上海人的精神面貌。

從學生那裡還知道了一些更為感人的事情。昨天晚上在人民廣場示威的學生，得到了不少許多不相識的市民送來的點心、飲料，有的個體戶還送去了整籠的包子和整袋面包，以及香烟，等等。外灘一帶的食品店今夜生意特別好，凡學生模樣的青年一律可以受到不用排隊就可購買的優待，有的營業員還搬出椅子招呼學生前去休息。

民心者，天下也，看這般情景，誰都會認為，共產黨確實已失去了民衆之心。

相比之下，我等大學教師却顯得太窩囊了。晚九時許，一支扛着××學院橫幅的隊伍走來，見到自己的學生，我按捺不住了，趕緊走上前去詢問是哪個系的？同學們認出了我，氣勢却有些咄咄逼人，問：「你們老師對我們今天的行動是怎麼看的？」——此時的我竟會語塞，欲說又止，腦子裡首先閃現的不是如何回答自己想要的，而是身邊有沒有便衣警察，而反饋給同學們的僅僅是：緊握住他的手，說了一句：「與同學們相比，我們做教師的慚愧！慚愧！」說完，就一溜烟似地退出了人群——天那！這叫爲人師表，是「成熟」，或是由潛意識中的苟且心理在支配着？我們這些人，

從權力集團牙縫裡得到了這麼一點可憐巴巴的利益，就變得如此猥瑣。

近半夜時分，同濟大學學生在白渡正中央設立募捐點。見者人人捐錢。我留了一元錢備用，其餘的，像贖罪似地全部塞進了募捐箱。要記錄的實在太多，可是，寫得再多似乎也難以完整地描繪出所見所聞的一切。不能太累，明天還要出去感受。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陰

八點多醒來，頭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聽美國之音（VOA）。干擾太大，好不容易才調整好。(7)

「上海有三萬名學生再次示威，要求政府給予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這是繼武漢、深圳、昆明後的又一次學生示威，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外電作爲頭條新聞報導了，夠震撼人心的！

聽大妹講，她昨天坐四十一路回家，車在半路被學生隊伍阻攔，車上有位乘客講了一句抱怨學生的話，便立即遭到其他乘客的一致指責：「你這個人怎麼可以這樣說話，學生爲了誰，還不是爲了我們老百姓日子過得好一點。」——學生的行動倒真有一點喚醒國人意識的作用。

聽大妹介紹說，現在的焦點是：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學生，並要公安局公開道歉，另外，還要新聞機構公佈全部的事實真相。從目前的局勢看來，放人可能性很大。要警察賠不是，這不可能，他們是「黨指揮的槍」啊，「黨怎麼會有錯」；至於新聞報導，這更不可能了，共產黨只有後一個領袖講前一個領袖錯的

，哪有自我認錯之理。

又聽隔壁搞彩擴的個體戶××說，他昨天很感動。他大概平時被那些工商局、稅務局的地痞欺壓敲榨得太多了。爲了出這口惡氣，他特地回來買了兩大包面包，騎着摩托車就趕往人民廣場。到了以後，他既激動又有些害怕，背起面包奔到一群學生前，叫道：「大學生，接住，這是面包。」說完就往回奔，騎着摩托溜回了家。他說他只聽到背後的鼓掌聲和感謝聲。

午飯後去外灘和人民廣場。今天學生示威的聲勢較昨天更爲浩大。幾乎上海所有的大學都出來了。在外灘見到的有：上海大學、財經學院、水產大學、中醫學院、紡織大學、機械學院、外貿學院、外語學院，等等。聽外灘的同學說，在人民廣場聚集的隊伍更多。於是，我隨着財經學院的隊伍同往。幸虧夾在隊伍中，否則差點進不了廣場。廣場四周有警察的警戒綫，非學生一律不得入內。在人民廣場見到的隊伍有：化工學院、海運學院、復旦大學、上海師大、科技大學，等等。今天的校旗多了一些。所出現的標語有：

「我們代表時代精神！」

「同胞們行動起來，爲自由民主而戰！」

「民主自由萬歲！」

「新聞要自由！」

「保障人權！」

「嚴懲兇手！」

所呼喊的口號和昨天一樣，與拉出的標語略有不同，有「打倒官僚」等幾乎是直截了當的聲音。

化工學院的隊伍最爲龐大，看起來至少有三千人。他們不但有校旗，還有各個系的旗幟。很奇怪，他們還有汽車跟隨，難道是校工在

支持着他們，或是得到了校方的贊許？(8)

人民廣場正前方的大樓上有近十架錄像機對着下面的人群。高音喇叭不斷地播放着要求學生回校的「勸告」。

示威者全然無視那些錄像機。即使在高音喇叭的尖叫聲中，廣場中也有十幾個人在發表演講。在靠近西藏路的一個演講點，我聽了一個兒。講者是位女性，看樣子像個研究生，也許是個教師，情緒十分激昂，沒有講稿，却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大意是：

「……不錯，中國有憲法，但它是共產黨按自己的統治意志制訂出來的。這不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憲法，而是要我們老百姓去遵守他們的規則，這是懸在我們頭頂上的一根鞭子，中國的憲法不能代表我們的利益，我們的願望，它只能代表統治集團的利益……」

「誰是統治者？」她指着前方大樓頂上搞錄像的人，更大聲地說道：「就是他們！」聽衆的情緒完全被她熾熱的言詞感染了，不時地發出一陣陣附和的叫喊聲、掌聲和吼聲。

仔細想來，她的見解不見得有多少深刻獨到之處，然而，却句句實在，一針見血。尤其她的膽魄，確是感人。可我也真爲她捏把汗，回校以後，她將怎麼辦？！

約下午三時多一點，只聽見廣場東側福州路人行天橋上的人們又是一陣陣掌聲、歡呼聲。人們又在主動讓道，又一支隊伍開進了人民廣場。其中有「復旦大學甘省市高校青年教師」(大概是進修教師)橫幅。廣場上的掌聲更響亮了，人們驚喜地嚷着「老師也來了，老師也來了。」

教師隊伍呼喊的口號溫和一些，沒有「專

制」「官僚」等詞語：

「抗議警察毆打學生！」

「抗議警察鎮壓學生運動！」

「還我同學！」

「要真正的民主自由！」

後面不知是哪個學校的隊伍，用被單做成的橫幅上大書「懷念聞一多李公樸教授！」

這是一種呼喚。可惜，在我們中國，像方勵之那樣的教授太少了。我們當教師能回答嗎？老一輩的，還有多少個教授能像聞(9)、李二教授那樣？中年一代做了一輩子驚弓之鳥，有幾個還藏得住熱血，盡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埋怨這像混日子式的改革。我們呢？難道真的未老已朽了嗎？真的沒希望了嗎？想想聞一多和李公樸吧，中國的專制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續至今，像我們這樣的人太多，而聞李後繼者太少，這恐怕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聽說有個留學加拿大的博士生王炳章棄醫從政，在美國組織了個「中國之春」，可能他們是對的，是一班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如同現在的學生這樣。

十點鐘之前趕回宿舍，因爲想聽VOA。個人所見太有限了，只有從VOA那裡才能瞭解概貌。十點鐘廣播說今日有三萬多學生參加民主示威，他們還注意到了「新聞出版自由」等要求。美國之音的數字是怎樣得來的？今日肯定比昨天多，至少是四萬。隔壁小×(××系的政治輔導員)說，七點鐘廣播說有「一萬多」，看來他們也在統計之中。

小×告訴我，他這星期沒有回家。昨天上午，院黨委緊急通知，所有政工幹部一律在校待命，黨委還搞了「物質刺激」，向所有政工幹部發加班費。中午時分，他們被汽車送到市中心，分別到各條馬路及兩大示威點仔細查看

凡本院參加示威者一律記錄下來，并馬上用公用電話彙報。還有，見到本院學生，除記錄外，還要立即勸阻，若勸說不聽，再加記號——管制人的系統也真發達，到處是「思想特務」。可是，小×講，他昨天被學生感動了，既不記錄也沒打電話，竟跟在學生隊伍後面走了兩個多小時，等於變相地參加了游行。他說，好多輔導員都是這樣。

十一時半左右，回家的人都陸續回來了。人人都興奮地議論着所見到的一切。

太激動人心了！這是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真正公開的向共產黨集權提出的挑戰。三十七年了，差不多與我們同齡，從未有過的民主意識的普遍蘇醒。

有人把現在的學生運動說成是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的繼續。怎麼能作這樣的比附！天安門廣場事件所反映的主要是對文化革命的厭倦。從當時的口號以及後來發表的詩詞來看，其核心思想不過是要求「清官」「仁政」，傳統的「民本」而已。如今的學運已在根本上超越了這一傳統的層次。他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從未有過的與專制政體截然對立的近代民主（似乎還不能稱其為「現代」，因為出於策略需要，口號還有微量的保守），這是基於個體生命騷動的一種渴望。我們只能把她稱為是「五·四」「個性解放」「民主與科學」的繼續。所有這些，可以從他們的口號中明顯地感受到。如沒有抽象的「人民」一詞，拉出的標語均是「交大人」「同濟人」，等等。這哪裡是天安門廣場那些祈求「民為貴」，懷念周恩來所能比擬的。倘若說是「四·五」的繼續，那麼，他們就應該滿足於現在所謂的各項改革，畢竟鄧小平與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似乎有着「仁政」與「暴政」的根本區別。然而，中

國人放眼世界已有好多年，現在的青年學生，已經不是僅僅從過去汲取自己的需要，怎樣才能真正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毛澤東那麼一句坎井之蛙式的泛泛空論，這才是他們所追求的。當今的改革如此徘徊不前，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又愈來愈貪婪，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變得幾近一紙空文——你能建立起不受你制約，但能真正監督你的整個反饋系統嗎？這只能是個夢，而學生的直接政治敏感正是從這裡來的。

聽小×講，江澤民在昨天的全市黨員幹部大會上惡狠狠又有些得意洋洋地宣稱：「今天早晨，我總算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狗屁威力，不過是人數佔絕對優勢又受過專門格鬥訓練的武裝警察抓手無寸鐵的讀書人而已，「威」字改成「暴」才恰當。不過，他也失算了，他絕對不會在事先就預料到學生會越抓越多，真的忘了四十年前自己搞學運的歷史——不折不扣的「異化」。聽大家議論，現在上海各高校的學生還唯恐自己「落後」，被人瞧不起。華東師大的學生被校方壓了兩天，到今天才有部分同學衝出校園。他們的第一面橫幅是：「華東師大來啦！」，接着是「華東師大民間學生會」——大概以示同官方組織的學生會區別。真是土風驟變！

已經二點多了。據說本院的學生也不甘落後，不知明天又能感受到些什麼。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多雲

今天在校一天。晚上聽VOA和BBC，說上海學潮已經平息，又說他們的記者被告知，明天還有示威。今天的報導好像有些不准，聽又去人民廣場「勸阻」的小×講，鐵道學院

、上海師大、戲劇學院，還有我們學院等一些人數不太多的學生隊伍都雲集在人民廣場。這幾個學校上海學生較多，上海人政治觀念淡薄一些，但他們到底還是行動了。

本院學生也不甘落後。昨天晚上，幾位學生代表同院長書記談到深夜。校方只接到上峰「必須阻止」却沒「指示」用何手段去阻止的命令。這幫官僚現在倒也挺可憐的，被驅使慣了，現在要憑自己主見來應付這壓棘手的場面，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學生以其它大學為例，要求校方①提供校旗；②借給手提擴音喇叭，否則你就是「鎮壓」，而不是「勸阻」。上峰沒下達「鎮壓」，他們又辯不過學生，只好答應了。

未料，今天上午六時，廣播電台廣播了公安局的第三號通告，主要內容是：凡游行示威一律要提前登記，而且還必須有負責人出面簽字，否則就算違法，警察可以抓。當局聰明起來了，「擒賊先擒王」，登記是假，要抓出頭者是真，否則，這麼多學生一起上，如何應付。

本院的學生畢竟是上海人，以各系代表組成的臨時指揮部在通告和校方的雙重壓力下，答應不上街，改為晚上同「院領導對話」。不過，中午時分仍有相當數量學生衝出了校園。聽易××講，院方原意是想讓學生在院內「發洩發洩」算了（他們總算承認了學生有怨氣）。沒想到，「對話會」變成了全院學生明日集體上街民主示威的總動員會。

晚上六時正，對話會開始。院長親自主持會議，幾個書記院長都到了場，神情幾乎人人緊張。院長在開場白中要求同學們在校園內「討論討論一些問題」算了，不要上街。他的話還未講完，××系的××同學就跳上台去，奪

過話筒，直截了當地問道：「不要繞圈子，請直接回答，我們明天要游行，我去公安局簽名登記，你們是同意還是反對？」

「不要那麼激動嘛，我們不是反對你們民主要求，而是同你們商量，不要上街游行，這樣影響不好。」院長拿起了另一個話筒，慢條斯理地回答着。

「你們要什麼『影響』？怕你們在市委的影響吧。」又一個同學跳了上去，又是一把奪走了話筒，情緒激昂地對着台下的同學喊道：「同學們，交大同學的冤要不要伸？被捕的同學要不要獲得自由？我們要民主自由，還是要他們的好『影響』？」

「民主！民主！」「自由！自由！」「還我同學！」「抗議警察暴行！」

台下的同學大聲呼喊着、吼叫着，其聲浪像是要把樓頂掀翻。

台上的幾位端坐者都顯得坐立不安了。他們已經失去了控制會場的能力，甚至連麥克風話筒也沾不到邊了。而且，跳上台去準備發言的同學越來越多，幾乎把他們擠成了一團。

×書記急壞了，他大概怕同學們會做出什麼過份的行動，一把搶過一個話筒，扯着蒼老的嗓子，聲嘶力竭地叫道：

「同學們，同學們，別這樣好不好，我們贊同大家的要求。」

聽他這麼一叫，學生們楞了幾秒鐘。接着，不知是誰馬上接過話筒，「他們同意了。理解萬歲！」學生們跟着一起呼喊了起來。

這下可把那位書記吓壞了（他豈不是成了慫恿學生示威了嗎），趕快又站起來連連擺手，說道：「我不是贊同你們去示威游行……」

台上台下都哄笑了，真是洋相出盡。這時，會場完全被學生所掌握。發言的同

學一個比一個慷慨激昂，有二十幾個學生爭先恐後地要作為組織者，去公安局登記明日的示威游行。

×院長使壞。他見禮堂也擠滿了學生，連走道上也擠滿了人，問同學要過一個話筒說，二樓「正準備修理，你們站了那麼多人，會發生樓塌人亡事故」的。他這一下子倒真的把學生給鎮住了。不過，學生也真聰明，沒上他的當，提議干脆去操場繼續開會，并要求立即安裝好照明燈。

同學們陸續趕到操場後三十分鐘，照明燈仍不見亮，院廣播站的喇叭却響了起來，聲稱「對話會」不開了，要求同學回宿舍休息。這時候的學生豈肯罷休，他們堅決不同意，同時在操場上呼喊口號，唱「國際歌」。

住校的教師都在操場四周冷靜地觀看。黨委宣傳部的×××心懷叵測地向我走來，惺惺作態地對我說：「×老師，你們老師去勸勸他們，同學聽你們的。」——柿子揀軟的捏，真惡毒。我答道：「不行，看他們的情緒，你們政工幹部都管不住，我們去勸，還不是要挨揍。」這傢伙，聽了我這句話，脖子一扭，眼睛一斜，哼的一聲「才不會呢，你們教師是他們的同盟軍。」——原來在他們眼中是這樣劃分的「階級陣綫」的。看來事實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我們屬軟柿子，容易被他們欺侮。

又過了近二十分鐘，燈總算亮了，「對話會」繼續進行。幾個頭商量好了新的對策，一開始就對學生取辯論的姿態。他們硬說學生明天上街示威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他們收到的文件沒有講到有學生被警察打，或有什麼人被捕，相反，有不少警察被學生毆打了。他們還反問學生：「你們中間有誰親眼見到公安局抓人打人？」

他們的狡辯更激怒了學生。此時，一個外貌十分文靜的女同學走上了台，她先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年級和所在的系，接着向大家宣佈：「我是「一二·一九」外灘通宵示威的參加者。我也是在第二天早晨被警察抓上卡車的，過了幾個小時他們又放了我，因為我當時老實沒多講話。但是，我親眼看見了警察的殘暴：她聲淚俱下，向大家敘述了那天早晨的情景。同學們的情緒更激憤了，不時有人領呼口號。末了，這位女同學激動地對大家說：「同學們，我們××學院的同學就是否種嗎？」

「不是！」回答她的聲音是如此的堅決響亮。

「我們的同學被毆打、被關押，我們就無動於衷嗎？」

當然的回答聲響徹雲霄，大概離校園幾里路外也能聽到。

幾個老爺現在都啞口無言了。在同學們強大聲勢的威逼下，被迫同意：

1. 明天去游行的同學不算曠課；

2. 借給車子兩輛；

3. 借給校旗、橫幅和手提擴音喇叭等所需用的物資。

這些官老爺平時面對「順民」慣了，一旦遇到「逆民」造反，他們就現出了無能的本相。他們若堅持「反對」，既辯不過學生，又怕晚上下不了台，睡不着覺，而且，說不定學生隨時會衝出校門，闖到市中心，再開個通宵示威，對他們來說，結果很可能是江澤民對此大發雷霆，這是中國大陸所有幹部最害怕的。即使今天這樣的「默許」，恐怕也難以向上交差。有時候在中國當官也真難。大概中國改革之難也在這裡，靠這些根本不懂何謂民主，而且也根本不適應民主制度的人來進行「政治體

制」改革（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所能得到的結果可想而知。

「君子之澤，五世後斬。」魯迅又把這種規律進一步概括為「九斤老太」哲學。從今天這班老爺子的表演看來，共產黨也逃脫不了這一規律。毛澤東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謂氣壯如牛，足有九斤。鄧小平也可稱為鐵腕人物，七斤足兩。毛澤東親自培養的第三代王洪文就差勁多了，其被審判時的熊樣活像個被抓進公安局的小流氓。現在這幫老爺，俯首貼耳成性了，到「自由秤」去一磅，恐怕只有兩斤半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間多雲

一清早，黨委就召開幹部緊急會議，要全體幹部去各系科勸阻學生的行動。第三、四節我照例去×系×班上課，講了沒幾分鐘，書記老×進來，胡謔一通，差點沒讓學生轟走。此人狼狽之餘，要我來附和他。真是豈有此理。我的回答是：「我上我的課，其它事一概與我無關。」

未料，同學們僅僅聽了這一句話，就雀躍歡呼：「感謝×老師，理解萬歲！」

老×一走，我的課也不上了。這種時候，再裝什麼樣。

校方卑鄙至極。中午時分，廣播機大開，推翻了昨晚所有的許諾，還攻擊昨晚發言的那位女同學，說她是受人利用，全是造謠。他們還具體採取了幾項措施：1. 宣佈參加游行者一律算曠課；2. 明確通知公安局不接受我們學院學生的登記，還警告學生，如果不聽「勸告」，公安局將會起來「阻止」；3. 派出近百名幹部，以「談心」「做工作」為名，纏住昨晚跳

上台去的二十幾名學生代表。

學生絕頂聰明，他們早就商量好了對策。約十二點半，一百多個學生手持標語聚集在校門口，沒一兩分鐘，停在不遠的一長串警車就拉着警報飛馳而來，校內的一班政工幹部也紛紛衝上去，扯住學生的衣袖，生拉硬拽地不讓他們走出校門。然而，這是學生的聲東擊西，更多的學生（聽說有二千多人）却藏好了各種旗幟，從後門分散走了出去。像三十年代共產黨搞的飛行集會一般，約一時左右，突然在××路口匯合，亮出旗幟，宣佈民主示威游行開始。

消息傳到院內，可氣壞了那幫官僚，氣急敗壞地坐上兩輛巴士駛往游行隊伍。在校門口擔任警戒的警車長隊也一起前往，市中心又有更多的警車開去阻攔。據夾在學生隊伍中的小×回來介紹，學生太多了，他們手挽着手往前衝，公安局也拉不住，只好開着警車在兩邊擔任「警戒」，同時，開動了十幾個錄像機對着這兩千多人的隊伍。學生沒有一個往回縮，一路呼喊著口號，直至人民廣場。

聽小×介紹，警察與學生的辯論十分有趣：「回去，回去，不準游行」，一個像隊長模樣的警察蠻橫地向同學嚷道。

「你們沒這種權利，憲法允許游行。」「憲法允許的事，你們來阻止，就是犯法。」學生反駁他們。

「什麼『犯法』不犯法！憲法是由許多小法律組成的，憲法允許，小法律不允許，就是不許！」

真是一幫白痴，無知到這種程度。不過，他對中國法律實質的理解倒是一點都沒有錯。學生們罵他們是「文盲」加「法盲」二流

限。警察大概接到過「不準再打人，以防事態擴大」的訓令，任憑學生挖苦諷刺，一點沒有動手。到後來，他們除了錄像外，就啞口無言了。當然，他們本來就是些不會講道理的人。晚聽VOA，報導說今天有近萬名學生在市中心示威。今天的示威以同濟大學為主，他們要求公佈事實真相，並駁斥官方宣傳工作歪曲事實真相。

VOA現在成了上海學生運動的綜合報導站。他們的消息既准又快，不聽VOA，還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去瞭解概貌呢！

晚上又看了電視。真豈有此理，學生示威已是上海人人皆知的事情，怎麼到現在電視台還煞有介事地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江澤民也夠「腌世」的，還貼着膠布讓記者拍攝他去工廠慰問工人。他今天好像聰明一些了，沒講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之類刺激學生的話。

這些天誰都沒心思看書，碰在一起就興奮地談論所見到的一切。有兩件事還得一記：

火車站進駐了很多警察，嚴格注意乘客，凡學生模樣的一律不準出站。又聽杭大（杭州大學）一位出差來滬的教師講，杭州也開始出現了學生行動的跡象。不過，杭州火車站盤查得更緊，凡是不帶行李的學生一概不允許坐北上的火車，怕他們去上海或什麼地方串聯，引火種進來。

交大有好幾個學生小組去工廠，均被工廠保工部門擋在大門口。他們也不準廠內的工人出來與學生搭話。聽說，上海所有的工廠都加強了防范學生的措施。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間多雲

轟轟烈烈地鬧了一星期的學潮似乎平息了，但校園的氣氛仍顯得有些緊張。院方最近採取了兩項新招：1. 寫信、打電話甚至派人去找學生家長，以好言相說，其中夾着惡狠狠的威脅，弄得這兩天在校園裡隨處可見哭哭啼啼的婦女——真是女人式的家長文化，既小家氣又狠毒。2. 系統、全面、詳細地整理參加民主示威學生的材料。聽說要重點整理那些參加上星期六交大、同濟通宵示威的和在本院領頭的學生的材料。

這些天，另外聽到了一些值得記錄的事。江澤民曾兩次打電話給農場管理負責人。要他們「幫幫忙，千萬要穩住農場青年職工。」「絕對不能讓他們回上海，他們一來，上海可就完了。」<sup>(12)</sup>

芮杏文（時任上海市書記）在二十一日的全市黨員幹部大會上說：「一定要管住工人，不能讓他們和學生搞在一起。他們一有行動，上海就完了。」「上海一亂，勢必波及其它地方。」共產黨不愧是搞工人運動起家的，他們真的管住了工人。據說楊樹浦國棉×廠的工人會打着旗幟出來，抗議物價上漲并聲援學生，但立即就被警察擋了回去，為首的當場被捕。××系××的女友在上海無線電×廠工作。她的工廠二車間因原料短缺，工人拿八折工資回家休息已經幾個月，學潮一來，全部被召回工廠。沒活兒幹，就讓他們在工廠鐵門內閒逛。

體地提一些與民衆切身利益有直接關聯的口號。那麼，實際的作用就可能，即使沒有人去工廠聯絡，也肯定會有許多怨氣衝天的工人和市民從贊許附和變為自覺地行動起來，這樣，這次民主示威的實際效果與影響勢必會與現在有着質的不同，其結果很可能如江、芮所擔憂的，整個上海的一統天下將會秩序大亂，那對現在及將來的影響就更不可估量了。當然，就在這樣的結局，也不能低估其意義。她畢竟是第一次公開的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向共產黨集權的挑戰，她已經從內部給予了這個封閉社會以巨大的衝擊。這次學生至少還有另外三方面的意義：1. 直截了當地撕下了集權政府溫情脈脈的「仁政」面紗，使得知識分子和市民更清楚地認識了現在社會的本質；2. 她也更促使了人們對現在「改而不革」的現狀更加失望；3. 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或許，這一個多星期的學生運動，是一個新的紀元的開始。

可惜，我們做教師的面對這一切只會感到臉紅。也許我們真的是很軟弱的，屬於「毛」，只會依附於某一政權，且不管這個政權是否合理地存在，如毛澤東所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嗚呼！

……

一月十日（一九八七年）星期六 晴

……

上海的學潮平息了，南京、杭州、北京又接着來了。從VOA得知，南京學生的口號似乎最為激烈。

從各種迹象看出，院方整理學生材料特別忙碌。這種人還在當道，中國肯定不會有希望

。我們這個小小的學院尚且如此，其它大學恐怕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聽說公安局放錄像，要各學校去認人，以便算總帳。教學上的設備久不更新，控制人的手段的現代化速度倒夠快的。

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多雲

晚上去老×家聚餐，真暢快！……尤其是××<sup>(13)</sup>，要筆杆子的文人好喝酒，更喜歡喝紅了臉後侃侃而談。

他透露，市委宣傳部最近特別熱鬧，新年伊始，便接連開了兩次全市各理論刊物負責人會議。現在主持宣傳部工作的龔姓副部長反復向各雜誌負責人強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了保證「十三大」的輿論氣氛，要求各刊物特別注意第一、二期稿件。

真沒想到，學生民主示威的餘波在這種場合竟也會掀起一些小浪花，那些要筆杆子的文人對龔姓部長取了「陽不奉」的態度。

「你說學潮純粹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那麼，黨內不正之風有沒有？太子黨有沒有？壓制不同意見的發表有沒有？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

語氣都是陰陽怪氣的，你一言我一語，弄得部長大人好窘。他要求各刊必須馬上組織發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文章。參加會議的人都向他嘆「苦經」：難。「我們是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要求創新，現在中央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理論提綱，叫我們如何去組稿，而且，現在又有多少有學術功力的學者肯寫這類文章<sup>(14)</sup>。聽來真有趣，民主示威浪潮的衝擊，加上中國文人傳統的「以柔克剛」術，他們倒顯示

出了一些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記得現在頂替方勵之的彭佩雲在去年曾這樣訓斥一幫青年學者：現在的學潮，同高校中一些青年學者系統地形成了一套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不斷地灌輸給學生有關係。我們這一代中的文科學者倘若真的做出了那麼大的努力，那麼，我們呢？方勵之教授可是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但，他是我們的上一代！

注釋：

- (1) 我在國內的 ROOMATE。為避免麻煩，本文所提到的人名，均以化名或 X 代替，敬祈讀者原諒。
- (2) 上海方言，意為「有意思」、「有趣」。
- (3) 上海方言，「夠帶勁的」、「夠刺激的」之意。
- (4) 在「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代名詞。筆者懷疑語出「九儒十丐」。
- (5) 筆者的老同學，讀書一竅不通，畢業後專業對了口，留校任專職管學生的政工幹部。這種人在大陸永遠最走紅，由於他在學潮時堅定地「反自由化」，現已被提升為學生處長，黨委委員。
- (6) 那時，市民加入學生游行隊伍者甚多。有時候，在一旁觀看的市民也跟着學生一起呼喊口號，幫助維持秩序。
- (7) 近些年來，「美國之音」在中國大陸的聽眾越來越多。每天夜晚，若去大學生生活區漫步，你肯定隨處可聽到 VOA 的中文廣播和 SPECIAL ENGLISH。不過，凡內容涉及到大陸政治與文化或有關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報導，都會受到政府干擾台的干擾。在上海學潮期間，只有性能好的收音機才能收聽清楚 VOA，這一時候的英文台也

受到了干擾。

(8) 筆者事後知道，上海化工學院的學生得到了曾經留過美的院長「默許」。這位院長不愧為在自由神像下生活過的開明官員。化工學院離市區較遠，他派出校車送示威學生至市區，此外，他自己還坐着小車跟在學生隊伍後面，名曰「勸阻學生，以防出亂子」——此舉後來被人稱為「勸而不阻，等於鼓勵」。可惜的是，這位在高教改革中頗有建樹，在上海青年知識分子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開明官員，因為他對學生民主示威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他的仕進之道也隨之被堵了。據說原要調他去北京任國家教委副主任（一說是上海教委主任），由於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砸了鍋。

(9) 在大陸出版的報刊和書籍幾乎把開一多先生描繪成比共產黨還共產黨。然而，筆者曾聽一位開先生在西南聯大的老友談起過這樣一段往事：抗戰勝利後不久，美國有個文化團體邀請開先生赴美講學，開先生考慮再三後謝絕了。他對這位老友說：他們要我去講關於中國的事。我能講國民黨中國，因為我知道，可我不能講共產黨的中國，因為我沒去過延安。

(10) 上海方言，意為出了洋相還不知耻。

(11)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這位市長大人為學潮東奔西跑，他的司機大概也為此急昏了頭，一個急剎車，把坐在車內的江市長頭上碰了個包。不過，人們都不明白為什麼在這幾天，江市長老貼着膠布到處亮相，大概他想表示些什麼。

(12) 「文革」期間，上海有近百萬名知青被下放，絕大部分人通過考大學、頂替父母退休等

途徑回到了市區。一九八六年中，農場局宣佈，約三萬名未婚知青可以回市區工作。可是，市區尚有十數萬待業（失業）青年，要安排這三萬人工作還不是難上有難。這張空頭支票開了近半年未見兌現，弄得農場青工怨聲載道。學潮一起，當局在二十一日就匆忙宣佈，三個月內一個不剩地全部解決。這也算是學運時的一個插曲。

(13) 筆者的一位在某雜誌當編輯的同學。

(14) 如果仔細查閱一九八七年一月至六月上海各家理論刊物，你就會發現，沒有一家雜誌在「傾力」反「自由化」，這同一九八四年各刊猶如地毯式轟炸似地大反「精神污染」完全不一樣。各家雜誌不是擺樣子式的當頭放一兩篇就是在一個合適的欄目內插上一篇，其內容讀來會叫人發笑，因為它同整本雜誌的格調太不相吻合了。

##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閩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 起疊潮萬運學

## 見七穿獨共中

【合衆國際社北京廿二日電】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的人士廿二日說，中共警方會下令將邀請美國大使羅德演說的北大學生開除，並且要上海一所學校將羅德大使夫人包柏漪訪問該校的日期延後。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北大當局不希望外國官員得到壞印象，因此他們不希望外國官員在未受到控制的情況下與學生會晤。」

消息來源說：「學校當局不想讓外國人瞭解真實的情形。」

他說，開除學生之舉，是今年五月和六月學生舉行一連串活動所引起的，那時，著名的北大的學生開始舉行許多次露天討論會，企圖發起要求民主的示威。

被稱爲「草地座談會」的一連串非正式的會議，於五月四日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反政府份子方勵之發表演講開始。

羅德與其夫人包柏漪於六月一日參加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座談會。消息來源說，警方想要查明那次座談會是由誰策劃的。

消息來源說：「因爲那一次是學生發出的邀請，因此羅德大使在演講以前，未要求北大當局允許他發表演講。這件事使得學校當局擔心他們正失去控制。」

消息來源說，在羅德大使去了北大以後，北京市警察局逮捕了若干名被懷疑策劃座談會的學生，調查他們邀請羅德大使的動機，要那些學生說明他們如何與美國大使館接觸，並且對學生們說，他們不應與羅德大使接觸。

消息來源說，警方通知一名學生的父親到北京，將其子帶離學校。那名學生的父親是東北地區的一名安全官員。

仍住在北大學生宿舍的一名前研究生，而在氣象大學教英文的教師，已接到命令，在秋季開學以後不得再任教。

上海市警方由於擔心騷動擴大，曾令當地的復旦大學取消對羅德夫人包柏漪的邀請，該校原邀請包柏漪於六月至該校講演。

美國大使館官員說，復旦大學當局通知羅德夫人，由於學生們要參加期末考試，她不宜於在那時訪問該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要求

民主與自由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示威時，上海市是一個中心地點。

【合衆國際社北京廿四日電】北京大學教職員廿四日說，中共領導人已指責著名的民權運動人士方勵之在北京大學煽動「反政府」運動，並下令逮捕成立反對團體的學生。

中共當局已開除北京大學至少兩名學生，因爲這些學生涉嫌發起露天討論會，並邀請美國駐北京大使羅德出席他們的非正式討論會發表演說。

消息人士引述共黨幹部本月稍早在北京大學黨委會議中的談話說：「應該開除的人就要開除，應該捉的人就要捉，應該處罰的人就要處罰。」

他們說，中共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在最近的內部文件中，指責方勵之五月四日向學生發表演說時，涉嫌在校園裡煽動反革命運動。

消息人士說，這項文件警告說，自從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發生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規模運動以來，學生運動的性質已經改變。文件中說，現在的學生比較反動，他們的活動也與方勵之越來越接近。

消息人士說，由於五、六月間學生企圖發起民主示威，北京大學黨委會七月中旬召開擴大會議，並宣佈要鎮壓校園活動。

他們說，在這項奉中共高級領袖人命令召開的會議中，黨幹部把學生運動指爲反政府和反改革。這些活動包括六月八日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短時間靜坐示威。

黨委會下令在下學期展開調查，找出學生領袖和有那些學生在成立反對團體。

會中也敦促成立新的行政團體，對學校加強控制，並指示北京大學應該在壓制學生運動方面成爲中國大陸所有學校的榜樣。

# 危機四伏 改革維艱

## 趙紫陽淚揮中南海

黎音

今年以來，中共的改革進入了十分艱巨的時刻。無法控制的物價上漲，使民怨鼎沸；陡增的刑事犯罪案件，攪得社會不能安寧；特權官僚的腐敗，嚴重蛀蝕着國家的機體；民族矛盾、學潮問題、交通事故以及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使中共上層無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現在的中國大陸，猶如一個痼疾纏身的病漢，步履蹣跚地在探索、尋覓。甚至連中南海的要人也迷惑了：出路究竟在哪裡？

### 同黨同床不同夢 大會小會馬拉松

由於社會問題成堆，中共的主要決策者心中也沒了底，所以今年以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碰頭會開得相當頻繁。因為每次會上都是各持己見、互相牽制、爭論不休、議來議去，使許多問題談不清也定不了。不是這個講小平同志怎麼說，就是那個說陳雲同志如何講；有人轉達先念同志的意見，也有人反映彭真同志的看法，結果搞得與會者頭昏腦漲，只有休會去打橋牌或吃冰激凌。所以有些較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不滿地說：「現在是元老治國、七嘴八舌、各拉一伙、都想當佛。」

在五月三十一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有些情緒地講道：「能不能從我們政治局、書記處開始，開短會，說短話，簡單明瞭表達本人的意見，不要每次會議都開成馬拉松。」明顯地流露出「不滿和憂慮」。

### 巧計千條難適用 還是鐵腕槍打雷

現在北京的一些機關大院都在紛紛議論：目前的改革正處於極為嚴峻的時刻，真有點像當年長征強過大渡河，風險巨大，成敗難測，

搞不好會全軍覆沒。為此，中共的主要決策者憑着歷來的經驗心裡清楚，關鍵時刻一定要依靠槍杆子。

六月五日下午，中央軍委召開軍委常委碰頭會，趙紫陽帶病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給軍委的頭頭們打氣，他說：「信心決不能動搖，對改革的信心，就好比戰時的軍心，軍心動搖了就會打敗仗。只要軍心不動搖，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改革的大趨勢。」

參加會議者透露：在為時一個半小時的碰頭會上，趙紫陽有時講話很動感情；中間被醫生請去休息室打了針；秘書曾兩次為他送藥。楊尚昆在會上還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要求軍隊團結一致，全力地、無條件地堅決支持改革。

### 紫陽淚是咏嘆調 小平酒為定音鐘

據來自趙紫陽身邊的可靠消息說，這位當今中國實施改革的主要砥柱，在吉兇未卜、動盪嚴酷的形勢壓力下，近期顯得心力憔悴。不久以前，在一次私下談話時，他竟然傷神落淚了。鄧小平聞訊後，特意請趙紫陽、楊尚昆、秦基偉等人共進晚餐。席間鄧小平起身為趙紫陽敬了一杯酒，并風趣地對在座者說：「要吃糧找紫陽，這話并沒過時。」表示對趙紫陽的支持與贊賞。鄧小平接着又講：「不要怕擔風險，沒有風險辦不成大事。解放戰爭時我們面對蔣介石八百萬大軍，沒有風險嗎？風險大的很嘛。打不打，能不能打勝，當時政治局不知議了多少次。結果風險頂住了，仗是我們打勝了。」

事後某些知情的高幹子弟在背後戲謔地講：「趙紫陽的淚是咏嘆調，鄧小平的酒為定音鐘，在改革的舞台上演了一段插曲。」

## 改革艱辛阻力大 左王來勢何洶洶

因為改革中出現了一連串的麻煩，於是使保守的「左」王們抓住了攻訐的口實。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證實，自今年六月初北大再次出現學潮後，鄧力群、胡喬木、薄一波等人又趨活躍。北京市委常委書記徐惟成有恃無恐，充當「左」家村「幹將」，人稱「徐左王」。他利用職權指示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日報、北京社會科學院聯合組成調查組，調查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有何抬頭」等問題，試圖再揪出幾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來。徐惟成在接見調查組時，氣勢洶洶地說：「只要不開除我徐某人的黨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定了。即使開除了我的黨籍，我還要行使一個公民的權力，還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北京市委宣傳部召開的北京市各報刊總編會議上，汪立行傳達了胡啓立的講話精神。當提到胡啓立指示：「今後不宜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時，徐惟成針鋒相對地插言道：「別的地方我們管不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有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的問題。擒賊先擒王，打蛇先打頭，我們北京該講的還是要講，旗幟要鮮明。」汪立行問：「北京日報的社論是不是要送中宣部和書記處審查？」徐惟成當即答道：「不送，照常辦事，我定了你們就發。」接着他加重語氣講：「王震同志說，對付鬧事的學生不要怕刺刀見紅。筆頭子硬點怕什麼！」

北京的幾位記者事後憤憤地議論：「流氓鬧事偏偏打死了學生，怎麼不把徐惟成打死！」

鄧某而今有反省 當年「倒胡」颺錯風

盡管胡耀邦最近很少露面，甚至在例行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很少發言，但勢力不可低估的「團派」高層幹部却仍在暗中集聚力量，冀望他們的「主帥」胡耀邦能重新復出。

據來自北京、上海的消息靈通人士反映：胡耀邦的親信項南、朱厚澤等人近期活動頻繁，在不少場合進行游說、發表談話，意為「倒胡」翻案。

鄧小平的兒子、女兒最近也都曾分別透露一些情況，說鄧小平通過一年多來的實踐反思，領悟到「倒胡」是他辦錯了一件大事，因而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不久前鄧的女兒在接受「美術報」記者採訪時，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講的：

我父親現在認為，去年年初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有些過火了，胡耀邦同志受了委屈。學生上街鬧事不能把責任全記在胡耀邦的帳上。現在問題比較多，情況也比較複雜，糾正去年年初發生的問題，還需要一段時間。

### 風雲莫測征途險 難斷未來輸與贏

現階段的中國大陸，實際上是處於非常時期，民衆無不注視着改革的趨勢，關切着國家的未來。但放眼當前的國內局勢，又不能不使人憂悒滿懷。

國內一些有識之士預測：從現在至明年春節前後，將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勢力經受極大風險的時期。倘若中國的政、經形勢仍然是矛盾尖銳、問題成堆而乏力扭轉，那麼，現已危機四伏的中南海可能面臨更大風浪的衝擊。到那時恐怕連鄧小平也難以頂得住，即使趙紫陽不成爲第二個胡耀邦，也會出現別的替罪羊。

國人企望改革成功，但那必須是大膽治本的徹底改革。

## 參考消息 趙紫陽 贊成 開放

黨 禁

據可靠消息傳聞，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正在考慮和構想做兩件事，第一是把黨撤出軍隊，第二是開放黨禁。

鄧小平現在正在通過楊尚昆的過渡，把軍權最後完全交給趙紫陽。如果趙紫陽能夠順利地接過軍權，他就要把各級黨委和支部逐漸撤出軍隊，最後實行軍隊國家化。這項工作的具體技術手段可能是：1. 恢復軍銜制；2. 取消政委、教導員、指導員制度；3. 取消中共中央軍委。

據某些與體改委很相熟的內情人士說，如果鄧小平、趙紫陽能最後聯手攻克陳雲這座堡壘，趙紫陽也準備最後像蔣經國一樣開放黨禁，允許中國出現真正的反對黨。

在今年六月五日對非洲客人的談話中，鄧小平勸非洲客人「不要搞社會主義」，趙紫陽也說：「不要像中國以往那樣發展國營經濟，要多發展私營經濟。」從這些談話中，我們大概可以猜測，這一對中國的「賢君良相」的思想比外界一般的傳說走得也許要遠得多。但是，在一個民怨沸騰，人心不穩的形勢下，在保守派層層阻力下，鄧小平和趙紫陽能走多遠仍是一個變數。（齊林）

# 蔚為大觀的 中飽私囊術

中共在死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導致貪污受賄嚴重漫延的原因。

中共近四十年的統治，已經表明，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不適合中國國情。所以當權者號召要改革所有制結構。改成什麼結構呢？改成私有制為基礎的所有制結構嗎？這不可能，因為既然是共產黨，他們只能對馬克思、列寧的教條作變通，而不能否認。

因此，中共提出，改革將在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集體所有制為輔，個體私人經濟為補充的所有制結構中進行。

這是一種混合經濟體制，暫且不討論其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我們來看看，這種混合體制下，有多少貪污受賄的手法。這些手法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但條件是你得先有一個權，大權得大利，小權得小利，無權者吃虧。

## (一) 汽油法

汽油法，來源於全民單位的司機，在路上或私下，將汽油箱裡的汽油，以比官價低的價格，賣給私人運輸個體戶或私人摩托車擁有者。這樣，私人運輸個體戶買到了便宜的汽油，而全民單位的司機，用國家的物資（汽油）換到了鈔票，落入自己的腰包。

汽油法的運用，當然不限於賣汽油。例如

保溫瓶廠的司機，可以賣瓶膽，然後申報運輸中破損，這些賣掉的瓶膽，就成了個體批發或零售的貨源。

汽油法也不局限於司機，可以由司機與經理人員搭檔，只要經理對司機填報的運輸損失超過正常標準睜一眼閉一眼，那麼經理人員亦可從司機那頭獲利。

汽油法的運用，損失不只是全民單位，也損失職工的獎金與福利。同樣，汽油法也適用於集體與個體經濟之間。

然而，汽油法只能運用於運輸環節，能從中獲得的利益不是很大，所以還不夠刺激。

## (二) 資本轉移法

假使我是全民企業的廠長，你是私營企業的老闆，我們是朋友。

你現在沒有足夠資本，我可以借給你。怎麼借呢？挪用公款是要治罪的，但我可以同你定一個合同，向你購買期貨三十萬元，先付你定金七萬元。

於是，你有了七萬元的資本去做你的生意。當然，你實際上只有六萬元做生意，因為你拿到七萬元的轉帳支票後，必須取出一萬元的現金給我私人，這是我答應轉移資本給你的條件。

以後的事怎麼樣呢？那有三種情況：

1. 你生意做成了，按合同給我送來了貨，

那麼我再付你另外二十三萬。如果貨的確是我廠要的，那就完成了交易；如果貨不是真正需要的，或質量太差，那麼你再要給我現金，我讓貨積壓或讓廠裡虧損降價再賣出去。

2. 你拿到資本後做別的生意，賺了錢，但無法按合同交貨。那沒關係，只要在合同到期前把定金退回就是了，違約金象徵性負擔一點，反正我是廠長，但你要讓我好向上級交待。拖欠違約金和該退的定金也沒關係，我反正不會告你，但你得早點還，否則上級查問下來，我不告也會有人告的。

3. 你虧了，既無法按合同供貨，也無法退還定金。怎麼辦呢？為朋友只好兩肋插刀了。你手頭還有多少錢？把剩下的一半給我。你宣告倒閉破產，我們是合法的交易，你不會為此坐牢。但我這個廠長肯定當不下去了。但也不錯，我幹十年廠長的工資，還不如幹一次這種資本轉移的勾當呢！下次有機會再好好合作！

同樣，由於全民與集體所有制單位的獎金、稅收制度不一樣，這種事也可以發生在他們之間。參與這種勾當的也可以是採購員，上級主管部門幹部或生意中間介紹人等。

集體所有制與個體戶之間也可以同樣利用資本轉移法。

運用這個方法的關鍵，是關係的可靠程度。

## (三) 消息走漏法

消息走漏法多用於漲價之際。因為大陸多數民用日常消費品，都有一個規定的地區定價。如果市政府決定，兩個月後，毛巾與牙膏漲百分之五十。這個消息當然是要保密兩個月的。參與的人，都是可信的共產黨幹部。

現假設我就是一個取信於共產黨的幹部，你是日用小商品個體戶，我告訴你這個消息，你再去通知其他個體戶，你們把所有的資金，用來購買市面上的毛巾與牙膏。兩個月後，毛巾與牙膏漲價了，而你們再比漲價後略低的價格出售，賺錢了。

當然，是我給你們的消息，你們要給我好處。要知道，下一次漲什麼，你們得靠我通知了。這叫作相互幫助。

消息走漏法，還可以運用於緊俏商品的供應上。例如百貨大樓經理通知個體戶或家屬、朋友，明天供應日立、東芝彩電二百台。於是今天夜裡，你們組織幾十人去排隊，大部分彩電就落於你們之手，然後再以黑市價格賣出，你們就賺了一把，當然，得給我送三台彩電到家裡來。下次來了進口冰箱，我再通知你們這麼幹。

#### (四) 過橋法

過橋法，等於是有免費遂道不走，去過收費的橋。

例如某鋼鐵廠，本來按月供應某建築公司鋼筋七百噸。現在該鋼鐵廠把鋼筋供應給某預制板製造個體戶，這個個體戶根本就不着這種鋼筋。然後再轉手賣給該建築公司。這樣一來，鋼鐵廠利潤少了一點，建築公司成本高了一點，但這都不是私人的事。預制板個體製造商賺了一筆「過橋費」，再分出一部分給鋼鐵

廠與建築公司的合伙人，事情就擺平了，大家都有不少錢裝進了私人的口袋。

過橋法中的「橋」，並不一定要個體戶，但這個「橋」，必須是在財務制度上能夠取出大筆現金支付給個人且沒有帳目可查的，因此全民單位幾乎不可能是「橋」，集體企業中僅某些鄉鎮企業或經濟特區中的企業有可能。而較大的個體企業，幾乎總是可以當作「橋」的。

#### (五) 訂貨單分配法

雖然這種方法也常用於國內企業之間的交易上，但最大的利益是在外貿進口單位裡。

按中國大陸的進口程序，以商業局為例，經過統計，現基層單位需要進口彩擴設備一百台。但商業局不能直接從國外進口，必須將進口訂單交給外貿公司，於是，外貿公司進口部負責處理訂單的人，就可以在訂單分配上謀取私利。他首先看，哪個外貿業務員可以從國外公司拿到較高的佣金。然後再看價格是否能接受。當然，被選中辦理此交易的業務員，必須將所得佣金（佣金是秘密所得，往往是由外國公司推銷員將自己的佣金分一部分給他，替他存在外國銀行，或帶現鈔給他。），分一部分給該負責人。

這樣，進口產品常常是以一些較高的市場價格購入的。

這個外貿進口部負責人，常常可以不給自己系統的業務員去辦理外貿採購，而給一些外人辦，只要這個「外人」有路子，佣金高，關係好，又不會捅出去。

這樣的「外人」，多見於高級幹部的妻子或子女。因為一方面這樣的人關係多，另一方

面，一旦出了什麼毛病，可以有他們的丈夫或父親出來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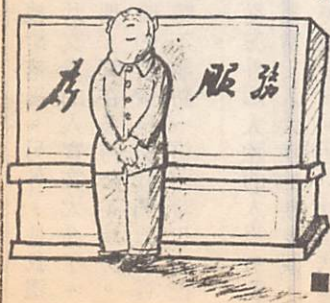
這樣的高級幹部，多數是黨、政、軍的老牌子幹部。因為每筆交易都很大，一般幹部還沒這個膽量，也無力量在出事時保護該外貿進口部負責人。

要指出這一點，這個外貿進口部的負責人，實際上只能拿到佣金的一個零頭。因為實際作用，全靠高級幹部及其代理人。你如果不滿意，那麼這些「外人」有權、有關係，隨時可以撤掉你。

國內交易之間，多見於全民或集體企業，將一些加工讓給個體企業幹，從而主管人從個體企業老板處獲取回扣放進私人腰包等等。而這些主管人往往還裝出一副共產黨清官的面孔，他們都有自己可信賴的代理中間人在中間協調，一旦出事，打不到自己身上。

以上幾種是混合經濟體制中特有的中飽私囊的手法，諸如改換商標，行賄受賄，偷逃稅收，合伙盜竊，哄抬市價，製造廢品等等，在現今的中國大陸都無處不有。

中國大陸想徹底解決這種混合經濟體制并存的嚴重貪污、中飽私囊的行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看來共產黨是永遠不會解決這個問題的，除非共產黨願意改名換姓。



# 「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 一回中國大陸探親期間的 感受

李國愚



三月底至四月初，我曾回中國大陸一行。本來，我並沒有回大陸的計劃，只是打算到香港探親，因此事先並沒有跟總部打招呼。但是我有一個親戚知道我有歸國華僑的身份，非要磨着我給他帶些免稅品回國不可。我雖然

估計到自己在國外從事民運工作的身份可能已經暴露，但這在親戚面前不便明說，可又實在找不出什麼其它理由說明不便回國，只得硬着頭皮答應親戚的要求。當然，臨行前我也冷靜思考過各種可能出現情況的對策，甚至也作好這樣的心裡準備：大不了就像楊巍那樣給抓起來罷了！

本來，我只答應幫親戚把東西帶過深圳羅湖橋海關就往回走。但過大陸方面的海關時，我發現他們的檢查非常松懈和混亂。我甚至覺得比不上香港海關方面的嚴謹。香港海關方面用電腦來處理出入境者的個人資料，還有專人拿着有照片的花名冊在背後查對出入境者是否上了政府的黑名單。但大陸方面完全沒有這些技術措施。大陸海關人員除了臉色陰沉而令人生厭之外，其它方面沒有發現什麼特別之處。當然，我並不排除在暗地裡有些什麼措施的可能性。

過海關時的經驗，給我壯了膽子。我決定改變原計劃，在深圳朋友處住兩天再走。在深圳的兩天，我注意到並沒有受到跟蹤監視。這樣，膽子就越來越大，決定再回廣州家中看看父母，探望一下朋友。最後甚至跑到其它省份轉了幾天。

我在大陸內部總共呆了十天時間。我總覺得奇怪，總懷疑共產黨的特務機關故意在放長綫釣大魚，所以我思想上的警覺性一直都沒有松懈，出境時也沒有帶什麼可能犯忌的東西。不過，事實上我再出境時並沒有受到什麼特別的檢查，我的隨身行李連翻一下都沒有就讓我過關了。

我這次能順利進出大陸，並不說明我的身份沒暴露（因為我回到南美居住國後，發現中共領事館已經在調查我的情況），而只能說明

中共的信息處理方面技術落後。另外，像我這類在海外發表批評中共文章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要入海關的黑名冊，實在多得防不勝防。所以，我猜想中共現時的政策是對我們這類言論反共的人在出入境時不設防（這同時也是配合它現時的統戰政策）。

中國大陸現在對從海外回大陸的人沒有要求報戶口的制度。聽經常出入大陸的親友說，這種制度前幾年就已經取消了。所以我這次回大陸跑了幾個地方都沒有報過戶口，出境時也沒有遇到麻煩。

這次回國，在廣東、湖南、江西等幾個地方走馬看花地轉了一下。在我印象中感覺比較明顯變化的是：人們的衣着漂亮多了，市場的物資供應豐富多了（同時物價也高多了，現在一元錢只能當以前的一角錢價值來使用），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一些提高。各個大小城市裡高樓大廈也比以前建多了（與此同時高級賓館的使用率也得驚人），跑單幫做生意的人多了（火車經常人滿為患，超載運行），全國各省都有人跑到廣東來發財，廣東人也往全國各地跑。總之，感覺比以前多少有了生氣。

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國各地的香港化傾向（香港人稱為「內地香港化」）。從人們的談吐衣着，茶樓旅館的服務措施，大街小巷的廣告，各影劇場的文藝表演，電台、電視台的節目編輯到節目主持人的遣詞、口吻，都有刻意模仿香港同行的痕迹（初時不注意細看，我還錯將廣東電視台的節目當成香港電視台的節目）。人們思想觀念上的香港化傾向也很明顯。所謂觀念的香港化，就是對政治問題冷漠，對現實利益問題重視，一切向錢看。

在大陸內部看到的種種現象，使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疑問：現在不正是搞資本主義嗎？

「是的，現在正是要搞資本主義。」接過我話題的朋友是一位新上任不久的某單位的黨委書記。「過去毛主席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事實上證明這是錯的。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了這個錯誤。現在應該說，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位共產黨員的宏調實在令我大為驚訝。這位仁兄看着我驚訝狐疑的臉色，微微一笑，轉為稍微嚴肅的語調繼續說：「不過，我們要搞的資本主義，不是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而是要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不要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我們堅決不要。」至此，我才明白他這種大膽言論中的玄機。

從種種迹象（特別是海南模式）來看，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中共已經在四個堅持的立場上又後退一步，即只準備堅持共產黨領導這一條，其它三個堅持雖不會明顯放棄，也會逐漸鬆動。中共現在要搞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即以前毛澤東提過的新民主主義。雖然我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能成功深表懷疑，但從共產黨自身的理論邏輯來看，這種理論是能夠自我圓通的，也可以解釋得與「四個堅持」不相衝突的。我感覺：搞「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鄧小平、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最後的唯一選擇——希望以資本主義這服強心劑挽救日益嚴重的改革危機。因此，「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句話，其中的含意也包括了「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改革派」這層意思。

我這次跑回大陸，本來想見一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但很多朋友都跑到海南島去了。在對待海南島發展的問題上，我的老朋友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熱心派，一派是冷觀派。有一位專程從海南島跑回來見我的朋友是熱心派。他

說他和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把全家的戶口都遷到海南島去了。把戶口從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遷到海南島一個小縣城去，真有點當年上山下鄉改造農村落後面貌的「革命知識青年」的氣概。他說現在海南的政策很開放，大家覺得很有奔頭。生活雖然苦一些（海口市豬肉賣到十塊錢一斤），但有希望就無所謂。他說現在全國各地有事業心的人都跑到海南島去了，如果沒有全國的四分之一，也起碼有六分之一的青年人才集中到了海南。登記要求調到海南的有四十萬，常滯留在海口市的就有十萬左右。把海口市及附近的小城鎮的旅館、招待所都住滿了。許多人寧願在海口市街頭上擺個攤攤賣報紙、補皮鞋、賣熟食，也不願意回原來的科研單位工作。原因是他們怕以後海南封島就進不來了。我這位朋友有個宏偉計劃，他說要準備辦商店、工廠、養殖場，將來發展了還要辦學校、辦報紙。他還希望我吸引些外資到他那裡投資，他保證提供優惠待遇。

我另外一位朋友則是冷觀派。他勸我別讓那些表面熱鬧的現象搞到頭腦發熱了。現在的海南島還不是真能幹成什麼事業的地方。還要多看幾年情況發展才能說。現在所謂的海南開放政策，只是幾位籌建海南省的地方領導人說過幾句話而已。這最多表明一些領導人有這樣的意圖，但還沒有制成本法法規。即使制定了有關法規，還要經過黨內反復討論（較量）才能確定。等到公布實施，也要幾年時間。另外，海南存在許多實際困難，例如：島內交通運輸網絡落後，不能適應高速經濟發展的需要；工業基礎差，勞工素質極低；城市基礎設施差；居民用水及工業用水不足；能源供應不足；港口、機場的設備落後，吞吐量太小；鋼筋水泥等基礎材料供應不足；糧食、肉食、副食現

有生產量應付不了急速增長的人口需要……這一連串的基本需求，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所以，海南經濟的起飛，起碼要十年八年的時間才能見成效，近這三、五年是打基礎的時候。這位朋友認為趙紫陽選擇海南島作戰略突破口是愚蠢的。因為海南不是快見成效的地方。他認為趙紫陽不夠時間與保守派周旋。恐怕沒幾年時間，趙紫陽就給物價飛漲的壓力趕下台，下一任的當權派很可能是保守派，到時候海南的發展計劃又得半途而廢了。

按照這種說法，海南的前途豈非十分黯淡？我這位朋友說，這又未必。要使海南前途不可逆轉，關鍵因素是要能吸引足夠強大的國際經濟力量介入到海南島的經濟發展計劃中去。只要形成了這樣的格局，即使中國政局發生變化，由於改變現行經濟政策會引起嚴重的國際糾紛，從而促使當權者不敢輕舉妄動。這樣的話，現行開放政策的安全係數就會大大提高，中國的改革前景才可有一線希望。我的朋友說，他的國際因素論是有根據的。目前陳香梅女士已出頭招引了幾個國家的財團在海南搞國際機場，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目前這股力量還過於微小，不足以影響整個海南島的經濟形勢。如果外資的比重能在整個海南的投資總額中占五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以上，海南的前景就可望樂觀了。

我相信我這位朋友的話是有道理的。但問題首先是：如想吸引外國財團有投資興趣，首先要提供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這是一個經濟生態學的常識問題。但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共產黨國家往往不能給投資者提供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中共改革派能否解開這個因結？我相信這是個不能光憑良好願望就可解決的問題。

# 有形之手 無力回天

房志遠

## 經濟學的困惑

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了第十個年頭。這十年，是經濟學家們大展鴻圖的十年。從北京到地方，五花八門的經濟發展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如雨後春筍；各級決策機構的案頭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報告、改革方案；中國經濟學辭典上又增添了一大批新概念、新名詞：責任制、承包制、代理制、雙軌制、聘用制、合同制、破產制、租賃制；資金市場化、勞動力商品化、企業股份化、幹部知識化；利改稅、撥改貸、條改塊；中心城市發展戰略、東西梯度發展戰略、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戰略……總之，能想出的招都想過了，能使用的術都試過了，可是改革的戰車四處碰壁，全國上下民怨沸騰，從上到下，幾乎沒有一個人對今天的現狀表示滿意。

老百姓在罵，據說是「碗裡吃肉，嘴裡罵娘」。

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也在罵：經是好的，都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

中共內反對改革的人更在罵：都是這幫教師爺出的馮主意，把中國搞成這個樣子。

經濟學家們墮入五層迷霧之中。爲什麼？是他們所憑據的理論荒謬？還是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瞭解不夠？

看來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由經濟學來回答的，有時候它們需要政治學，甚至心理學來回答。

問題看來并非都出在那些改革的理論和方案上，也許還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原因很大程度上關係到實施它們的那隻手。這是一隻有形的

手。

翻雲是這隻手，覆雨是這隻手，翻雲覆雨還是這隻手，它的一舉一動人們歷歷在目，有案可查，它怎麼可能「玩得轉」？

## 有形和無形的手

世界上有三隻手左右着人們的行爲。

第一是上帝之手。這是一隻無所不能，神祕莫測的手，人們可以從那裡爲所有無法解釋的現象找到歸宿。

第二是市場之手。這是一隻無所不在，鐵面無情的手。千百年來，它默默地導演着無數出「人間喜劇」。是亞當·斯密揭示了它的存在。人們可以從那裡爲無可奈何的事情找到歸宿。

第三隻手是國家之手。這是一隻反復無常的手，時而鋼強有力，時而弱不經風，它可以將社會舉上峰頂，也可以反手將它拋入深淵。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它的動作。

在這三隻手中，前兩隻是无形之手，後一隻是有形之手。

在中國，這隻有形的手佔據着絕對的主導地位，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它無情地抹掉了第一隻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強行鎮住了第二隻手。這一切從兩千年前就開始了，唐德剛教授的「國家強於社會」一文，對這一歷史過程有着精彩的描寫。（見「中國之春」第六十二期）

這隻手的控制力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達到了頂峰。它規劃投入產出，控制人口流動，調節需求供給，包攬衣食住行，它呼風喚雨，拔苗助長，在它最不可一世的時候，企圖用棍子把人民趕進天堂。



被趕向天堂之路的農民

可是終有一天，指揮這隻手的大腦們意識到他們錯了，他們要進行改革。他們同樣還是用這隻手，去彌補從前所造的孽。可是人們發現，這隻手在這時顯得那樣無力，以至它的每一個舉動都會成爲衆矢之的。



當這隻手把功勞全都歸於自己的時候，就已爲它成爲衆矢之的埋下了伏筆。如果一個政權把風調雨順歸功於自己，無疑就等着人民把天災人禍的怨氣發洩在它身上。歷史常常比人們想像得更幽默。

## 中國改革的困境

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優劣是經濟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在這一爭論中，人們常常把焦點集中在哪一隻手在經濟調節，資源配置方面更有效、更合理。可是如果我們跳出純經濟學的圈子來看這一爭論的話，兩者的優劣還有其它方面的意義。

社會改革中的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就是讓人們承認現狀，向前看，尤其是讓那些利益受損的人甘心情願地接受現實。否則，社會將陷在無休止的抱怨、翻案、復辟之中不得安寧，要麼就用強力剝奪所有受害者說話的權利。

在這一方面，無形之手無疑比有形之手具有更大的優越性。而且最大的優越之處就在於它「無形」。任何人，任何團體也不需爲這一社會結構調整的後果承擔責任。其後果是上帝冥冥所爲，市場幽靈作怪，人們的怨氣無處可洩，只能認命，於是社會將順利地渡過調整時期的陣痛，走向新生。

相反，以有形之手來執行社會改革的最大弱點正在於它「有形」，有具體的行爲和實體來承擔社會調整的後果。社會結構調整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其總不可避免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於他們看得見那隻有形之手的動作，就會把怨氣發洩在這隻手上，或者這隻手背後的具體人或團體身上。

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就深知其中奧妙。他知道物價上漲和削減工資都會造成工人實際收入

下降的相同效果。但他建議寧取前者而不取後者，因爲前一段更高明，其動作是無形的、隱蔽的，受害者一來不易查覺，二來即使查覺了他們受損也找不到具體發洩怨氣的對象。而後一動作顯然必須是有形之手所爲，必有人（一般是企業老板）來承擔責任。工人們有了明顯的抗議對象，很容易誘發罷工、示威和動亂。

中國的事情就更加複雜了。這隻有形之手過去不但包攬了一切，而且劣迹昭彰，以至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人們的不滿，中國大陸目前的改革，就陷在這樣一種困境中。

中國需要進行價格改革，以改變過去極不合理的比價關係。從理智上，這一主張是無人反對的。可是實際中問題并不那麼簡單。以中國過去絕對賣方市場的狀況，價格無論怎樣調整都意味着大幅度的通貨膨脹。商品的漲價盡管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後果，可是由於物價過去是被那隻有形之手按住的，人們又親眼看見它的上漲是由於按在那隻手松開了，他們自然會認爲物價是你國家「提」的，帳自然要算在政府頭上。

那隻「手」背後的腦瓜也不傻，他們明白這個道理，並採取兩種辦法：

第一是在一部分商品漲價同時，降低另一部分商品的價格，以達到苦樂均衡的效果。可是若每次來這麼一手，就更證實了價格的上漲是人爲的後果。不是嗎，既然國家可以「降低」某些價格，那些上漲的價格可不是國家「提升」的嗎？何況老百姓在佔便宜的時候很難查覺，而吃苦頭後絕不會忘記。

第二是增加工資或發放補貼。這是赤裸裸的有形之手的動作，它引起的麻煩就更大，攀比之風將不可遏止。

如果提高消費者收入的辦法是絕對平均的

，像發放補貼者一樣，每個人頭十元。那麼低收入和贍養人口多的職工會問：「憑什麼高收入者和工作人口多的家庭與我們一樣數人頭？物價上漲對我們的影響要比對他們大。」

如果按個人能力、學歷及貢獻評定工資或增加工資，五六十年代被「運動」耽誤了學業的知識分子，六七十年代被上山下鄉耽誤了青春的知識青年會憤憤不平：憑什麼八十年代畢業的大中專生比我們拿錢多，或和我們平起平坐？過去聽黨的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結果吃了大虧，並且又是造成他們吃虧的同一隻手在翻雲覆雨，他們能不憤怒地向黨討還青春嗎？

如果企業的工資水平與企業營利掛鉤，那麼虧損企業和微利企業的職工必然要與盈利企業攀比。其忿忿不平是自然，因爲國家不讓他們自由選擇企業和職業，硬把他們綁在那些倒霉的企業裡，他們憑什麼不能得到與其它企業職工同樣的待遇？況且，虧損企業的責任很大程度上不能由經營者生產者來負，而是過去國家的價格政策、稅收政策造成的，憑什麼這後者要由職工承擔？

對於這隻有形之手，不但群眾罵，黨政官員也在罵。

不是財政包干嗎？如果各省市平均「包干」，窮省的官員會大發牢騷：國家不投資，窮得叮嚀響，憑什麼讓我們和富省上繳同樣比例的錢？如果各省市不平均，上海等發達地區的官員會罵：憑什麼讓我們去養活那些窮地區？同樣是發達的沿海地區，憑什麼廣東省只上繳十幾億而我們要繳數百億？

稅收的道理亦同。若是固定稅率，一視同仁，窮企業會呱呱叫：苦樂不均；若是增加調節稅拉平差距，富企業又呱呱叫：鞭打快牛。

別以為爲光是利益受損者罵，發財致富者在罵。

發了財的人看問題有不同的角度，他們會說：憑什麼別人發財比我更大，憑什麼我明明能發大財，國家要層層限制，拿去大頭讓我得小頭？萬一國家要安撫一下「紅眼病」的窮人而採取措施砍掉他們冒的尖，他們又會大叫：殺富濟貧。

總之，無論哪個社會，人們都會有無窮無盡的怨氣。碗裡有沒有肉有待考查，可嘴裡罵娘在所難免。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治世的區別不在消滅這些不滿，而在於讓人們無處可洩，自吞自嚙，使社會保持「向前看」的衝力和活力。

我們並不是說有形之手今天在中國幹的事情都是錯的。它成爲衆矢之的的原因一是因爲它從前幹的蠢事錯事太多；二是因爲它的一舉一動人們都看得見。前者提供「矢」，後者提供「的」。

其實今天中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把有形之手變爲無形之手，這本來是值得鼓勵的一步。可是群衆考慮問題的角度和理論家不同，他們的出發點是切身利益。

這隻手曾經包攬了人們的衣食住行，可現在要撒手不管了，那怎麼行？過去三元錢房租，二十元錢伙食費，可現在取消食品房租補貼，一個月一百元伙食費，還要房屋商品化，逼着人們花數萬元買房子。人們當然會不滿：「想推卸責任？豈有此理！」

這隻手曾經劣迹昭彰。它曾製造大鍋飯，將平等的待遇強加在每個人頭上；它曾規劃一切，搞得經濟弊端叢生，資源浪費驚人。可是現在這隻手却要悄悄地隱退、消失，讓市場幽靈去承擔「不平等」的後果和結構調整的陣痛。

人們當然會憤然：「想賴掉罪責？談何容易！」

以上就是彌漫在十億中國人心中的情緒，這不是理論問題，也沒有任何道理可講，這是現實，是社會改革者必須面對的現實。怎麼辦？

### 幾種可能的出路

出路無非有四條：

第一是共產黨的傳統作法，拋出替罪羊，把從前所有爛帳、舊帳都堆到他身上，讓這隻替罪羊成爲衆矢之的的靶子，吸收人們的不滿和憤怒，使所有的人都承認現狀，一切重新開始。這一手，在共產黨的統治史上是屢試不爽的。替罪羊的名單有長長一串：托洛斯基、布哈林、赫魯曉夫、納吉、杜布切克、哥穆爾卡、劉少奇、林彪、四人幫、胡耀邦，等等。如果這一幕在中國重演，下一個替罪羊將是趙紫陽。

人們常說「要對歷史負責」。現在中國正面臨這個問題：誰去對歷史的爛帳負責？替罪羊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在統治集團中犧牲一個（批）人，讓他（們）去背歷史的黑鍋，從而開脫其他人以及整個集團，爲他們修改政策創造條件和借口。「誰對歷史負責」，這是每一場社會變革所必須考慮和解決的問題。背這個黑鍋的要麼是上帝或市場幽靈，要麼是具體的人或集團。

第二是學習西方的經驗，建立兩黨或多黨政治。在兩黨政治中，社會不會走進中國今天的死胡同。一個黨把事情搞糟了，自然背着歷史的爛帳下台。只要換一個黨執政，政策就可以大幅度地轉變，社會將順利渡過政策調整的

陣痛，不會有任何尷尬的場面或矛盾的僵局。這樣一來，在社會的轉型期，「誰對歷史負責」的問題圓滿解決。不要以爲兩黨制僅僅是兩黨輪流執政，兩黨同時也輪流背黑鍋。後一種功能比前一種功能更重要。首先要有背黑鍋，才有可能另起爐灶。所以下台的黨同樣爲社會作出貢獻，其功能之一就是當箭靶子。

第三條出路是改革領導者堅決而有步驟地撒手，將有形之手化爲無形之手，硬着頭皮闖過計劃——市場轉軌這一關，不但開放消費市場而且開放生產要素市場。在這個過程中，今天的價格改革遠不是中共的鬼門關，真正的鬼門關是勞動力市場的開放。到那時，在那隻有形之手背後的中共政權的強度，將要經受民怨沸騰的考驗。

只要改革衝過這一關，隨着有形之手的消失，人們將逐漸忘記它的政績，習慣於無形之手的調節。社會將了結歷史舊帳，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前進。這一過程需要一代人的時間。

第四，改革者衝不過市場轉軌這一關，社會產生動亂，政府倒閣，實行軍管，或爆發革命。經過一段時期動亂之後，人們終於承認了現狀，了結了歷史的舊帳，社會將從一個廢墟上重新開始進步。

第一條出路意味着改革的倒退。有形之手所造的爛帳早已由四人幫和華國鋒背上了，新的替罪羊所需背的黑鍋將是轉軌時期的爛帳，改革失敗的後果。這一替罪羊的最佳人選無疑是改革派的趙紫陽，而趙紫陽被拋出之後，政策將會趨於保守，中國的經濟體制將會向東歐靠攏。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用這一手解圍是否還像從前那樣頗靈值得懷疑。替罪羊的方式需要以人民極端愚昧和中央集權有能力對人們思想和輿論嚴密控制爲前提。這一前提在中國顯然

不存在。既然找四人幫算帳都沒有平息中國人民的不滿和疑慮，也無法了結歷史舊帳，下一個替罪羊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這一手開始靈，用多了就不靈了。

第二條道路對中國來說無疑是最光明的；它意味着中國的改革有可能徹底成功，當然這一改革將不再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若想為中華民族做一次貢獻（或犧牲）的話，就勇敢地背起黑鍋下台，以求青史留名。

也許有的人對這一條出路不以為然，他們會重復共產黨的論調：「在中國，除了共產黨，沒有一個政治力量有能力領導改革。」且慢，這句話若在蘇聯說，可能是實話。可在中國說就是睜眼睛話。就在近在咫尺的台灣，確實存在着一個完全有能力接管中國大陸政權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存在一個現成的影子內閣；全套的幹部班子和人才儲備，七十餘年的執政經驗，和近四十年來遠在中共之上的政績。

這一條路對於共產黨來說絕不是亡黨之路而恰恰是新生之路。只要兩（多）黨制規則確定，反正黑鍋輪流背，國民黨或其它黨也終有一天會背着歷史的爛帳下台，共產黨仍有可能東山再起。比起其它三條路，這是唯一一條能使共產黨長存的出路。

至於第三條和第四條出路，只不過是同一種選擇可能出現的兩種不同的後果。對於中華民族來說，第三條路無疑比第四條路強得多，不但社會損害小，而且進步快。可是對於中共專制政權來說，這只是個如何垮台和何時垮台的問題，簡單說就是「惡終」還是「善終」的問題。市場經濟的奠定，不但宣告共產主義整個理論體系的破產，而且將為一黨專制的制度敲響喪鐘。到那時，共產黨的沒日就真正是指日以待了。

● 文藝園地 ●

# 詩三首

## 奪華



(一)

啊，你不要停留  
不要停留  
火已經熄滅  
夢也已清醒  
你這似曾相識的朋友

沒有悔恨  
也沒有回憶  
更談不上憂愁  
或許只有無怨的凝視  
大概早已凍僵的雙手

當你默默地走向遠方  
我將要俯下身軀  
捧起你留在雪中的足跡  
放在我尚有餘溫的心頭

啊，回頭張望的你  
不要停留  
不要停留……

(二)

在灰燼中、在餘焰裡  
在掙扎中、在失落裡  
有一注清泉  
有一瀉月光  
我滿懷感激，多麼驚訝

在漩渦裡、在激流中  
在沉淪裡、在奮鬥中  
那一綫希望  
那一葉遠帆  
我屏住氣息，多麼焦慮

(三)

憤怒  
交織成一片無可解釋的圖案  
在昏睡中飛翔

輕蔑  
把你那扭曲的欲望  
丟在濕漉漉的地上

匍匐  
在時間的盡頭處  
雨向天上飄去  
又聚成血染的霞

走來  
輕輕地走來  
沒有露水和花香  
就又在朦朧中湮滅

# 「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 談

### 于大海

#### 一、大陸非共力量的興起

中國政治近年來最重要的發展，從長遠看，要數大陸非共力量的興起了。從一九四九年到七十年代中，中共對大陸上任何異己力量都實行了最殘酷的鎮壓，連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詮釋的人，如張志新等，也毫不留情。中共幹了許多不得人心的事，心很虛，聽到稍有不同聲音便感到了威脅，所以對鏟除異己特別果斷。

一九八六年以來海內外事態的發展，表明許多大陸人士已徹底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也表明中共已沒有能力懲罰所有公開不相信共產主義的大陸人士。換言之，中國大陸的非共力量，從此將公開、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是比鄧小平改革還重要的事情。中共的劣迹太多了。如果大陸稍有民主，中共早就會下台了。換言之，中共之所以仍在台上，是因為大陸的不民主。大陸非共力量的成型，將直接威脅到中共的地位。

有一次我去一家中國雜貨店，店老板對我說，你們老共現在也聽鄧麗君了。我告訴他，我來自中國大陸，但不是老共。正相反，我對中共的許多作為都不贊成。我認為大陸的出路只有兩條：或者中共放棄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或者中共下台。

大陸的非共力量，問世未久，既沒有共同的綱領，也沒有足以聯合各方的組織。以上的「兩條出路論」，也許可以臨時作為一種共識。本文以下將基於這一共識展開論述。



于大海（中）在兩岸問題討論會上

七十年代末中共被迫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對外開放從根本上是與共產主義制度不能相容的。首先，開放給大陸人民提供了多樣的信息渠道。知識界和大陸學生透過香港的雜誌和美國之音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真象，一般民衆也從街頭巷尾瞭解到「外國人」是如何的關氣。新的信息渠道，引發了人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和對中共的信任、信心危機。「三信危機」是中共的危機。它表明大陸人民開始了獨立的思考。

「三信危機」喚起了大陸民間人士一向受到壓抑的政治熱情。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民辦刊物的流行，一九八〇年的大學生競選風潮等，都是這種熱情的體現。不過，在那時，民間人士的命運還完全掌握在中共的手裡，民間人士在理論上多半也還沒有跳出馬列主義的框框，所主張的不外是「民主共產主義」之類的空想，離現代觀念還有較大距離。

一九八六年的大陸學生運動，與以前的學潮和民運高潮相比，有兩個鮮明的特點。首先，中共已沒有能力完全控制局勢。學潮延續的二十余天中，中共只有靜觀、干着急。第二，學潮的主調，不再牽附於馬列主義理論，而是直搬「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大有「全盤西化」的味道。一九八七年初，大陸留美學生一千六百多人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對中共中央的決定表示反對。這是大批大陸留學生首次以自由的姿態過問中國政治。受到中共攻擊誹謗的方勵之等人，不但不認錯，反而一有機會便將自己的「反動思想」發揮一番。而中共則不但拿在外的留學生沒有辦法，爲了維持其開明形象，對方勵之等人也只好暫且容讓幾分。世道真是變了。

## 二、三民主義就三民主義

從上面提到的共識出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就沒有什麼不可以接受的。三民主義顯然比共產主義更接近於現代觀念，台灣的經濟就會發展也遠比大陸有成就。制度好了，統一不統一似乎並不重要，統一就統一吧。何樂而不為呢？

大陸人士不接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大約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許多人覺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可能。其實，指望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又何償「可能」呢？畢竟，世界上還沒有過共產主義國家轉變為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先例。應當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或中共下台，都是很難達到的目標。用民聯主席胡平的話說，這叫「請神容易送神難」。正因如此，大陸非共人士才應當多管齊下，以使可能性最大化。既然大陸人士是以大陸非共產主義化為目標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希望雖小，也應當去爭取。

況且，即使達不到非共產主義化的目標，想出各種辦法向中共施加壓力，至少可使中共最大程度地偏離共產主義。

第二，許多大陸人士覺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意味着內戰和暴力。實際上，這個口號很有彈性，既可解釋為國民黨重返大陸執政，也可解釋為中共或其它力量改以三民主義治理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比「反攻大陸」好，正是好在這裡。

第三，許多大陸人士對「主義」特別反感，認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以一種特定的主義取代另一種特定的主義，從而與民主觀念

不相符合。這是一種可悲的誤解。三民主義是一種包容的主義。三民主義不變的靈魂，與現代西方的國家觀念是完全吻合的。三民主義，也就是主張「民有、民治、民享」的主義。三民主義在實際政治中的體現，是一九四六年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保證了各黨派在政治上競爭的權利，保證了人民的人權和自由，并特別注意到權力的制衡。比之任何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都要優越的多。以三民主義取代共產主義，其特定含義，就是以中華民國憲法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才制定出來的。大陸人士與其重新打鼓另開張，倒真是不如重新打起中華民國的旗幟。在中華民國憲法制定過程中，中共代表對其要點也都表示過同意。使中共重新接受中華民國憲法，因而比他接受非共人士新的建國主張要容易些。

## 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台灣

第四，許多大陸人士覺得接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於向台灣一邊倒。他們的用心，又可一分為二。一方面，他們耽心和國民黨喊同樣的口號會把名聲搞臭。這種想法，錯在不瞭解香和臭的本源。名聲的香臭，大體有兩種本源，一種是本質的好壞，一種是實力的強弱。台灣的制度和表現，不知比大陸好了多少，然而台灣多年來在國際社會上，却處處受人冷落和侮辱。其原因，在於大陸是「政治大國」，控制的人口土地多，有原子彈，在聯合國又有否決權。中國民聯也有很多好的主張，但因爲民聯更沒有實力，中共連戰也不和它統。名

聲與實力相關是個討厭的事實。然而，實力不是一成不變的。大陸非共力量的迅速成長，是誰也阻攔不了的。非共人士只要投入大陸非共產主義化的活動，名聲反正暫時會被中共搞壞，大可不必顧慮從台灣粘到臭味。

有些大陸人士耽心與國民黨認國會得罪台灣民衆。的確，國民黨政府將資源用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上，可能會損害台灣民衆的利益。對這一可能的利益衝突，我有三點評論。第一，台灣民衆的生活能像今天這樣幸福，是與台灣人民的貢獻分不開的。這當中，包括蔣介石、蔣經國這樣的領袖人物的貢獻。第二，按照中共現在的政策，台灣每時每刻都不安全。將中國統一在三民主義之下後，台灣不會受共產主義的害了，台灣民衆的利益就有了切實的保障。

第三，胡平曾多次提到，大陸人士關心的是大陸的事情。我覺得這個提法需要一點修正。卷入實際政治運作以後，最重要的，不再是對哪方面的事情有興趣，而是代表誰的利益。大陸人士，應當關心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并利用一切機會促進大陸人民的利益。按照這個原則，大陸人士在遇到可能的利益衝突時，理應着重考慮大陸人民的利益。這是天經地義的，是同義重復。大陸人士，沒有理由爲此羞愧。大陸人士不願向台灣一邊倒，其用心的另一個方面，是耽心失去獨立性。這種耽心，其實也不必要。有人在觀察台灣的事態後得出結論說，在台灣，現在有一件事只能說不能做，那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一件事只能做不能說，那就是台獨。這個觀察雖不準確，却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大陸人士應當耽心的，不是自己會被國民黨當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

工具。他們應當耽心的，是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光說不做。國民黨在台灣一住近四十年，黨內像蔣介石那樣念念不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物越來越少了。現在國民黨內的所謂「改革派」，多是一些與大陸缺少血肉關係的人。他們所主張的國會全面改選等，弄不好，會進一步抽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實際內容。這對大陸的非共產主義化顯然是不利的。大陸的非共人士，正可以以切身的經驗，向台灣各界人士訴說大陸民衆的辛苦，訴說他們久旱盼甘雨的心情，並從國民黨的歷史傳統出發，向國民黨人士進言，敦促他們真正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針。

楊小凱曾提到大陸、台灣及兩岸民間人士已形成一個力量三角。其實，從大陸人士的觀點出發，這第三角的形成還剛剛開始。大陸人士認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不但可以向中共提出挑戰，也會對國民黨施加獨特的影響，正可以促進這第三角的形成。

總之，現在是大陸非共人士認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時候了。

編者按：  
從中國大陸來的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探討似乎不太多，于大海的這篇文章對「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做了正面的研討，也許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 中共不應介入

# 大陸留學生聯誼會

大陸訪問學者 · 肖昆珠

五月份在舊金山肯塔基大學發生的大陸留學生、學者聯誼會選舉事件，充分暴露中共大使館無視民主、自由，鎮壓學生，控制留學生聯誼會的不光彩嘴臉。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絕對不能容許中共把專制、獨裁的毒菌散佈到這塊自由的土地上來。

貴州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故願借貴刊一角，聲援肯塔基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聯誼會。我們認為只有任松林、吳方城兩位才有合法資格擔任該校聯誼會的正、副會長。因為他們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並得到學校當局承認的肯塔基大學大陸留學生聯誼會的合法領導人，中共大使館沒有「不予接受」的權利。與此同時，我們強烈要求中共大使館的俞肇基、夏穎奇兩位先生，向全美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承認錯誤。中共大使館必需保證今後不得以任何方式介入和控制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聯誼會。以及保證中共大使館官員在肯塔基大學留學生、學者聯誼會選舉中所導演的醜劇不再重演。

大陸留學生、學者在美國各大學的聯誼會應該是一個獨立的，由學生、學者自己管理的組織。它應當為中國留學生服務，促進中美雙方的溝通和瞭解，而不應當帶有任何政治色彩。其領導人應該由留學生與學者經民主的方式自由選舉。遺憾的是，長期以來，許多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聯誼會都受到中國大使館的控制。聯誼會會長選舉常流於形式。選舉前不知或只部分通知留學生和學者，因此選舉時常常只有少數人出席。或者只是在放電影之前，用極短的時間，匆匆忙忙來一個走過場式的選舉；選舉後很少公佈當選人的得票數目。尤有甚者，有些被中共大使館嚴格控制的學校，有時竟然不經過選舉就可以產生新的聯誼會正、副會長。



# 台灣民主政黨政治的發展

(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 邱垂亮

前景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不管是兩黨制或是多黨制，能夠長期成功運作，當然有其諸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歷史因素。尤其是在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發展上，更是有其長遠深厚的「心路歷程」，那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工程或政治決策現象。不過，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循環因果關係，以及兩者與政治行為之間的互動因果關係，最近較新的研究結果顯示，文化決定論的說法非常值得商榷，並不是像六〇、七〇年代那麼普遍受到認同和肯定。

最近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模式和維德弗哥爾(K. WITTEGEL)的東方專制制度，已經被人冷落多年後再度受到重視和議論。但是，明顯地，政治制度論比政治文化論要受到更多更決定性的注意和關切。比如澳洲國立大學的思想學大師卡門克(EUGENE KAMENKA)最近就發表論文，基本上否定了馬、維兩氏因為農業生產模式而導至長期專制政治的說法，他強調中國秦漢以下大統一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思想融合發展的獨裁精英領導制度，方是東方專制政治制度的主要形成因素。

「怪圈」的突破

歷史宏觀地看，這個論點一定還有甚多可爭議的地方。但是，政治微觀地來看，它實在很有道理，很有說服力，很可以一刀切斷文化與制度、人與制度之間的「怪圈」關係。

從這個政治微觀的政治制度和領導制度來看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無疑地其成功運作的基礎是政權理性公平分配的明確制度化。不只是在美國、英國和澳洲兩個主要政黨都有輪流執政的制度化機會，就是多黨制的法國、意大利，甚至日本，林立的小黨都認為有同樣公平分配權力(如成立聯合政府)的制度化機會。

所以，這些民主政黨之間沒有「敵我矛盾」的革命情緒，它們都不是主張改革甚至推翻現有政治制度的革命政黨，都沒有誘使人民走向暴力革命的意識形態，都在政策選擇上在半斤八兩之間地爭去，誰勝誰敗都無傷「政治大雅」，都根本不需要天縱英明強人政治的領導人物。不只是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就是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與共產黨或日本的自民黨與社會黨之間，也都如此，都是半斤八兩，都在拚命避免政策、意識形態的兩極化，都在拚命往中間地帶擠，

向中產階級訴求爭取擁護和支持。

制度化與政策化

以上述幾點簡略的政治論點來看後蔣經國時代台灣的民主政黨政治的發展前途，首先應先摒除中國傳統專制政治文化的因素，自己不民主拚命大罵祖宗不民主，實在沒有什麼道理。還有隨着蔣經國先生的去世，台灣的強人政治領導制度也應終止了。

留下來的就是民主政黨制度化和政黨政治可行政策化的問題。在這兩個微觀政治的實際運作層次上，台灣民主政治還面臨一連串死結重重的困難。在政黨民主化方面，執政的國民黨最近針對黨的體質特性加以檢討轉換，有關幕僚研究機構已提出初步研究結果，擬在自由地區的組織運作方面，定性為「民主政黨」，但針對光復大陸任務，則仍定性為「革命民主政黨」。這實在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黨定性法。假如工黨主張和中共談統一實行社會主義，假如民進黨主張「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或台灣獨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執政黨的身份應該以「民主政黨」還是以「革命民主政黨」的政黨政治、政黨關係來應對，恐怕誰也搞不清楚。

同樣地，反過來看，假如民進黨裡面的激進派，不聽黃信介、張俊宏等人的理性之言，放棄目前死結重重的統、獨之爭，非要把民進黨拉進革命政黨的死巷不可，國民黨除了大動國安法的干戈，以革命政黨之名、之威把民進黨投入牢獄之外，它又有什麼其它的政策選擇餘地？

國民黨大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樣統一中國十年、二十年內可能嗎？民進黨有人大叫「台灣應該獨立」，台灣十年、二十年內能獨立嗎？它們不只是目前不可行的政策，還要被一再盲目地意識形態化和革命化，變得其政策面目全非。

### 民心所在

這個統、獨問題不除，老實講台灣的政黨政治不可能真正民主制度化。

可喜的是，最近有些跡象顯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有識之士，在李登輝繼任國府總統和執政黨黨主席的過程中都逐漸看清和瞭解了這一問題。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後的事，不是現在必須馬上提上議程表、要做抉擇、要解決的。現在馬上必須政策性做決定、解決問題的，是國會重整、地方自治法制化、勞工福利、環境保護、人民醫療保險、巨大的外匯保存運用等燒及眉頭的政策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在朝在野之間的民主政治認同差距不大。雙方都瞭解，這些政策之抉擇、之推展、之成敗、實現方是台灣大部份選民的心向所在，方是決定下次選舉、甚至是幾年後誰執政誰在野的政治關鍵所在。

所以，怕民心向背，國民黨領導精英這次方團結一致抵制「宮庭政變」，方決定大幅度

地改革國會並不設大陸席次，方提出折衷辦法，主張台北和高雄兩市市長直接民選，方有總統李登輝和行政院長俞國華競辦記者招待會，方一再容忍和民進黨展開各種管道的溝通活動，方在今年的國建會中恢復了政治外交組。同樣地，怕民心向背，民進黨在李登輝上台後，忽然才發現他們一夜之間失去了一大堆有力的政治訴求，他們可行性政策發展非常殘缺不全，他們非快速創造可爭取民心、可行有效性的政策不可，他們再每事上街示威遊行製造群眾運動已不得民心，已不可能大量增加他們的選票，更不可能有一天經過選舉由在野變成在朝。

所以，很多民進黨的黨員開始同意黃信介和張俊宏放棄統、獨之爭的呼籲，開始支持該黨今年的主要政策追求是國會全面改選的政治主張，而在蔡有全和許曹德的台獨案以及許信良的回國案上採取比較低姿態、比較要求國民黨顯示政治道德和政治正義的做法。

### 可爭的中心議題

雖然國民黨在蔡、許案上實在應該做出更大的人道主義的讓步；但是基本上在大多數數現在密切攸關台灣民主政治實質發展的政黨政治和政治決策問題上，台灣兩個主要政黨最近的做法是對的，是值得正面肯定的。

要爭民心和選票，就要爭為民服務、為民造福的政策。所以民主政黨政治必須政策取向。要發展政策取向的民主政黨政治，就要建立一個政治遊戲規則公平公正、政權合理公道分配的政治制度。在這個政治制度的建樹上，無疑地國民黨還要更多的讓步、更大的改革。譬如台灣省長為什麼不直接民選，實在無法讓

人諒解。

到頭來，當然最重要的是國會全面改選。只有當國會全面改選時，政權公平分配的基本政治機制方能落實建立起來。在後蔣經國的台灣，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這一決定性的關鍵問題上都有相當一致的共識。以此做為未來一兩年中兩黨民主政黨政治政策交戰的中心議題，實在非常恰當，非常適合台灣目前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非常有成功的希望。

國會全面改選的目的達到了，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確立了，民主政黨政治上軌道了，其它的問題，如黨政軍分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黨內民主、言論自由等等，都應該可以水到渠成，迎刃而解。至於歷史性的統一和台獨問題，它們存在着太多國民黨與民進黨都無法掌握的外在因素，大概只有留給歷史去解決了。

(國民黨十三大會場)





# 胡平與朱高正

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策劃孟文傳依傑整理

## 對談民主運動

### 編者按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朱高正，在訪美期間，六月十二日到皇后區法拉盛「台灣會館」講演，數百多名反對他的華人在門前示威，最後演變成暴力場面，是「中國城」罕見的騷動。

在哈佛大學研究的中國大陸青年學人胡平，也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雖然工作的對象是大陸，但對台灣民主運動的進展也向極關切，他十四日上午和朱高正會面，以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討論追求民主的手段，彼此的政治信念有時不謀而合，有時針鋒相對。

這兩位台灣海峽兩岸從事民運的人士，都是研習哲學的人，在政治領域中都十分活躍，他們兩人觀點相同和相異之處，不僅反映了政治人物的看法和態度，也可供我們社會思考，來決定我們在追求民主的大方向上，走什麼樣的路。

會談記錄是根據錄音帶整理，限於時間，未及經朱、胡兩先生過目。

朱高正（以下簡稱朱）：在大陸能搞民主運動嗎？

胡平（以下簡稱胡）：還是能搞的，當然比您那兒困難得多。您看這些日子北大學生示威遊行，搞得厲害得很。

朱：對對……但大陸的「國家機器」還是太僵化了。

胡：那當然。比台灣差。

朱：在台灣要搞（民主運動），極右派的勢力還是不能忽視的。

胡：從大陸的眼光來看，台灣已經搞得挺不錯了。大陸對民主政治的要求，並不是脫離實際的。我們看事情，可能比其它國家更實際些。人類能走到如今這個地步，很不容易。譬如台灣，你身為反對派，能夠在議會上大聲疾呼、嚴辭批評，我們認為已經很不容易、很不錯了。這是我們對台灣評價非常好的原因。當然，台灣還有些毛病，也是該改的，但與大陸比較起來，已相當好了。

我認為，廿世紀以來，不管是德國的納粹、義大利的法西斯或是其它專制集團國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啓示，就是人類社會可以搞得

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糟；因為一般人想像不到這麼糟，所以對已有的好東西並不是很珍惜。

大陸上已有的民主、自由的因素肯定比台灣少得多，但我們仍主張以民主的方法爭取民主，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相信可以以和平方式逐步推進民主。使用這種方式，一方面意味現在（大陸）還不是很民主，因為很民主就睡不着去爭取了；另一方面這意味現在已有一點民主了，因為若一點民主都沒有，如何用民主的方式去爭取民主？所以我們基本上都贊成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爭取民主，當然我們也明白以這種方式會有很多問題，但我們仍堅持走這條路。在大陸留學生中，我相信我的說法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們很受台灣政治民主化鼓舞，也特別擔心台灣民主化遭受挫折，所以很希望台灣的民主能很順利的發展。因為，若台灣自由民主化出了問題，中共保守派一定更有話說：「瞧，中國人怎能搞民主？台灣打得一場糊塗，可見還是照我們的方式才好。」所以我們希望台灣執政黨能加速改革的步伐，而民間的力量也能更理性、更克制一些。

雖然角度不同，但大陸對台灣的民主進展已經很羨慕了，總覺得你們大可不必那麼焦急。方勵之曾說，新觀念很少是靠說服舊觀念取勝的，只不過持舊觀念的人都死光了。當然這話有毛病，如果新觀點沒有傳播的機會，那麼新人起來還是舊觀點。台灣現在談國會資深代表的時候，在我看都不是很緊要的事，都可以用時間來解決；因為在台灣，反對派的聲音顯然是可以聽得見的。

朱：民主並沒有客觀的標準，民主化的意義，是代表一個過程，是動態的，是一種不斷在超越現存不合理的努力。我認為你的思想中有一個矛盾：你剛才說，新人上台也會有舊觀念，這個現實就發生在台灣。老的不讓他們走，接上來的就還是老觀念。民主是一種不斷的進展過程，你何時停下來，守舊勢力就馬上抬頭。改革的步伐，不動則已，一動必是步步向前。我不反對克制，民進黨已經很自我節制了，甚至比國民黨尤有過之。在反對黨從事民主運動的鬥爭過程中，如果執政黨在改，我們一定給它機會，因為我們不願意讓保守派來壓抑企求改革的人。但一旦改革停頓，執政黨覺得不改，反對黨也不會怎麼樣時，我們就應加以逼促，這是常常在互動的，並非只看單方面的。

你本身是從事民運的人，認為應多加自我節制，但就你剛才所說，我感覺你們這些持有不同意見者，與中共政權間的互動還沒開始；遊戲都還沒開始；更不要說遊戲規則了。但我們與國民黨早有遊戲規則，已有一定程度的互動。我們每一個動作都影響到他們內部的互動，反之亦然。而且也會影響到雙方關係的互動。身處其中，才會感受到自己是權力的一環（Power unit）。

胡：能到這一步，依我看，這就證明已經比較民主了。

朱：其實，你剛才講的都是從大陸的觀點來看台灣，以我們的觀點來看就不一樣。國民黨何其有幸，能盤踞在台灣四十年，軍情特無孔不入，比大陸管制得還嚴。

胡：要超過大陸我看還不至於。

朱：我告訴你，前些日子有人統計，台灣每十個人中難免就有一人是特務……

胡：但就我們所知，台灣一直有這麼一批人，在很尖銳的批判國民黨，這種情況本身就證明情況不是想像的那麼糟。我常對美國人說，如果你聽到大陸情況很不好，這反而代表情況好，真正情況不好時，你們是聽不到的。那一個社會能做到像大陸那樣滴水不漏的地步？

朱：你對台灣的情況顯然不瞭解。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台灣政治犯的遭遇何其悲慘……政治犯的女兒被強姦是天經地義的事，國民黨絕不會加以保護，政治犯的家屬幾乎被剔除在法律的保護之外。

胡：大陸乾脆就規定那種人屬於專政的對象。

朱：專政對象你還能防範，我告訴你，台灣人常常這麼說，日本統治時，明白說台灣人就是二等國民；但國民黨來台後，口裡說台灣人是同胞，但幹的都是比日本人他媽的還過份的動作。我告訴你，一九七九年以後，台灣有很大的轉變。當時美麗島政治犯大審，八名優秀、善良的老百姓突然變成了叛亂分子。國民黨最大的敗筆就是美麗島事件。若不是藉此迫害反對人士，大家還不知道他們原來這麼可惡。為什麼國民黨會被共產黨趕出來？很簡單，就是國民黨在大陸幹得比共產黨還過份！

胡：這種話一般來說並不成立。秦能統一六國，絕不是秦比六國更仁道；希特勒能佔領法國，絕不是德國比法國更好。這是兩回事，絕不能因為誰成功、誰失敗、就論定成者一定比敗者好。我們在大陸上，從所接受的教育中，顯然知道國民黨幹了很多錯事，但從當時的民主人士甚至共產黨本身的人所遭受的經歷證明，他們在文革所受的壓制比在國民黨時更厲害。當然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大陸與台灣現在的情況都已不同了。就台灣而言，我所關心的就是希望民主能正常的發展。作為反對的力量，當然應將民主向前推進，但不能太性急……

朱：你所說的正是國民黨那一套。好像是說只要我們不要性急，國民黨自然會引進民主改革……

胡：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朱：不，一定是這樣。我告訴你，以前的反對運動，只是辦雜誌，有用嗎？

胡：那當然有用……

朱：完全沒有用，我告訴你，完全沒有用。

胡：那什麼才有用呢？

朱：你不懂，我告訴你，台灣四十年來自由民主的言論在水平上並沒有提升。「自由中國」時代雷震他們寫的東西很古典，張俊宏在這方面沒有超越。我自認在這方面也有貢獻，但基本上沒有突破大框框。但不同的在那裡？張俊宏代表本地的知識分子，自己承襲下來了。我們則已脫離純理論階段，而進入實踐的階段。

胡：但這並不否認言論本身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只是說它並不等於一切，它並不是不起作用。

朱：在中國大陸，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自由的言論。

胡：要是有的，就好了。

朱：我早在六、七年前在歐洲看到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在大陸已有出版，也翻譯出來了。

胡：這是有。比這更厲害的也有。

朱：我那時候說，我在台灣都看不到。你知不知道，斯賓諾莎這種主流哲學家的自由民主言論，在台灣看不到，只能從胡適的二手介紹得知一點。胡適在我看來也不是什麼有深度的人！可是斯賓諾莎著作可以在大陸看到。我就在想，影響有多大？後來碰到一位從大陸來的人，他講的很實際。他說，「人民出版社」五千本發下去，中國那麼大，就像滄海一粟，什麼都看不到。而且也不能夠變成一個話題。沒有人會把它當作嚴肅問題討論。實際影響才是最重要的。

在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當中，有很多很多的「臭老九」參加，知識分子，我就稱他們為「臭老九」。他們在討論民主自由的時候，認為是良心的事，而且還可以滿足他們所謂的「道德勇氣」。我是比別人更有良知的，真正正在推動民主。我告訴你，民主運動就是一個權力鬥爭。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不是在搞權力鬥爭的話，把民主理論當清談，免了！對推動民主是沒有用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大陸和台灣在民主進展上互動。去年一月，蔣經國作了一個重要決定。民進黨剛組黨不久，我們進入議會，那時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氣氛緊張，蔣經國堅持要走民主、改革、開放道路，內部有阻力。但促成蔣此次決定的主要原因，要感謝大陸，呵呵。鄧小平罷黜胡

耀邦，國際為之震撼。大家疑慮，中共改革又要銷聲匿迹了。這剛好給蔣經國一個反面教材——「中共壞，我們絕對不能壞。」又因為菲律賓人在權力轉換很成功，艾奎諾夫人現在在菲律賓搞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時艾奎諾夫人因人民投票和軍事政變上台，在國際上一片好評。因此一壞一好，促使蔣經國接受台灣應該一步一步邁向改革。這一點，奠定了蔣經國最後一年的歷史功績。他的內部壓力是很大的，而居然能容忍反對黨成立，繼續開放，是相當有貢獻的。中國歷史上千古一人而已，容忍有組織的反對努力存在、發展。

我給鄧小平的評價很高，他復出以來，沒有讓人失望過。他罷黜胡耀邦是一種策略性轉進，對保守派作階段性讓步，在去年中共十三大的時候，把著名的保守派砍掉，也就是在這段期間避開讓保守派勢力擴張，造成十三大權力傳承接班的無謂困擾，所以先把胡耀邦罷黜，這點很成功，我現在站在台灣也可以勸你們，不必那麼急嘛！鄧小平會設法改革。請問你，如果不給鄧小平施壓力的話，鄧會很堅決的走改革路線嗎？也不見得。一個比較實際的政客都會考慮，如果不這樣作會怎麼樣？我們不能假定，這些政客都會為國為民謀福利。我不相信這點。我相信，他希望在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過程中，兩害相權取其輕，避免對他權力有威脅。民進黨的壓力越大的話，它一定作某種回應，這就是政治術。

胡：有兩個問題。第一，關於權力的問題，搞政治當然要權力，但是簡單一句話，搞民主和搞專制，一個選擇手段，一個不擇手段。一個是把自己的作法和目標，限制在一個範圍之內，超過那個範圍，絕不去作。

朱：也不見得。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沒有什麼選擇手段和不擇手段的區別，都一樣，都一樣啦！

胡：那！譬如那些掌握權力的人為什麼不把你幹掉呢？從權力鬥爭的角度著眼，手裡握著槍桿子，把你幹掉，沒什麼不可以。何必放你一馬，讓你有機會再起來，把他打倒。他不是傻瓜嗎？

朱：民主和專制的差別不在這！

胡：當然，但是有這個選擇手段和不擇手段的重要差別。

朱：不！不！民主和專制不在這！

胡：我說的不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而是民主和專制區別。

朱：你講民主國家政客選擇手段，專制不擇手段，沒有這回事，統統一樣！統統是不擇手段。唯一的差別是民主國家有比較明確的框框，政客至少在外表的行為要符合框框要求。在框內，你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如果你違反框框被揪出來，你就完蛋了。在專制國家內，沒有那麼明確的框框，但是他們還是有習慣啊！在帝王專制時代，還有家法嘛！問題是民主和專制的框框不同。民主國家框框好比競技場，只要經由一定程序，每個人都有相等的機會進去競技，你進場條件是開放的。專制不一定開放，要講血緣，沒有客觀標準。現在要問，是誰在訂框框？在民主國家是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共同議定規則。專制國家中統治者片面決定進場規則。至於一個政客，只要有利可圖就行，別人不知道我用什麼蹩腳的技術，我何樂而不為呢？我當然幹了！

胡：這就是我聽說台灣和大陸沒有人願意認真遵守交通規則的原因。在美國，半夜三更，四處無車，周圍沒有警察，沒人開罰單，關

紅燈絕不會出事，但是大多數美國人見到紅燈亮，還是把車停下來。他是傻瓜嗎？何必如此浪費時間和汽油呢？顯然他覺得是應該遵守的，他不是僅僅因為怕罰才停。同樣，一個民主社會之中，一個政治人物應該遵守民主規則。當然有人想偷雞。但是一個民主社會之所以能維持，在於其中有很多政治人物和大多數公眾認為民主規定是應該遵守的，而不是僅僅怕罰。我犯規，總有別人看不見的時候。在民主社會沒有無處不在的「老大哥的眼睛」盯着你看，你必須相當自律。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一批人認為沒有人罰我，我也要遵守，那麼這種社會不可能有健全的交通規則。同樣在民主法治社會中，如果沒有一批人堅定信仰，沒有任何人罰，我也要選擇我的手段，並不是單純怕外在的罰，我有內在的自律和約束。如果沒有這麼一批人，而且這批人的行為，被衆人公認是一種價值，那麼這個民主社會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道理非常簡單，很多國家，包括共產黨在內，未掌權的時候，都要求民主。一旦他有權了，他能把你的幹掉，為什麼不把你幹掉？可以剷草除根，一勞永逸，為什麼還要保留民主的程序呢？你剛才講民主是統治和被統治的共同契約，當被統治者一旦成爲多數時，為什麼還要遵守原來的契約呢？新統治者大可以按照自己需要，以掌握的多數，依多數決的原則，重訂契約，讓少數無從反對，永遠不能推翻多數。可是事實上，民主國家新的多數都沒有這樣作，都自我約束，而且認爲自我約束是對的。可見即使我們是多數，還是不可以按照權力鬥爭的大吃小的原則作事。

如果我們自己不能約束自己，爲奪權、掌權可以不擇手段，那是專制的基本信念。

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見到這類事情太多了。當時很多人捲入政治，能幹出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爲什麼？因爲他們可以藉階級專政的名義，把政敵殺死、打死，而成功地奪權保權。

朱：你講的我能了解，在道德訴求上是正當的。我強調這是個人政治操守問題，你可以這樣自我期許，你不能期待別人也會自我約束，更不應該有此期待。

胡：不，我還是得期待別人應該自我約束。

朱：如果你認爲別人應該自我約束、甚至也會自我約束，人類政治早就不麻煩了。

胡：不！這是兩個概念。我希望人人不偷東西，但是我知道作不到，所以還是要有警察。

朱：你只能這樣說：如果你能自我約束，你可以贏得我的尊敬，否則我瞧不起你。不過如此而已！

胡：不然。自我約束是爲社會所普遍接受，因爲大多數人認爲偷東西是錯誤的，若是區別僅在你被抓，他聰明沒被抓，那誰不偷啊？我就不能接受這種觀念。不能偷就是不能偷。我承認有人在沒有監視時會偷東西，甚至偷很多而仍未被抓。我不僅僅瞧不起他而已，我還認爲整個社會都應該瞧不起這種人。社會若沒這種輿論的話，就像孟德斯鳩所說，共和國若不以美德作基礎，共和國怎能存在呢？而美德是靠大家維繫的。

我再說回來，國民黨現在仍掌握軍警特的權力，手裡有槍，照樣可以戒嚴。爲什麼不繼續戒嚴？正如您說，蔣經國在內部有阻力下仍然解嚴，可見至少他承認解嚴是對的。固然也許蔣私下會想，繼續戒嚴對國民黨不利，所以

解嚴。但是前年，如果國民黨仍不准你們組黨，甚至動用戒嚴法，把你們抓起來，當然會在國際上蒙受極大譴責，可是你說，國民黨政府會因此而垮嗎？恐怕未必吧！波蘭團結工會力量席捲全國的時候，賈魯塞斯基不是說鎮壓就鎮壓了？波蘭軍政府顯然不得民心，可是波蘭政府照幹而不虞被推翻。你對蔣經國也頗有好評，可見蔣經國並沒有完全完全不擇手段想把你們摧毀。他是有摧毀的力量。他爲什麼約束自己不全照權力鬥爭原則不擇手段摧毀你們呢？除了利害考慮外，總也還認爲，有些事情是不該作的。所以，解嚴、解黨禁、解報禁不能完全說是只是由於民進黨的壓力所致。我絕對無意否認民進黨是主要壓力的事實，我只是說，承認民進黨壓力之後，我們對國民黨開放民主的配合不能完全否認。國民黨已經在理念上承認民主是對的，在實際上也半推半就的實現若干民主，這是兩年來有目共睹的事實，我想你能在立法院內內外外如此公開怒責國民黨，而照樣出國，照樣公開你的言論，在社會上也有影響力，怎能說國民黨不容忍反對意見？因此非用極端的方式不能迫使國民黨開放民主呢？這是我覺得不一定要用暴力的原因。

朱：我問你一個具體的問題，你認爲那些是不該作的？或是你認爲那些是大家應該共信共守的根本呢？也許站在你特殊的教育背景，你認爲應該這樣，不該那樣，別人有別人的認爲。弄到最後，該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也就是說，有某些基本規範是任何政治社會應有共識的，除了基本以外，都是你個人道德價值判斷。

胡：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有一些根本的道是存在的；第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遵守這些基本的道。遵循者是否每一個人都自覺

的遵循是另外一回事，但要使那些道能夠存在下去，總得有相當數目的人是自覺的遵循。沒有外在的力量監督、約束，他們依然認為遵循是對的。這是民主社會能存在的原因。專制社會就不講這些基本的道。那麼，最起碼這些道有那幾條？我傾向以為，在民主社會，暴力，從各方面的暴力都是應該禁止的。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就很難說了。連孟子那麼保守的政治思想都認可可以誅一夫……。

朱：你所說的「暴力」是何所指啊！講得清楚一點。舉個例嘛！在台灣並沒有人以暴力推行民主，也沒有人贊成暴力。大家都強調非暴力。你看到些什麼事實，你一定是有所指。

胡：前天在法拉盛的遊行暴力，就不應該

朱：是那一方使用暴力啊？

胡：我未親眼看到，我不在場。我譴責的是一個原則，在民主社會中不應使用暴力，不管是誰。

朱：上次我來美國，有些人認為我不支持台灣，有些台獨教條主義者向我抗議，在會場鬧場。我跟他們講：「他媽的！你要抗議，到外面去。這是我的講堂，我講我的，你抗議到外面去！」這次法拉盛也一樣，你抗議可以，但是不能丟東西。

胡：這就是規則之一。在法拉盛發生的示威暴力在台灣似乎也發生過。包括五二〇在內，在立法院內也發生過。

朱：在立法院我跳上主席台的原因，就是國民黨暴力造成的。（註：以下朱委員詳細描述四月七日立法院「扭扯事件」從略）。

我很驚訝，你是民主運動人士，你連台灣報紙都沒細看，都沒詳細去了解，就認為議會中有暴力，不對。

反對黨怎麼會有那樣大的膽子去搞暴力？沒搞暴力都被它擊成這個樣子，吃錯藥了，還去搞暴力？你根本不了解實際情況。五二〇晚上是警察使用暴力。

胡：我承認不是完全了解實況。但就以你所說的議會場內發生的經過，如果是我，我可以退席，可以發表聲明……。

朱：這些我們都用過了。在民主國家中退席可以造成很大震撼。在國民黨統治下退席，隔天報紙只登一小欄，根本沒有人注意，沒有用。

胡：那就說明台灣民衆對民主共識還不夠

朱：一個反對運動連這點都作不到的話，

就是在現有秩序下跟當權者搞退席等等，我告訴你我，這就叫作「臭老九的民主運動」。我告訴你我，你再搞三百年也沒有什麼鳥用！事實就是如此，三百年沒有鳥用。我們要的就是在高度對抗中，看到人民力量覺醒，看到憲法漸漸有效。這樣的話，民主運動才有希望。你他媽的老是整天在跟他退席。退席，沒有人跟他吵了，國民黨樂歪了。呵呵呵……

胡：有兩個問題。第一：在政治競賽中，有時居少數派，通過一些劇烈手段，更容易喚起世人對事件的注視，這毫無疑問的有高度技術上的意義，這是一目了然的。在大陸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都當過少數派，很知道少數派只是發聲明，寫大字報，反應是有限的。如果你用奇兵把對方的總部打爛，或是開會時把麥克

風搶了，那效果自然不同。多半是人心大快。因為你有把握人心站在你這邊。但是在有些情況下，依然可以採取更和平的手段……。

朱：什麼叫「更和平」？你告訴我什麼更和平的手段。

胡：我就退席，或是寫大字報或發聲明嘛！那怕效果只有一點。讓民衆漸漸覺醒，關係也不大嘛！

朱：台灣這種退席早幹多了。審議選罷法時不是退席了嘛！包括省議員十四人辭職抗議省府組織法違法，還不是沒有用？拿國民黨沒辦法啊！

胡：我覺得我不能同意你對有用、沒用的看法，你認為言論、退席、辭職都不起作用，我覺得這些都是起作用的。且不說沒有那些先前種種抗議，就不會有今天的反對黨力量。它們起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第二，如果有了和平抗議手段，通過報章、雜誌、退席表達意見。更激烈的手段就大有商榷餘地。你承認你有這些手段，只是你覺得不夠有效。

朱：在台灣這樣僵硬體制下，如何讓他解凍？立法院早就僵化，一定要把它敲一敲、搖一搖，然後再重組，就比較快。你如果不肯敲，到最後只好搞革命，一下子把它推倒。

胡：那可不一定，因為你的基本思想認為，我們剛才所提的和平手段是無效的。民主社會有改革，也許慢一點……。

朱：也許站在大陸，現階段你是對的。你敢不敢保證，未來三十年內，你的立場都保持不變，包括政治鬥爭策略都不變？

胡：我當然可以保證不變。

朱：那我可預言：如果大陸民主運動留在現在根本不起眼的水準三十年，那麼你只有兩條路，一條路你要大幅修正你的策略，如果不修正，你一定要坦然接受來自內部的批判。因為你站在民主前輩的位置，阻礙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你將會被歷史洪流淘汰掉。就是這麼簡單。

胡：這可很難說。我跟你講一個例子……

朱：不，你聽我說，你缺少一個全程的戰略構想。也許你今天在大陸這樣作是對的，正如我在台灣十五年前，自有我另一套作法。但是，拜託！我到現在從來沒有聽過一個搞政治的人，竟然會這樣慷慨的說，他未來三十年連策略技巧都不會改變。

可見你缺乏前景嘛！

胡：我說的很簡單，我們現在認為應該遵守的規則，將來我們同樣認為要遵守，這並非權宜之計，這正是我們剛才所談「道」、「基本原則」層面上的事，這是不能變的。

朱：我問你，我問你，你遵守道，對方不遵守，你怎麼辦？而且他當面騙你，說他要遵守，我在台灣甚至跟國民黨說，我拜託你，你可以說國民黨不講道理，我也接受，這樣我就也有一套不講理的作法。但你既然要跟我講道理，我講出道理，你也駁不了，又不接受，這表示你講理是廢話。

胡：這不是很好嘛！你把這情況講出去給大家聽……

朱：沒有用的，沒有人知道的，你有什麼電台啊！

胡：你有報紙啊！

朱：你開玩笑，台灣那裡有黨外的報紙？那裡有民進黨的報紙？你的想法太幼稚了！你完全幼稚！

胡：雜誌呢？

朱：雜誌？我告訴你，民進黨機關報雜誌銷售量一萬份。一萬份有什麼用？人家花花草草的雜誌銷售量都十萬份了，開玩笑！呵呵呵。

胡：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群眾組織中的領袖，往往並不是最先造反的那一批人，後來更激進的人取代了他們，最先起來反對官方

壓制作法的人往往到後來被群眾認為不夠勁，反抗不夠激進……

朱：等一下，我告訴你，你就完全錯了。一個真正群眾運動領袖，他不只是順從群眾意思，他要主動帶領群眾。甚至該阻的時候，他要有勇氣去擋下來。不是只是叫衝衝衝。他媽的，鬥爭中你老是衝，人家口袋戰術一下就把你收進去了，要有進有退。

胡：我認為一個社會只要提供人們公開反對政權的權力和機會，那麼我們就可以採取所謂「依規則」的辦法（即是體制內改革），即使這些規則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看，它確實給我們反對機會，我認為我們寧可用民主方法、和平辦法爭取改變規則中不合理的部分。

朱：等一下，等一下。我在這裡要率直的批判你，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你這種觀點。顯然你們是站在比較落伍、落後的地區在期待民主。譬如說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期民主。我們台灣在各方面社會凝聚力，以及反對黨策略水平，跟世界各經過革命洗禮的國家，或跟英美有兩百年民主政治歷史的國家比，很值得驕傲，並沒有差一點。讓西方搞過政治鬥爭的先輩來台灣作，我不相信他們會比今天民進黨作的好多少。絕對不會好。我要強調，你現在的意識型態到台灣來，會被歸類到極端保守、反動、擁護國民黨既得利益階段。

胡：這是兩碼子事，我談的只是規則問題……

朱：不不不不。在台灣的分類就是這樣子……

胡：那台灣的人對政治人物分類顯然糟糕。朱：在台灣學院中，我不否認，有一些真老九看法跟你類似，什麼現在已經很好啦！

胡：我所謂的「很好」是另外一種意思：

朱：我告訴你嘛！你對台灣的狀況不了解。我對中國大陸情況就不作任何價值判斷。但是我認為你對台灣顯然了解太有限。第二點，你對國民黨了解更加有限。你的處境我可以同情了解，但是一個真正正反對運動家看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標準。我完全同意你的非暴力論，至少公開的、站在理性基礎上沒有人反對，但是至於鬥爭的策略技巧，按你所講「依規則鬥爭」，我可以告訴你，你來台灣，搞三百年也搞不出什麼名堂，就這麼簡單。至於你要講理論水平，至少就朱高正來講，整個中國大陸，有誰的理論水平能來這裡他媽的辯個十小時、廿小時的？我也絕不會很多了。我們理論水平絕對不比你們的差。

胡：我說的是台灣有些人，當然不包括你在內……

朱：我奉勸你，一個在中國大陸從事反對運動的人，在理論上啓發民眾，作理論導師，不能太溫和。我常說：「攻乎異端，得乎其中」。不要寫得四平八穩。列寧一再說，要搞運動，除了教育外，還要煽動群眾。

胡：所以你講的不是民主嘛！

朱：所謂煽動，就不是純理性的。你要老百姓支持民運，甚至違反他們利益支持民運，你一定要讓他們曉得這是長痛不如短痛。讓他們覺得是犧牲短期利益爭取長期利益，這就是鼓勵風潮，造成時勢。但你什麼都講得太溫和。好像你對台灣反對運動意見一樣，那麼我可以反過來勸你，鄧小平也很難得啦！你們不要給他製造麻煩，應該多體諒體諒他。你們何必搞學生示威？如果我這樣勸你，你一定大罵「他媽的，你怎麼講這種話？」

胡：我一點不奇怪你會這樣說。因為你不明白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基本差別。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人民有批評和反對執政黨的權力。即使鄧小平自改革以來，也從未承認過。國民黨至少在理論上沒有否認過人民批評政治的權力。

朱：不不不！你不了解國民黨，國民黨不便公開否認。國民黨要的是所謂建設性、善意的批評，而不歡迎惡意的、別有用心、破壞性的批評。其實這就是說它只願意接受它願意接受的批評，國民黨從來沒有講過，人民站在自己立場可以公開批評政府。國民黨領導階層到現在為止，絕對沒有講過這種話。我們一直在爭取講一些國民黨不喜歡聽的話，甚至對國民黨利益有嚴重威脅的話，而國民黨還是必須容忍，而且還要有制度化保障，這才是言論自由。你根本不知道我們跟國民黨打戰多久了，用盡各種方式逃避被禁的命運，故事太多了。

胡：這些事，我們在大陸都經歷過。

朱：我們搞了幾十年的爭取，你知道嗎？

胡：我們爭取時間也不短，你也要知道。特別從四九年以前的民主鬥爭算起，更長了。但是我要強調不是台灣或大陸誰更有策略，而是表達我基本的想法，只要一個社會有可以公開批判、反對執政黨的權力，我們就可以遵守規則來反對。

朱：國民黨還沒有承認啊！

胡：這點顯然與已知事實不符，民進黨搞了那麼久……

朱：所以我說你不知道嘛。今天軍方下令不准現役人員「參加假自由民主之名舉行的集會」，就是不准來聽我們辦演講會。你能想像嗎？

胡：這太容易想像了……

朱：基本上台灣這兩年改革沒有人能否認，可是改革原動力不是國民黨，而是完全被逼出來。

胡：一般不這麼認為。我有兩個普遍的結論，請聽我說完。第一，一個社會到了可以反對的局面……

朱：我先問你：怎麼才能出現這個局面？

胡：請你讓我說完。一個社會可以演進到像現在台灣一樣的局面，就不可能單純是由民間勢力的推動，與當局者比較明智的抉擇也分不開。至於兩者中，那一個成份更大，那是另外一回事。

朱：這大可辯論。如果他明智，為什麼五年前、十年前他不開放，顯然現在開放的原因是壓力大了。

胡：所以我說這不僅僅是民間或官方單方面的行為。

朱：你這個所謂普遍結論，不重要。那第二點呢？

胡：這個社會可以用公開和平方式批判，就應該支持這個政權。也就是說：「我們堅決支持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而反對一個只許擁護的政權。」

朱：好，好！國民黨現在仍然用各種各樣方式，例如查稅、取消聘書等來壓制他不喜歡的批評。

胡：這屬於不公正，不屬於不許批評……

朱：好，好。我很抱歉一定要講出這個結論，你基本上是一個很純樸的知識分子，本著良心在關心政治，而不是在從事政治運動。你剛才講如果一個社會可以這樣、那樣，我只是問你，如何作到使一個很封閉的社會變成比較開放？這就是要加入某些動因。

胡：我們就是這麼作的。大陸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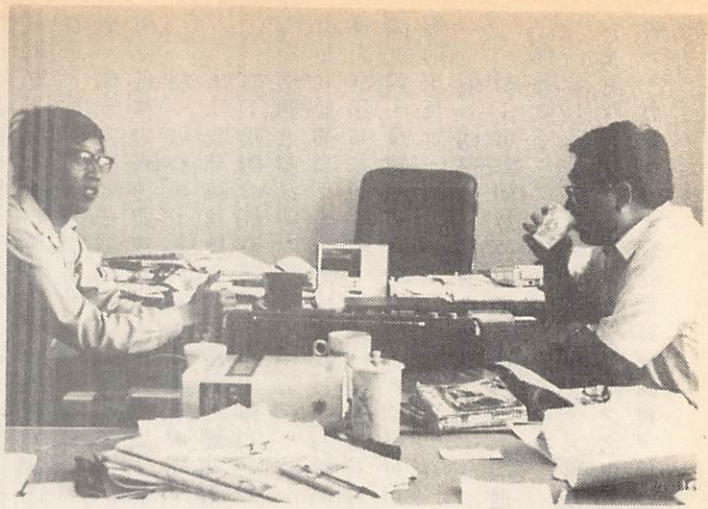
朱：你提到公開批評政府，我問你如何對公開批評給予制度化的保障？你要批評，我有各種方法整人，雖然不是立刻坐監牢。你對台灣不了解。

胡：我今天談的不涉及台灣具體問題，而是一個普遍原則問題。

朱：要談政治哲學，我也會談。如果你只是智識分子從事協調者角色，談理論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你從事一個運動，與當權者抗爭，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

胡：我特別要說明了反對運動並不同民主運動。我更重視是後者的民主運動，而不僅僅是反對而已。仁愛可以過份，正義不能過份，正義過份就不是正義。民眾常有過份要求的，但作為領導者必須節制群眾情緒。一旦這邊矯枉過正，那邊再正回來，冤冤相報，沒個完了，永遠沒有公正時候了。所以一個政治家和政客重要區別就在於政治家不僅要能領導群眾，而且永遠敢下賭注，在必要時，寧可失去群眾，也不作違反自己基本原則的信念。我看到文革的群眾運動中，太多領導到後期都成為群眾的傀儡。因為群眾常認為你過於溫和，於是你就不自覺為了領導群眾，作出更為激烈過份的行為。這就成為被群眾領導了。

朱：在政治中，自然而然有很多被群眾帶著走的所謂領袖，這不必苛求。能作中流砥柱、力挽狂瀾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我現在最後再說，台灣民主改革主要原動力最主要來自民進黨。如果民進黨執政，也不會有太大改革誠意，改革是在壓力下促成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反對黨。在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也是成立反對黨，能夠給共產黨適時壓力。至於用什麼形式，你似乎十分在乎。其實，不必太在乎，孫子兵法中說：「兵無常形。」千變萬化的。



六月十四日胡平與朱高正在紐約「世界日報」對談

胡：但是你也承認，政治還是有基本的道理的，我們一開始爭論就是在鬥爭中不需要道的約制……。

朱：道也是現象問題，現象是千變萬化的。我搞政治搞久了，變得越來越沒有氣質。因為我需要從實際狀況中衡量。

胡：我也知道台灣的情況，來自群眾的衝擊在所難免。作為領導人也不能完全盯得太緊，有時群眾犯規了，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你自己甚至有時也有些過頭表現，這也在所難免，甚至從策略上說是成功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什麼是合理的約束。（全文完）

# 我們相信民主嗎？

## ——與朱高正商榷

### 胡平

六月十九日美國「世界日報」和六月廿八日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我和朱高正的對談。聽說引起了不少讀者的興趣。許多讀者希望我能對有關問題作進一步的發揮。照道理，最好的辦法是我和朱高正再對談一兩次，以求把各自的觀點說得更透徹些。可惜朱高正已然離美，短期內恐無緣相晤。這裡，我只好單方面談一談。倘若朱高正讀到此文後有興趣再筆談一番，那當然就更好了。

1. 經過上次對談，我感到朱高正似乎缺乏對民主的堅強信念。他把搞民主看作是不擇手段地爭奪權力，這就抹殺了民主與專制的區別。男人女人都是人，你要給「人」下一個定義，當然要抽掉男女之間的差別而找出其中共同的东西，但倘若因此而推論說男人女人都一樣，都沒有差別。那顯然就錯了。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都是政治，你可以把政治定義為爭奪權力，但你不能因此說民主與專制都一樣。

民主社會，不但需要一套硬件即憲法和相關的制度，而且還需要軟件，即人民對民主的堅強共識。有些發展中國家，在憲法和制度上照抄英美，但政變層出不窮，社會既不穩定又不自由。原因就在於那裡的人們對民主缺乏明確

的信念。需知，民主這套東西，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儒家認為，若要政治清明，政治家必須都具有良好的政治品質，這當然不現實，因此靠不住，然而倘若我們以為，只要有好的制度，政治家個人的政治品質則毫不重要，那同樣是錯誤的。人類由於有優點，所以，民主成為必要；人類由於有弱點，所以，民主成為可能。政治家個個是聖賢，則民主制度沒必要設立，政治家個個是魔鬼，則民主制度不可能施行。

2. 毫無疑問，在民主化方面，台灣領先於大陸。原因何在？可以有兩種解釋：其一是認為大陸人民不如台灣人民聰明勇敢，其二是認為大陸的執政當局和政治體制遠比台灣的更為專制。哪一種解釋更能抓住重點，應是不言而喻。時至今日，連中共領導人也承認十年「文革」是民族災難，並開始承認在「文革」之前大陸人民即在受苦，而朱高正卻依然認為台灣的專制一向比大陸更甚，這不能不算作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朱高正說，鄧小平自復出後，「從來沒有叫人失望過」。這話恐怕連拒絕新聞自由原則的胡耀邦也不會同意。鄧小平不如蔣經國，這是公認。當然，鄧氏還健在，倘若他在有生之年



，在推行自由化民主化方面邁出決定性的步子，哪怕是僅僅從理論上接受分權制衡、多黨競爭、輿論獨立等概念，我們也將十分歡迎。可惜，迄今為止尚無此迹象。

至於說我對台灣的評價。我不過是肯定了台灣已步入民主（儘管還不完整），肯定了國民黨在這方面也有貢獻（反對派的貢獻不待言），主張在目前的形勢下，從反對派方面講，應堅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擴大民主（從當局方面講則應加速改革步伐）。若說這些看法屬於保守反動，那無疑是很費解的。

說到保守，人們是否注意到，大陸搞經濟的學生學者，對這些年英美的保守主義革命大都懷有相當的興趣。「徹底砸爛舊世界」的共產革命從反面教會了我們，人類爲了發展，是需要注意保存某些價值的。

3. 人類歷史幾千年，民主存在的時間并不長，世界國家近兩百個，實行民主的地方并不多。民主既非自然而然而然，因此也需要小心保護。民主政體是唯一的一種政體，它允許人們批判自己，反對自己。這種批判和反對可能是在鞏固和擴大民主，也可能是在削弱和毀滅民主。朱高正對民主的理解完全正確，他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本不同。但是，他所說的都是完整的民主，而現實生活中在許多地方眼下還只有不完整的民主。一定要區分不完整的民主和不完整的專制（這就是目前台灣與大陸的本質差別）。在不完整的民主社會裡，我們既需要保護又需要改革。這就要求我們在爭取擴大民主的鬥爭中，不要採取非民主的手段。這是反對派可能落入的一個陷阱，因此必須小心提防它。

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在一個不完整的民主的社會裡，還存在着若干專制的遺物（某些政

治結構和某些統治者的心態和作法），也就是有着一些的確應該加以反對的對象；另一方面，這種社會又給反對派傳播對抗意識、聚集有組織的力量提供了相當的活動空間。於是，反對派便有可能由於對和平改革的進展緩慢而感到焦急不耐，從而轉而訴諸於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這樣，朝野間對立日益深化，雙方都可能情不自禁地採取暴力邊緣政策；而暴力邊緣政策是不能持久的，如果它不能及時地拉回到和平狀態，便會發展到暴力狀態。從純理論的角度，我並不否認暴力之後社會也可能更爲民主，但顯然，拋開其過程本身的破壞性不談，這種可能性總是很小的。

相比之下，一個相對完整的民主社會要更安全些，因爲它沒有一個明顯的反對目標；甚至一個專制社會也可能要更安全些，因爲它沒有一個成形的反對力量。無怪乎人們都說改革需要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因爲從和平改革到暴力革命，其間并不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4. 朱高正的言談中有幾個矛盾。

例如，朱高正一方面聲稱台灣的民主改革完全是讓反對派給逼出來的，這應意味着當局已經完全沒有力量阻止它本意想要阻止的東西；另一方面，朱高正又高度肯定蔣經國對反對黨的寬容，這又意味着執政者沒有阻止他本來有力量去阻止的東西。十分簡單，寬容必定意味着主體在一定程度上自覺自慮而非一味的被逼被迫。因此朱高正的這兩種說法正好是自相矛盾的。

再如，朱高正一方面宣稱國民黨當局沒有實行民主，否認國民黨允許人民批評反對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說反對黨幹得很漂亮，決不比英美等國的反對黨遜色，并表示在台灣，反對

黨與執政黨已有一定程度的互動，「早有遊戲規則」。這顯然又是自相矛盾。因爲，反對黨的公開存在，反對黨與執政黨依據共同的遊戲規則而互相作用，這正是民主社會的一個基本標誌。執政黨容忍反對黨出現，無疑應視爲執政黨在搞民主（儘管可能不是全心全意）。要麼我們說，執政的國民黨沒有搞民主，這意味着在野的民進黨、工黨等等只不過是花瓶，是擺設，要麼我們說他們是貨真價實的反對黨，那意味着執政黨確實在搞民主。二者必居其一，也只居其一。

身在專制社會之中而不自知其爲專制，這令人堪憐。身在民主社會之中而不承認其爲民主，同樣令人堪憂。

5. 無疑，台灣現今政治結構中含有若干不合理甚至不民主的因素。但若因此而論定整個台灣政治就是不民主的，而仍屬不當。我相信，通過已有的民主手段，這個問題并不是不可能較好地解決。

衆所周知，在一六八八年英國開始黨政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中，非民選的上院都擁有很大的權力。我們更知道，在西方國家，普選制的實行只是晚近的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中，相當數量的一批民衆沒有參政的權利。在上述情況下，都存在着反對派縱然得到許多選民或民衆的支持卻依然無法掌權（甚至無法進入議會）的局面。因此，一直有不少激進的反對派別認定，唯有用暴力的方式才能改變這種局面。但是，歷史演變的事實證明暴力手段是不必要的。只要存在着經由自由討論而形成的公眾輿論。「上層」就可能接受「下層」的正當要求和承認「下層」的應有權益。麥迪遜的名言：一切政府都依賴於意見，這話包含有比一般人想像更多的真理。只要存在着自由的競選

，那麼，在同類機構中，民選的一方就會逐漸獲得比非民選的一方更多的實際權力。當今台灣政治結構中不合理的成分并不比當初的英美等國的為多，因而它們完全是可能和平解決的。

6. 不錯，這離不開反對派施加壓力。可是我們要明白，「壓力」究竟是指什麼。如果把壓力理解為用強力逼迫，那麼，最立竿見影的壓力手段當然就是用槍對準別人的腦袋。但民主社會恰恰是禁止這樣使用暴力的。在民主社會中，反對派施加壓力的辦法是爭取以自己的主張得到盡可能多的人們的贊同。在街頭搞游行示威，其目的在於引起一般公眾的關注，從而促成有利於自己主張的公眾輿論。假如我們有意使街頭運動沾染上某種程度的暴力或準暴力色彩，那恰恰是對這種鬪爭方式的嚴重損害。假如我們把施加壓力看作用不擇手段的強力逼迫，那正好是幫助了那些擁有更多強力工具的一方。這層道理應是十分明顯的。

7. 「你講理，對方不講理，你講理有什麼用？」朱高正振振有詞地反問。

不然。因為我講理，不僅僅是面向對手，更重要的，是面向廣大民眾。講道理是為爭取人心，爭取民眾的支持。這樣，我就獲得了力量，從而促使對手也講理服理。真正蠻不講理的統治者總是要箝制自由討論的，否則他就不可能蠻不講理。當朱高正抱怨「講理無用」時，我真是羨慕他的處境，因為大陸民眾的痛苦恰好在於我們還沒有在大陸內部獲得講理的權利。

說「講理無用」，試問，那什麼才有用呢？難道說不講理反而更有用嗎？如果我們不相信講理可以解決問題，那麼我們又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問題呢？相信民主是和相信理性聯繫在

一起的。我當然知道，人并不純粹是理性的動物，講道理有時好像是徒費唇舌。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除了訴諸於說理，我們別無更好的手段。邱吉爾說：民主制度很差勁，但別的制度更差勁。懷疑講理的效用就是懷疑民主的效用，它暗含着對暴力的追求并從邏輯上必然尋向暴力。

很可能，朱高正的「講理無用」論只是一種用語上的混亂。他真正抱怨的乃是他們缺乏應有的較充分的講理工具（更有效的傳播媒體）以及在台灣現存狀態下，民意不能充分有效地影響決策。因此，合乎邏輯的解決辦法應當是進一步創造更良好的講理環境，（為此，你就需要講更多的理，讓人家贊同你），可是朱高正卻反過來抱怨講理無用，熱衷於用非理性手段解決問題，這不是適得其反嗎？一旦反對派和當權派都決定在非理性的道路上一爭短長，民主還能保存嗎？它將給目前仍處於少數地位的反對派造成自殺性的後果，不是顯而易見的吗？即使反對派僥倖獲勝而奪了權，那也不會是民主的勝利而是民主的失敗。

8. 有人讀了「對談」後說，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我的立場固然無可非議，朱高正的作法也有它的功用。在使一個僵硬體制解凍的最初幾步中，較激烈的手段更有其必要。

這種見解似乎還頗流行，但不幸是錯誤的。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在促使僵硬體制鬆動的最初幾步，是靠溫和理性的手段，激烈手段的出現，幾乎都是發生在舊體制已經鬆動之後。（暴力革命與政變除外）。

道理很簡單，一個僵硬的社會，如果它連較理性的反對方式都不能容忍，怎麼反而會先容忍那些更激烈的反對方式？最初，反對派力量很弱小，它力圖使自己的

觀點被盡可能多的人（包括統治者中較開明者）理解和同情，從而使自己得到保護，以防止統治者中更專制的一派有藉口動用暴力。因此它的觀點常常是趨於理性的、溫和的。隨着整個社會民主共識的發展，較激烈的作法才有可能被人們包容或採納。

也許，有人會舉魯迅舉過的一個例子，在一間密封的屋子裡，如果你說要開一扇窗戶，許多人會反對；但是如果你大聲叫嚷要掀掉屋頂，他們就會同意你開窗戶。

其實，上述例子不足為據。不少人是把「保守」和「專制」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了。保守者未必都專制，專制者未必都保守。對那些保守而不專制的人，「攻乎異端」或許可以「得乎其中」。然而，一旦你面臨的是真正的專制統治者，有意走極端就不是什麼好辦法了。

嚴格講來，朱高正并非完全不明此理。他對我說：「也許站在大陸，現階段你是對的」。可是問題在於，假如一個社會已經比較和平比較理性地度過了由專制轉入民主的難關，那麼，我們是不是就要放棄原先的和平理性的態度，轉而採取更激烈的姿態呢？

我們知道，當社會還很不民主時，任何批判政府的聲音，不論是多麼溫和理性，倘若它能夠得以公諸於世，很容易激起強烈的反應；最初的幾次游行示威，不論參加者多麼少、多麼遵守秩序，也會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但是，等到民主已經開始站穩腳跟，對當局的批評已經司空見慣，對政府的游行已經屢見不鮮時，一種意見、一個訴求，要博得社會的重視就越來越難了。這就驅使一些人傾向於採取更激烈的方式，以凸現自己的主張或要求。如果這些激烈的表現方式仍限制在一個基本的秩序之內，那麼它們就既是准許的，又可能是有益的。不

過，我們應小心防止這些行為逾越了它應有的界限，不要因此而鼓勵那些情緒化的因素。在這種情勢下，我們尤其要力倡那種更審慎、更理性的作風。如果我們輕視這種平實可靠的作風，不去努力保證它在社會政治中的主導地位，民主的發展將會是畸形的。

9. 有讀者認為，我和朱高正在觀點上的異同，就是大陸民主運動人士和台灣民主人士的異同。這未必妥當。因為我們彼此都并非各自方面民運人士的全權代表。我們之間的異同僅僅是我們個人之間的異同。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大陸民運人士類似於朱高正，正如有些台灣民運人士類似於我。如果他的觀點優於我，并不等於說台灣的民運優於大陸的民運。反之亦然。

我還敢肯定一點的是，朱高正關於搞民主政治就是不擇手段攫取權力的觀點，決不可能是所有台灣反對人士的觀點。我相信，最早投身反對陣營的人都不是不擇手段抓權的人。因為在那時，作一名反對派，離權力很遠而離監牢卻很近。在這裡，倘若沒有一點朱高正所不以為然的道德勇氣，恐怕是辦不到的。待到投入反對陣營已成爲不擇手段者所選擇的手段時，那已經是專制將近尾聲、民主初露曙光的時候了。假如台灣曾經是專制的，則反對派人士必有許多是理想主義的。倘如此，我猜想他們會較多地贊成我而較少地贊成朱高正。

10. 「知識分子」是一個多義詞。但不論是在何種意義上，我都不同意將知識分子稱爲臭老九。大陸人近來很愛說知識分子如何如何，其主旨或是爲了改變一般腦力工作者的不公正處境，或者是爲了喚醒人們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當然其中或許有些人有點洋洋自得。那個是不足道。

學者教授們免不了有自身的弱點。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搞政治的人貶損知識分子，常常是一種廉價的向學歷較少的民衆討好的辦法，并往往含有反智性反理性的成分。但願朱高正口中的「臭老九」，更多的是調侃，正如他對談中脫口而出的一些不雅之詞其實并非帶有對我的惡意一樣。

11. 朱高正抱怨：「我搞政治搞久了，變得越來越沒有氣質。」何以至此呢？有誰證明過，一搞政治，一結實際問題考慮，人就必然會降低他的氣質而不能提升他的氣質呢？假如我們一方面希望政治清明理性，另一方面卻又認定要搞政治就必須多來點暴戾之氣；假如我們都不喜歡執政者專橫跋扈，然而同時又總是習慣於認爲只有那些霸道的人才像是政治家。我們豈不是成心和自己過不去嗎？

畢竟，富於道德勇氣的人未必都富於霸氣，而那些富於霸氣的人則未必都富於道德勇氣。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

12. 朱高正問我的原則，我的政治策略今後會不會變。我的回答是清楚的。我認爲，一個社會只要提供了和平反對的機會，我們就要堅持和平反對的策略。對此一原則策略，有些人是不以為然的。他們大概認爲，即使有着相當的和平反對手段，只要他們認爲和平改革的速度未如人意，他們就可能策劃革命和嘗試採用非和平手段。這種觀點無疑是危險的，因爲它破壞了一個民主社會所必須的對民主改革手段的信心。它鼓勵人們假借民主改革準備暴力革命，這就從另一方面鼓勵當局中某些人以防止暴力革命之名壓制民主。倘若我們聽任這兩種極端見解佔據上風，民主改革將無存身之地，而整個社會到頭來不是陷於專制便是陷於暴力革命。

13. 我在「對談」和此文中所說的一切，是我對民主改革的基本見解。不論是對台灣還是對大陸，我都秉持同樣的原則。我厭惡雙重標準。我認爲，一個具有民主信念的政治家必須恪守一種一貫的立場。具體策略可以因時因地而異，但策略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必須始終如一。我把這種原則歸結爲如下兩句話：

我願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

我堅決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權。

我不能贊同以下的態度：(1) 對只准擁護的政權曲意擁護，和(2) 對可以反對的政權不擇手段的反對。(1) 的態度幫助維持了一個極權專制政權的繼續存在，(2) 的態度則使得一個穩定有效的民主政府成爲不可能。

假如明天，大陸也發展到人民可以和平反對的地步，我們將如何行爲呢？我們不是要不斷地製造「高度對抗」，甚而揚言暴力革命呢？從表面上看，我們似乎有着充分的理由這麼做，因爲那時的大陸的政治結構肯定還會保留着許許多多不合理、不民主的成分（比目前台灣要多出一百倍），採用和平反對的手段完善民主改革，肯定也不會一帆風順、一蹴而就。但我堅決主張要堅持和平反對的手段，堅持用民主的方法爭取民主。我承認，堅持這種立場，在達到某些具體目標方面有可能會稍慢一些。但是惟有堅持這種立場。我們才能製造出一種良好的政治文化，才能創造出一種長治久安的民主政治，才能提升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整個民族的政治品質，同時，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人民的痛苦與犧牲。鑒於中共高層中最專制殘忍的一翼已經一蹶不振，大陸和平民主改革的前景并不是沒有希望的。但是，由於中共領導至今依然拒絕公民自由憲政民主這些觀念，另一種前景還不能排除。

# 民主運動

## 與 政治良心

錢達



六月十九日的世界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朱高正先生與胡平先生對談民主運動的紀錄。朱高正與胡平兩位先生各自在臺灣與大陸的

民主運動中有相當的影響力。單以他們為理想奮鬥的勇氣和決心而言，兩位先生都是令人欽佩的。

在談話中，朱高正經常打斷胡平的說話，並且常常說出「他媽的」、「鳥」、「你不懂」等字眼，在語氣上十分粗獷橫霸。可是我不想在這方面作太多批評，一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在言談之中，沒有民主的風度，不能尊重別人，固然令人覺得是嚴重的缺陷。但是中外歷史上也都有過態度狂傲，獨斷獨行的大政治家，他們對國家對人民仍有可觀的貢獻，所以我也不覺得我們可以單單因為朱高正的態度倨傲，而完全否定他的論點。

但是從朱高正的談話中，我們常常可以發現一種心態，這種心態不但在朱高正平日的言論中經常出現，甚至在以民進黨為主的所謂台灣民主運動人士中也普遍存在。這種心態就是台灣的民主人士多半認為大陸民主運動仍處在初級階段，而台灣之民主運動已到了「打拚」的時代。自然地，台灣的民主人士也認為大陸民運人士對民主的理念只有幼稚園程度，所以台灣民主人士經常用一種「你不懂，我告訴你」的心態，來指導大陸民運人士，甚至說得更明白一點，是一種「你還不夠水平跟我談民主運動」的心態。

我是一個來自台灣而積極參加中國民聯的人。從我與許多位民聯中堅人物的接觸和對他們的理念的瞭解中，我是無法同意朱高正以及其他台灣民主人士的看法的。我覺得台灣民主形勢的發展的確遠遠領先大陸，可是大陸民運人士對民主化過程的體認卻走在台灣民主人士前面。大陸民運人士絕不是來到打拚階段而不懂得打拚，而是他們對於鼓勵群眾，打爛舊框框式的非理性爭取有了親身的體驗，而有清楚

的覺醒。所以他們爭民主時，願意用更大的苦心。從事民主理念的溝通與傳播，而不急於鼓動少數人作極端暴力方式爭取。反過來看看台灣的民主運動人士，在民主理念的宣揚上沒有太多建樹，但是相對的，不斷鼓動少數偏激分子作極端暴力方式鬪爭。這正具體地表現了胡平與朱高正在政治觀點上的一個巨大差異。那就是胡平認為一個政治領袖不應該用一種只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態度，而朱高正卻認為搞政治，不論「他媽的」專制還是民主都是不擇手段的。

我個人覺得一個政治家，考慮政治手段，不單單是個人的道德操守，更重要的是認真考慮全盤得失。若是一個手段能達到短期目標，但是對整個社會有深遠的傷害，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是不應該去作的。今天民進黨的短期目標似乎是在與國民黨的鬪爭中，要不擇手段的以動亂、衝突來增加國民黨的困擾，一旦國民黨頭痛了，民進黨就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如此反覆作用，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形勢變化就會有利於民進黨的發展。

可是，我想請問朱高正先生兩個問題：第一，憑今天民進黨人士的這種氣息，我們能相信有朝一日民進黨若是執政了，他會給予國民黨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民主地位，就像今天民進黨向國民黨所要求的標準嗎？

第二，今天民進黨以煽動成果，擴大社會衝突面的方式來發展勢力，但是當群眾的暴力傾向被一再刺激升高以後，將來民進黨如何有效的以和平方式消弭這種暴力傾向呢？如果有一天民進黨執政了，其反對派包括國民黨的擁護者，是否也可以不擇手段的以癱瘓交通，砸毀公共設施的方式抵制任何他們不滿意的措施呢？

今年年初，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中，

王炳章先生在卸任主席職務時，發表了一篇演講，講題是「如何打破『專制——革命——專制——革命』的循環」。今天我們要解決民族的危機，不單是要打開現有專制體制，更要謹慎地把中國引向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走進另一個專制。台灣民運人士在成立民進黨先後多年中，給我的一個觀念，是有一天民進黨若是執政了，他會是一個比他們罵國民黨專制還要專制很多倍的獨裁機制。

兩星期前，立法委員李勝峰先生訪美，在經過舊金山時，他邀約了幾位大陸同學座談，那天我也有幸參加，當時我曾請問李委員對五二〇事件以及其他街頭運動的看法，李勝峰先生的回答十分令我佩服。他說，事實上民進黨的這種作法是不太明智的，因為目前國民黨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而民進黨得票率約百分之三十，（其他無黨派人士得票甚微）但是在民進黨所得的選票中，真正擁護民進黨的人只佔一半左右，其餘的一半並不是擁護民進黨，但是他們認為台灣的政治發展需要有反對黨來制衡，所以他們把票投給了民進黨。現在民進黨一再炮製自力救濟事件，造成社會動亂，干擾民衆生活，妨礙經濟發展，這種作法會使他們逐漸失去那百分之三十中一半選票的。因為台灣社會中，中產階級已十分強大，雖然大家都同意台灣在民主道路中還需要繼續邁進，但是對街頭運動所造成的傷害愈來愈反感，而這種不滿終於會在選票中反映出來的。

在此，我想敬告朱高正先生及其他台灣民運人士，今天中華民族的命運正走在極關鍵的時刻，我深感今天中國政壇上的領袖人物，不單單是要「敢」，更需要的是政治的良心與智慧。

# 「和共和國同齡」

唐捷

你們是一對命運包辦的夫妻，  
在娘胎裡就紅着眼睛廝守。  
還沒有讀過聊齋，  
只知道痴看樹梢上的風箏。

剪去腦後獨生子的小辮，  
十歲你把右手舉過頭頂。

莊嚴的銅鼓和小號，  
一個笑吟吟的女人  
把一條血腥腥的紅領巾  
套上你的脖子。

這是紅旗的一角，  
它用鮮血染成。  
這裡沒有金戒指和酒席。

十七歲兩腿和唇上長出了黑毛，  
情慾在舌尖上打滾，  
背着一麻袋思想彙報  
悄悄放在沒有眼珠的石膏像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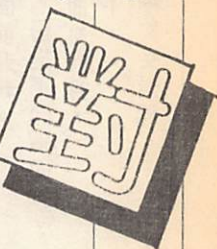
二十五歲伸開的手掌握成拳頭，  
國旗在你面前升起。

二十七個省份提不起這面旗。  
它剛從人血缸起身，  
來不及擽干，  
匆忙在這裡接受崇拜。

洞房這面旗鋪在床上，  
大拇指蘸了紅印泥，  
按下一個賣身的羅印。  
遞給你戶口糧證和檔案袋，  
把愛情別在肉上，  
去參加假面舞會。  
哭和笑都不是你，  
誰都不知道誰再是誰。  
生下來就想，  
死了埋在哪裡。  
活的時間短死的時間長。  
迭印着血迹謊言殘暴和鮮花微笑  
國旗蓋住了一張張化過妝的死人臉。

拖着褪了毛的兩腿，  
路過沒有墓碑的亂墳崗。  
四十九聲炮響，  
白色的和平鴿飛向天空，  
變成漫天安慰死人的紙錢。  
把十歲的信物留在國境綫，  
跨過羅湖，  
向海關遞交了沒有雙方簽字的離婚證書。  
從出生就偽裝愛情已導致神經錯亂。  
野百合花沾在開裂的腳跟，  
照亮道路的是一截燃燒的烟頭。

# 清末自強運動及其



# 改革的啓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田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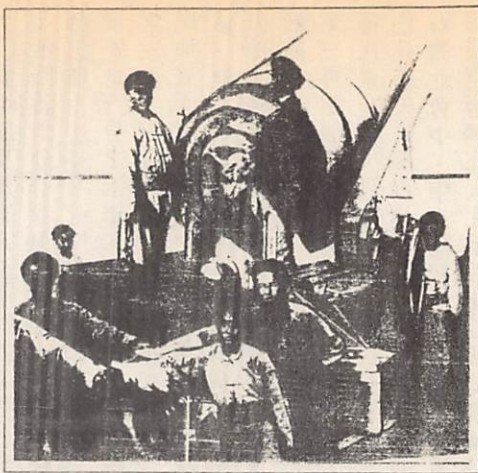
立西式學堂等。本文所討論的重點是自強運動中工業的發展及其對經濟改革的啓示。

## 一、自強運動的時代背景

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起，中國逐漸由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變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在英國炮艦的威逼下，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規定中國開放廣州、福建、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口岸通商，割讓香港，并賠款二千一萬元。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大沽後，清廷被迫簽訂天津條約；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清廷再簽北京條約，規定中國賠款一千六百萬兩（兩為當時貨幣單位之一，指白銀，下同），通商口岸增加到十六處，並互派使節，外人享有內地遊歷、通商、傳教、領事裁判權等權利。

人們研究歷史，其目的不僅在於繼承與發揚優秀的文化遺產，還在於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以便少走歷史上走過的彎路。我們對待清朝末年的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或「同光新政」），也應採取這種態度。儘管自強運動發生發展的環境和條件與今天的經濟改革不盡相同，但研究自強運動的經驗教訓，對現在的經濟改革當不無裨益。

自強運動始於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終於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所辦洋務，包括對外交涉、通商；編練新式海陸軍；開辦工廠、礦業、鐵路、電報；設



洋人被僱操練滿清海軍

由於滿清統治者不斷加重對人民的盤剝，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紛紛破產，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反抗日烈。一八五一年一月的太平天國起義，一度席捲半個中國。只是由於太平天國本身建國方針與戰略上的錯誤及其領導人內部不和，才使清廷得以在一八六四年消滅太平軍。與太平軍有關的捻軍一八六八年才剿滅，而

西北的回軍則在一八七七年才平定。

在外來侵略日亟，內部動亂不已的形勢下，腐朽的滿清王朝搖搖欲墜，面臨崩潰。一些較有見識的親王大臣逐漸認識到，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大變局，如果不謀求對策，封建統治將難於維持。因而在清廷形成了一個力求實施「新政」的洋務派。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中是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等；在地方官員中則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閩浙總督（後為陝甘總督）左宗棠、兩廣總督（後為湖廣總督）張之洞、福建總督丁日昌、四川總督丁寶楨等為代表。

在洋務派的推動下，中國出現了為期約三十年的自強運動。自強運動的先聲是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的設置。總署不僅管理外交事務，也管理一切洋務有關的事務。主持總署二十四年（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年）的恭親王奕訢與兼職總署較久（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六年）的軍機大臣文祥為早期關鍵人物。

## 二、自強新政第一期：軍事工業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七一年（

同治十年)爲自強運動的第一期,以「求強」爲主。這一時期洋務的思想可以一八六四年恭親王的上疏爲代表:「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制器爲先。」本期舉辦的新政限于官辦的製炮造船等軍事工業,認爲這是自強的捷徑。其中較爲著名的是滬、寧、閩、津四大兵工廠。

一八六五年,李鴻章以價銀四萬兩在上海收購一座外商機器廠,該廠能修造輪船和洋槍、洋炮。併入蘇州製造局的部分機器後,改稱江南製造總局,先造槍炮。同年曾國藩委託容閔在美國購買的機器(價銀六萬八千兩)運到上海,併入該局。到一八六七年,局內設有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木工廠、鑄鋼鐵廠等,造船設備則只有干船塢一座。

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將蘇州製炮局遷到南京,改爲金陵機器局,生產火藥、大炮,由英國人烏格里主持。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製造輪船。開辦費三十萬兩,機器由法國運來,正副監督工程師均爲法國人。

一八六七年,崇厚創辦天津機器局,生產槍炮彈藥。後由李鴻章接辦擴充。

除了以上四大兵工廠外,各省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兵工廠。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丁寶楨在成都設四川機器局,分設四廠。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蘭州設機器局,聘德人爲技師,生產軍用品及普通衣料。一八八一年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器局。山東、雲南、湖南、廣東、山西、浙江、台灣等省也都相繼設立機器局。總計在三十年自強運動期間,清政府在洋務派主持下創辦了十九個軍事工業。

這些官辦的軍事工業,雖然採用了近代大工業的機器生產方式,其經營管理却是封建性

的。由政府任命一大批官僚,使近代企業像一個大衙門,把官場上的一些惡習帶入企業管理,弊端叢生。其產品由政府分配調撥,不計成本,不投入市場進行交換。其經費由國庫按規定支付,企業本身沒有盈虧可言,經理人員沒有盈利的壓力。這種內部關係是一切官辦企業(包括軍事的和非軍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

### 三、自強新政第二期：民用工業

軍事工業與其他工業息息相關,彼此必須配合。由於沒有基礎工業的支持,軍事工業只能畸形發展,導致產品質量低劣,成本高昂。洋務派逐漸感到僅僅發展軍事工業無從使清廷強盛,富是強的根本。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爲自強運動第二期,本期新政以「求富」的民用工業爲主。其中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所辦工業重點在交通、礦業;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擴展到以紡織工業爲主的輕工業。這一期企業的管理也由軍事工業的完全官辦轉變到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商辦多種形式并存,尤以官督商辦爲普遍。

所謂官督商辦,是政府以股份公司形式,吸收私人投資。開辦時政府雖然也墊撥一批官款,但必須分年取利償還,相當於政府貸款給新辦企業。因此企業資金主要是私人資本,私人資本并負擔企業盈虧。官督商辦初始目的并非不好,李鴻章規定「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衆商」。但實際上,政府委派總辦、會辦、幫辦、提調等一批官員監督管理,掌握人事、財務和經營大

權,一般私人投資者只能按年領取股息,無權過問企業事務。所以「官督」是實,「商辦」是虛。由于官權太重,不僅企業衙門化,經營腐敗,而且官員往往弄虛作假,侵吞股本,中飽私囊,挫傷了私人投資的積極性。許多華商寧願投資於洋商在華公司而不願投資於官督商辦企業。

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這是自強運動中由軍事工業轉向民用工業,由官辦轉爲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初擬招商股百萬兩,實收約半數,官方墊付約二百萬兩,分年於漕米等物運價內抵還。

一八七八年,李鴻章在天津設開平礦務局,官督商辦。資本二十七萬兩。開辦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噸,主要供各廠、局及中外輪船之用。一八八二年增資本一百二十萬兩。約在同一時期,各省興辦的煤礦在十處以上,大多爲官督商辦。

一八八〇年,李鴻章與辦天津電報局,由盛宣懷負責,官督商辦。

一八八〇年,由唐山至胥各庄的開平煤礦鐵路築成,長六十里。這是中國第一條完成而繼續發展的鐵路。

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奏請設立上海機器織布局。因私人投資者對官督商辦企業失去信心,募股困難重重。一八九〇年,開始生產,有三萬五千紗錠,五百餘台織機。因管理不善,三年後毀於大火。重建後,盛宣懷改名爲華盛織布總廠。

一八八八年,李鴻章設立黑龍江漠河金礦局,官督商辦。籌得商股二十萬兩,借官款十三萬兩,規定將盈利的百分之三十報效政府。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籌設廣州織布紡紗官局。張督鄂後,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織布局。

一八九二年開工，有紗錠八萬枚，布機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開設湖北紡紗局、繅絲局、製麻局，與織布局合稱湖北紡織官局。織布局為官辦，餘為官商合辦。

一八九〇年，張之洞在湖北興辦漢陽鐵政局及槍炮廠，開採大冶鐵礦及萍鄉煤礦，官辦。一八九四年開始出鐵，每日一百噸。這是當時亞洲的第一座鐵廠。但成本過高，品質不佳，難與洋鐵競爭。

據統計，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四年，中國官僚與商人大約設立了七十四個廠礦，資本共約二千餘萬元。其中五十四個商辦企業，資本五百餘萬元；其餘企業為官辦、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這就是二十多年中國工業資本的全部積累，只相當於一個頤和園的修建與維護費用，或等於清朝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可見自強新政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是十分緩慢的。

到一八九四年，外國資本在中國設立的工廠已有八十餘家，資本總額估計約為二千八百餘萬元。

#### 四、自強運動的經驗教訓

洋務派創辦了一些近代企業，以求自強，應當說有一定功績。然而，自強運動雖非完全失敗，成就却極有限。李鴻章經營多年的新式陸海軍，重要職位多為李的鄉人或舊屬所踞，軍官吃空額，貪污中飽，官兵紀律鬆弛，百弊叢生。在對外戰爭中毫無戰鬥力，先是敗於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再敗於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特別是三十年「求強」活動中花錢最多并被引為驕傲的北洋海軍，艦隻噸位并不少於日本海軍，却在甲午戰爭中一戰而全軍

覆滅。甲午戰爭結束了三十年自強運動的歷史。繼之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緊緊地束縛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自強運動並沒有達到使中國富強的目的，原因可大致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各類企業由一群官僚控制，沒有活力。

官辦工業管理階層沾染了清朝官場的一些壞習慣，如浪費、逢迎、安插私人、假公濟私等，完全缺乏西方企業中競爭與研究發展的觀念與精神。正如俞贊在《恤商論》中所說，「主其事者，大率執袴居多，其人本不知稼穡之艱，焉知大體，惟好為排場，任其揮霍」；「況委札甫下，荐書紛來，用人若干，薪水若干，花紅若干，姑勿論事之成否，而出款已不可數計矣」。

官督商辦的實際情況是官掌大權，商認虧損。企業掌權者不向資產所有人負責，沒有進取心，只求貪污中飽。正如吳佐清所指出，「商民雖經入股，不啻途人，既年終分利，亦無非仰人鼻息」；「所用司事，皆官場薦舉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履滿之患」。以輪船招商局為例，用人較競爭對手英國太古、怡和等公司多三倍以上，每一輪船引用親朋掛名分肥至二三十人之多。局董裝運私貨，碼頭停泊開船無時間限制。真正工作人員如船長、大副、二副等，皆用高薪聘外人擔任。購料任洋商漁利，燒煤浪費，管事無責任心。而當達官過境，還要多方酬應，送往迎來。

官督商辦這種特殊形式說明中國工業發展的道路困難重重。在封建主義長期統治下的中國，政治是至高無上的，初生的工業不求得它的蔭庇就沒有出路。官督商辦暫時緩和了外部壓力，有利於新式企業的創辦。但企業內部引

進官僚勢力，政府管理制度嚴重地阻礙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官商合辦、或商辦，企業往往需要由接近達官貴族的有勢力的官僚、富紳、或買辦等依政治力量取得許可。有意投資的普通商人，仍被多方排斥。

第二，民辦工業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難於發展。

首先，洋務派的官辦、官督商辦工業排斥純粹商辦的工業。李鴻章一辦上海機器廠織布局，就奏准「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要壟斷紡織行業。上海輪船招商局成立後，洋務派就阻止廣東、上海商人創辦遠洋和內河輪船公司，駁為「不准另樹一幟」。當然這種禁令只對華商有效而對洋商無效。

其次，各省設立數不清的釐卡，對民族工業重重盤剝。

再次，根據北京條約，中國失掉關稅自主權，無法保護民族工業。國貨須受釐卡層層盤剝，而洋貨只繳百分之五關稅再加百分之二點五的子口稅，免於釐金剝削，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

主張工業民辦較為積極的是曾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但他的主張遭到洋務派與守舊派的同聲反對。他於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出使英國，是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另如鍾文偉，主張「令民間多開私廠，或既以官廠租給商人，每年收取租息。聽其為民製造機器輪船，及一切開礦挖河抽水磨麥紡紗織布各機器」。這種主張雖然符合新興工業的要求，但無法得到政府的支持。

民辦工業未能得到發展，不僅不利於經濟發展，也使得以後的改革缺乏社會基礎，難於



## 清末位於天津的 一所武器與造船工場



成功。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迅速失敗，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如此容易地篡權、獨裁并進而稱帝

，當時缺乏強大的獨立于政府的民間企業擁有者與管理階層，沒有能夠支持改良或共和并制約封建守舊勢力的社會力量，應當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清廷在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上沒有改革。

清廷在政治上日益腐朽，阻碍新政之推行。機構上的變革僅僅是設立總署衙門以管理外交及洋務新政。與洋務同時進行的吏治，沒有什麼成就可言。

洋務派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只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而排斥西方的社會制度與思想文化。一八六四年李鴻章致書奕訢時談到，「泰西各國，明于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借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火器為最」；「中國文武制度，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學製器之器」。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洋務派對西方學習的態度。

第四，守舊勢力對自強新政的阻撓。

守舊勢力有三部份人。第一部份是權勢顯赫，對朝政有決策影響的親貴大臣，如醇親王奕環，大學士倭仁等；第二部份是清政府各個機構中的許多中、上級官員；第三部份是各地一些有影響的舊士紳與舊書生。這些守舊勢力人數眾多，是一種盤根錯節的社會勢力。守舊派死啃封建教條，盲目自大，排斥西方科技。雖然他們與洋務派的目的同為維護清廷統治，但對洋務派的自強新政百般攻擊，極力反對。守舊派的論點很多，認為西方除船堅炮利之外，并無真正可取之處；更認為模仿西法，將用夷而變夏，使中華文化傳統遭受傷害，士氣民心遭受打擊；他們也認為中西環境國情不同，

科學技術在歐美誠能得其便，在中國反易造成災害；還認為機器之使用，誠能使少數人增加財富，但亦將使多數人反而喪失生計，加之導人以競利習性，勢必造成社會混亂，不如摒棄不用，返璞歸真。

以鐵路為例。一八六五年英商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外敷設了一里多長鐵路，被步軍統領衙門視為怪異而勒令拆去。李鴻章等洋務人士在七十年代初開始奏請修築鐵路，因反對者衆而無法成行。一八七七年英國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吳淞鐵路，因行車後碾死一名華人，反對之聲四起，清政府只得用二十八萬兩銀子買下來，然後拆毀。直到一八八〇年，才築成中國第一條鐵路，即開平煤礦鐵路。

第五，沒有制定保障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和商業活動的法律。

中國的特點一是政治特權的存在，二是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超越特權之上的法律權威，私有財產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持有政治特權的人可以侵奪無特權人的財產；壟斷沒有特權商人的商業利益。其結果是有錢人最重視的是政治投資，因為如果沒有政治特權，財富不但不能增加，而且難于保全。即使一些有興趣於工商業的商人，也因政府實行官督商辦為主的政策而官督商辦企業又弊端叢生，轉而投資於外商在華企業，求得洋人保護。

### 五、清末自強運動

#### 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

一八五三年以前的日本，長期處於閉關鎖國狀態，向西方開放較中國晚。一八五四年，日本在美國軍艦的威逼下簽訂神奈川條約，開放田、箱館二港通商。稍後，同樣在武力脅迫

下陸續與英、俄、荷、法等國簽訂了一系列的通商條約。同中國一樣，日本對外開放是被迫的，所簽訂的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

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於一八六二年開始實行自強運動，日本則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起實行明治維新。三十年後，日本成爲世界強國之一，中國則仍然是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人民貧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一敗塗地，自強運動的歷史到此結束，「求強」、「求富」的目的都沒有達到。日本維新成功而中國自強並沒有成功，原因主要在政治與經濟制度、文化傳統、歷史背景、地理位置等方面。

第一，日本的維新措施是器物技能、制度、思想文化三個層面同時並進。其主政者在實用主義的觀點下，對西方的事物絕少堅韌不拔的成見，凡有助於日本的富強與「開化」的，即予採納。因此在向西方學習時，能迅速自器物技能的模仿進而至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的模仿，再進而至思想與文化的模仿。

中國在向西方學習時十分遲鈍，進展緩慢。清廷主政者中，即使是最開明的人，除去提倡仿造西洋堅船利炮之外，頂多只主張修鐵路、開礦山、辦工廠，絕少有人敢於倡導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他們在瞭解西方所獲得的一些思想觀念中，無法脫離「西學源出中國」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窠臼。雖然在洋務發展之初，這類學說對於中國官紳的接受西方技藝發揮過消除阻力的作用；但由於這些觀念對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堅持過深，此後對於中國大規模地趨向近代化產生了顯著的阻礙作用。

自強運動時期，中國在野人士主張儘速着手於基本制度改革，自非絕無其人。長洲王

韜即曾極力主張救時以內治爲主，內治以變法爲先，而變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法制改革。光緒中期旅居香港的何啓、胡禮桓，亦曾就改革全國的官制、科舉及官民關係有所建議。然而這些人只是少數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對清廷的影響力極微。握有一定實權的重要官員如李鴻章及其他洋務派官員，是絕對不敢談論什麼制度的變革的。他們爲保持官位，甚至不敢過分積極於器物技藝的模仿。當時清廷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雖然爲人精明強幹，意志堅強，具有統御與籠絡群臣的天才，但對世界嶄新的形勢缺乏認識。她所着重的是維護她本人與清室的絕對權威，即使對「求強」、「求富」的自強新政也很消極，更談不上制度改革。她經常在守舊派與洋務派之間左右搖擺，雖然在更多情況下支持了洋務派。

第二，在經濟上，日本採取鼓勵私有企業發展的政策，近代工業以民辦爲主。政府不但清除了工商業發展的障礙，而且主動地支持和保護工商業的擴大發展。而中國則採取以官辦、官督商辦爲主的政策，絕大多數企業受政府官員控制，限制了民辦工業的發展。

第三，日本在歷史上一向是文化輸入國，具有模仿其它國家文化的悠久傳統，易于吸收與消化外來文化。明治元年宣布「破除舊來陋習」，「求知識於世界」等大政方針，學習外國先進的思想與文化。中國則自有一套完整的文化體系，向爲東亞文明唯一的中心，具有輸出文化的傳統，對外來思想與文化排斥力極強。中國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養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優越感，不易發現或警覺自己文化體系中的缺失。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固然珍貴，然而傳統思想留給人們的包袱也十分沉重。

除了以上原因外，還有許多因素也與日本的成功有關。例如，日本是一島國，交通方便，消息傳遞迅速；日本資源貧乏，經濟難於自給自足，需要向外發展；日本國民的危機感強；等等。

## 六、自強運動與當代經濟改革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自強運動時期的中國，與清朝末年相比，國際、國內環境大不相同。首先，中國不再受到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不再有被瓜分的危機。其次，中央統治權力的深入基層，是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無法相比的。再者，交通的發達，信息的傳播，教育的普及，也是一百多年前難以想像的。

儘管如此，兩個時代也有一些共同點。第一，與發達國家相比，兩個時代的中國都是經濟落後，人民貧困。雖然今天的中國經濟較清代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但發達國家進步更快，中國的差距並未縮小。第二，在政治上，兩個時代的中國都離民主政治還有一段遙遠的路要走。第三，在改革運動之前，兩個時代的中國都是閉關自守的，而對外開放則是兩次改革的內容之一。第四，兩個時代的領導階層內都有一部分較有見識的人認識到，不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因此從盲目自大到開始向外國學習，這些人因而形成洋務派或改革派。第五，兩次改革運動都把向發達國家學習的重點放在科學技術上，而對外來的制度與意識形態採取排斥態度。

雖然自強運動與今天的經濟改革有許多相異之處，但研究自強運動的經驗教訓，使經濟改革避免自強運動走過的彎路，應該是十分有益的。

## 七、自強運動對經濟改革的啓示之一 必須鼓勵民營企業發展

自西漢以來兩千年的歷史記載了鹽鐵官營工業的失敗，自強運動的歷史也記錄了清代官辦與官督商辦工業的弊病叢生。中國的年輕一代，經歷了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工業發展的緩慢、農業集體化失敗與一九七九年以來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我們看到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也瞭解到這些國家內的國營企業效率不高，其經濟主要靠私營企業推動。這一切說明，經濟必須以民營為主。官辦企業出於良好的願望，但因為違背了客觀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不能利用人們利己的慾望去為社會創造財富，其結果多為阻礙經濟發展而不是促進經濟發展。

雖然歷史與現實都證明官營經濟的失敗，然而現在許多人仍然把私有經濟當成洪水猛獸，驚恐萬狀，這是非常不利於經濟改革的。要想在經濟上高速發展，就必須鼓勵民辦企業發展，使私有經濟佔主導地位。鼓勵私有企業發展的前提是在法律上明確保障私有財產，任何個人、團體、政府不得侵犯。任何社會，只有當民衆富裕時，國家才會富裕。「國富民窮」不是真正的富裕。

有些人反對私有經濟的理由之一是私有經濟將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在全國經濟由少數幾個有權有勢的家族壟斷的私有制經濟中，確實可能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但只要實施民主政治，制定適當的法律抑制壟斷，鼓勵競爭，是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而一定程度的收入差別則是激勵人們努力工作所必需的。實際上

，一些以私有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與地區，如日本、台灣、荷蘭、瑞士等，其貧富差別比中國還小。用五分位法研究的結果顯示，若把全部家庭按收入高低分成五組，則上述國家與地區的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收入之比為四到四點五，而中國則為五至六。私有經濟中貧富差別主要表現在資產擁有的多寡與個人收入的高低上；這種差別，如果并不大，則會提高人們的工作積極性，有利於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必然採用國家計劃制度，從而必然禁止人民自由遷移與選擇職業，因此貧富差別主要表現在行業與地區差別上，例如中國在五十年代以後不斷擴大的城鄉差別。因為用國家法令形式規定人們生來的不平等（例如，如無特殊情況，農民的子子孫孫只能當農民），沒有自由經濟中所必需的自由進入，這種差別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當然，發展私有經濟并非意味着要在一夜之間把所有的國營企業轉為民營，而是應當首先鼓勵民辦企業的創立與發展，待民間有了充分的財力後，再分階段先小後大，逐步將多數國營企業轉為民營。在此同時，民營工業的大規模發展，將需要大批勞動力，從而為剩餘農業勞動力找到出路；由較少農民來經營農業可以提高生產規模，促使農業現代化，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後面貌。

## 八、啓示之二：必須實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全面改革

自強運動對當今改革的啓示之二是必須實行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諸方面的全面改革，

不能僅僅學習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而在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上堅持舊的一套。沒有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改革相配合，單純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改革的目標與方向應該以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為依據，而不是以某種主義或某部經典著作為依據。在改革中不應有預先制定的任何框框限制，一切以是否對人民、對社會有利來決定。

對在制度與思想文化上向發達國家學習持反對意見的幾種論點值得討論。論點之一是必須堅持本國特點，外國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不適合本國國情。我們可以日本為例來說明這個論點的不可取。日本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先是在明治維新中并未固執地堅持「本國特點」；再於二次大戰後在美軍佔領下制定和平憲法，受美式民主影響極深。但我們能說今天的日本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沒有「日本特點」嗎？應該看到，像先進的科學技術一樣，優越的制度創設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其原理沒有國界可分。

當然，提倡全方位開放，學習國外先進的制度創設與思想文化，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採用其原理，根據各國具體情況，使先進的思想文化與傳統文化相融洽。這裡需要的是虛心學習，過分堅持「本國特點」容易導致排斥外來文化。即使不強調堅持「本國特點」，傳統文化中優秀的一面也是不會被外來文化淹沒的，只有落後的一面才會被拋棄。

對全面改革持反對意見的論點之二是發達國家也不完善。誠然，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社會制度，只有相對先進的制度。我們應該採取虛心的態度，只要別的社會制度在某一方面比我們相對進步，這一方面就值得我們學習。

# 政專 治制

## 不為經濟發展所需

——也談東亞四小龍經濟經驗

● 包賽

近年來，由於政治上并不民主的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的成就，使得一種觀點頗為流行：對於經濟後起國家，政治專制對經濟發展不僅無害，而且起着促進作用。東亞經驗的誘人之處在於其提供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領先於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可能性。筆者在注意到東亞事實的同時，認為：①東亞四小龍的經驗有着極為特殊的一面，其政治專制得以（在無大害的情況下）維持許久且與經濟起飛并存，是與非經濟的、外部的壓力有着密切的關係；②政治專制，即使在東亞，不僅不為經濟發展所需，而且起着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③在沒有上述外部壓力的地方政治專制和經濟起飛難以并行。

以下，筆者將對上述觀點進行評述。

### 專制為經濟發展所需嗎？

在東亞四小龍經驗中，政治專制對經濟成長的正面作用一般歸納為：①經濟運作上的集體主義；②高積累，低消耗；③政府對經濟的指導和幹預；④強化教育和教育過程中的權威主義。然而，問題在於上述四個作用是否一定有賴於政治專制？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還應當想到另一個東亞國家——日本的例子。戰後的日本是一個政治上徹底的民主國家。無論

是言論出版自由還是政黨政治都得以正常運作，在自由黨和民主黨聯合成為自民黨之前，社會黨選會一度掌握政權。經濟在民主的日本比在專制的四小龍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使其在二十年前便衝出亞洲走向世界，這其中當然有着許多有利的國際條件。問題是除了這些外部條件，本節開始時提到的四個特徵恰恰也是日本自身經驗的總結。集體主義，高積累低消耗，政府指導，強化教育恰恰也是日本人在發展過程中的特徵所在。日本例子是對專制促進論、專制必需論的反證。如果說日本人傳統的團



今日香港

隊精神和會上自謙的民族文化使專制成為不必要的話，那麼韓人也有着相同的民族傳統。專制可能會因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存在（如在人類從事最簡單的勞動的時代），但是專制絕不會因經濟發展所不需要而自行消亡。專制的結束歷來是人民鬭爭的結果，是民主力量積累的產物。從專制造成腐化，引起人民的不滿，至民主力量積累到足以使專制結束的這段時間內，專制毫無疑問地影響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着經濟的發展速度。南韓前軍人總統全斗煥的親屬的貪污事件，正是統治集團長期地大規模地腐化的一個縮影。這些怎麼能不阻礙經濟發展呢？

### 四小龍的政治專制何以維持？

如果我們透過政治專制與經濟成長并行的現象，思考東亞諸國專制得以維持的原因，便會發現東亞四小龍有着共通的（但特殊於其他國家的）現象，這些國家都有着威脅其生存的強大的外部政治壓力。

南韓和台灣都面對着強大的共產主義對手，處於共產主義運動的直接壓力之下，存在着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或行政區域能否生存的問題。新加坡不過是一個城市鑲在馬來西亞半島上，新加坡國內若發生任何共產主義的動盪都有着被反共的馬來西亞領國併吞的可能。正因為如此，上述三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專制無一不以反共為出發點。我們還應當注意到這些反共專制乃是五十年代政治的延續。而五十年代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黃金時代，是一個共產主義大有可能占領東亞國家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出於恐共、防共的考慮，這些地方人民中的中產階級及知識界，都比較容易做出

接受（反共）專制的選擇。因為專制得以出師有名，所以它對人們情緒和積極性的影響，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積極性的影響降到最低點。

與此同時，國際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出於遏制共產主義的需要，對東亞的一些獨裁政權採取了輸血打氣的政策。例如，同是一個美國，在日本支持打垮了專制的重要支柱——軍閥，在南韓則一手扶植起了一個軍事獨裁政權。這是東亞專制得以維持的又一個國際原因。

香港雖然也被認為不民主，但很難算作專制，充其量不過是個半專制。因為在那裡輿論、出版是自由的，即使是這種半專制的存在，也不是由於經濟成長的需要，而是共產主義壓力和殖民地政治作用下的結果。

## 東亞四小龍模式能重演嗎？

這裡的「東亞四小龍模式」，指的是經濟高速成長與政治專制的并行。筆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難。其理由如下：



今日台灣

(一) 施行專制的外部借口越來越不容易找到。由於共產主義的黃金時代已屬不再，共產主義不再成爲非共產國家的生存威脅（除非阿富汗那樣的直接軍事入侵）。非共產國家政府再也拿不出像樣的理由，制定法律（如台灣的非常時期勸亂法），實行專制。對共產國家來說，正面臨着向西方開放的改革運動，以往的帝國主義敵視、顛覆說已失去市場。蘇聯的控制乃至直接軍事入侵可能成爲東歐國家得以維持專制的外部壓力，但仍成不了可以講的出來的名正言順的借口。對於非東歐的共產國家來說，則連這個外部借口都找不到了。

(二) 人類的生產方式與三十多年前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腦力勞動的比重已大大提高，而創造性的腦力勞動本身就要求有一個更爲民主和自由的環境。

(三) 隨着腦力勞動比重的提高，一個有志興起的民族必須大力興辦教育，造就一大批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管理人材，而這一切又勢必造成一個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階層的興起。

(四) 專制在今天不僅不爲經濟發展所需，而且由於上面提到的原因，專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越來越大。即使人們能夠做到像東亞四小龍那樣，在專制條件下發展經濟，也絕不能趕上和超過它們，南韓等東亞國家在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今天經濟發展速度將會更快。而一個有志趕超的國家則必需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走一條更快的發展道路。

總之，當人們注意到：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舉世矚目但并不民主這一事實時，還應當認識到這裡一個在特定環境、特定時間下的事實，這就是一個在今天不具普遍性的、難以爲後起國家效法的例子。

#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 一個值得澄清的情況

## 簡介日本的國會選舉

· 范柏

不久前，大陸女作家戴厚英在接受「華僑日報」記者採訪時說：「不一定必要反對黨的監察形式。像日本一向是自民黨的天下，但是他們黨裡有派呀」。筆者認為這是對日本例子的一個不符合事實的引用。鑒於國內還有其他名人在強調黨內民主的重要性時引用過「自民黨一黨獨大，但是有派」的例子。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日本政黨政治的現實做一點簡單的感性介紹。

### 政治體制

日本施行責任內閣制，政府由在參、眾兩院擁有半數以上議員的政黨組閣。當沒有一個政黨擁有半數以上席位時，則由能夠達到這個議員人數的數黨聯合體組織政府。

### 國會選舉制度

日本參、眾兩院各有二百至三百個議員（人數每稍有變化），參議員在全國範圍內由選民直接選舉，眾議員將名額分到各地區（縣、都、府、道）直接選舉產生。任何人均有權通過黨派、團體推薦或自薦成爲候選人。候選人須予付二百萬日元的選舉費用。當最後，該候選人的得票數超過投票者的百分之三以上時

，這筆錢如數退還。

選舉的事務性費用（各黨的宣傳費除外）由國家支付。這其中包括電視台爲每一位候選人提供均等的演講機會的費用。各商業性大報在介紹候選人時有平等地介紹每一位候選人的義務（各黨報除外）。

參議員的最終產生是通過一個叫做比例制的辦法，即通過各黨及無黨人士獲得選票的總數多寡決定各黨及無黨人士向參議院輸送議員人數的比例。然後各黨按其推薦的候選人得票的多寡爲序定出符合比例要求的議員人數。眾議員的產生是將名額按人口比例分配到地方，由地方選民直接投票，按各個候選人得票的數目決定取捨。



中曾根在議會中

### 政治現實

上述選舉制度在日本已實行多年，除自由黨和民主黨聯合而成的自民黨外，社會黨也曾一度當過政。多年來一直執政的自民黨在國會大選中有以足夠超過半數議員人數而大勝的時候，也有議員人數不足半數，從而不得不和其他政黨（如新自由俱樂部）聯合組閣的慘敗。

國會大選前各政黨的競選宣傳都非常熱烈，在熱烈程度上幾大在野黨往往超過執政的自民黨，各大政黨的競選綱領中有着關於社會基本制度的根本分歧，這點與美國兩大黨之間的分歧大不一樣。不過近年來由於所有共產主義陣營國家不成功的實踐，主張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黨和主張共產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在其社會制度上的理想多有改變。盡管如此，其理想與世界範圍內的實踐之間的巨大差距，始終成爲他們在競選中的包袱。

不管怎麼說，各政黨之間的分歧遠比自民黨內部各派之爭更公開，更根本性，更旗幟鮮明。自民黨內部確有公開派別存在，這也許是它能夠代表更廣泛的階層，從而戰勝對手的原因之一。但是各派之間的分歧與爭奪不一定時時公開，前一次中曾根當選總裁是靠全黨投票戰勝阿部、中村等對手的，而這次竹下當選則是所謂「總裁裁定」前後的一系列政治暗關的結果。

可以肯定地說，自民黨內部的派別之爭遠遠代替不了經由大眾輿論和在各在野黨所實行的群眾監督。國會的每一次辯論NHK都實況播出，在辯論中群眾見到的幾乎永遠是閣僚及自民黨議員與其他在野黨議員之間的爭論，而絕不是自民黨各派議員之間的爭吵。這裡我們還可以舉一個新近的例子，去年里根政府和中曾

根政府分別在各自國家施行內容相同的稅制改革——縮小不同收入者之間稅率的梯度，普遍增加商品銷售稅。這一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的稅制改革在美國得以順利推行，在日本則因民衆及代表平民階級的在野黨（社、共黨）的強烈反對而擱淺了。筆者還曾發現不少日本同學投共產黨的票，問及原由則答曰：雖不太喜歡共產黨，但更不喜歡自民黨在國會中過於強大。爲使自民黨有所制衡不致過強，以致馬鹿（意：胡來，愚蠢），才投最堅決的反對黨——共產黨的票。可見在日本政壇上，事實上的對權力的制約是來自黨外，而絕非執政黨黨內。

另外來自黨外的、社會的監察，不僅對執政者與非執政者之間的關係有所制約，而且還影響着各黨內部人們的關係。如「日本紅軍」（共產黨極左派組織，已分裂出於共產黨）的內部同伙之間的慘殺，殺害其同志者得以判刑，只基於日本國法而絕非該黨內部之章程。像日本這樣一個至今還保留着強烈的團隊精神和唯上是尊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民族，倘若沒有全社會範圍內的徹底的民主政治，那麼在各黨派、團體內部更可能出現的恐怕不是民主，而是專制。

總之，日本的實際情況對那種「只要執政黨有公開的派別，不需要黨外力量便可達到權力制衡」的論點只能給出反證。除非一個執政黨變成全民都可成爲其天然黨員的全民黨，黨內派別之爭與黨與黨之間的分歧一定會有着質的不同。那種好人進入執政黨從而改變政權顏色的論點也缺乏根據。殊不見當年不少國家的共產黨內也不乏爲理想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的好人，到頭來還不是在專制制度下異化了嗎？況且在專制制度下，好人混上去的機率并不一定比壞人大。

# 我的夢

在現實不盡人意的時候，人往往會做夢，這時的夢大都是美好的夢，這些夢想推動着人們去探索、追求，我也有一個夢。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中國成了一個大花園。楊柳低垂，處處泉水叮咚。陽光傾瀉下來，照耀着綠茸茸草坪。鴿子在街頭徜徉，人們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有了言論的自由，可以自由發表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批評國家公職人員的營私舞弊行爲，我們有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報紙雜誌，不再耽心因政見不同而被投入監獄。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有了信仰的自由，沒有人強迫進行政治學習，沒有政治考試，不用爲了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死記硬背什麼主義。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有了思想的自由，沒有人來評「思想好」或者「思想覺悟高」，不再耽心「思想不好」而沒有了前程憂心忡忡。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沒有了檔案的陰影，誰知道他們在裡面塞了些什麼而始終像烏雲一樣籠罩着我的一生。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有權了解政府把征收的巨額稅款用來幹了些什麼，我們有權力阻止爲某個人過生日而動用公款。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有了一個公平的法律制度，在這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能

夠看到「王子犯法，與民同罪」。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學會了如何處理鄰裡關係，能像美國那樣邊界不用設防，國民可以自由出入，北面的內蒙古和蘇聯，西南的印度和阿富汗，東南的柬埔寨、越南，東北的朝鮮都成了我們的朋友，我們不用再耗費巨資戍邊。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能夠把所有的貪官污吏罷免。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人們將根據我的能力，而不是父母或者養父的權力和地位對我進行判斷。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不再走後門去買雞魚肉蛋，我的家裡也有了冰箱彩電、空調地毯，小汽車成了普通人的代步工具，不再標誌着什麼人的官銜。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我們能夠自由選擇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夫妻不再分居，牛郎織女天天過七月初七。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受教育成了我們的權利，而不是黨的恩惠，我們不再爲了受到教育而失去自由，簽賣身契一樣的合同。

我夢想有那麼一天，能夠看到商店飯店和醫院裡工作人員的笑臉。

……  
……  
……  
這是我的夢，不該是夢的夢，但願有一天，這夢不再是夢。

## 說不明白

# 中央情報局

## 關於中國的研究報告(下)

譯 倩 仙 聞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改革派領導人是一次嚴竣的考驗。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罷黜之後，中共的改革派就試圖將年輕實幹的幹部推上決策崗位，以平衡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對改革派的責難，促使市場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總的說來，這次會議取得了以下成果：

▲趙紫陽被確定為黨的總書記，並選出了四名新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的權力機構。這表明了以趙紫陽為首的主張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改革派與以李鵬總理為首的主張加強中央集中管理經濟的保守派之間的平衡。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使得中共領導階層中改革派的陣容有所加強和擴大。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這次仍留在政治局，這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保守派是一種打擊。

▲這次會議審批並通過了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全面改革提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認為經濟改革需要一百年的實踐，在「公有制」佔統治地位的前提下應當允許「私有制」以及土地和企業的租借。

▲趙紫陽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應更多地利用市場對原材料、資本、技術以及勞力進行調節。中央各部應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制定總的工業政策上，而將具體實施交給下面各級主管部門去做。趙紫陽也對計劃在一九八八年實行的某些對外貿易改革作了評價。他肯定了一九八七年中國在對外貿易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效。然而改革者的改進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領導層中不斷有人透過輿論媒介對改革的速度及範圍提出各種各樣的意見。許多有影響的中國領導人仍然熱衷於用管理者的命令來集中控制經濟，而不是由市場來調節經濟。此外，在通貨膨脹加劇，國家預算赤字增加以及出現大量的計劃外資投資的困境下，改革者在實施許多政策中也面臨着不少的實際問題。

一九八八年的經濟政策

北京已經宣佈了一項比較溫和的一九八八

年度的改革方案。推遲重要的但在政治上比較敏感的價格改革，以便降低通貨膨脹率，增加糧食產量，提高企業效率。李鵬總理三月份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重申，中國一九八八年經濟上最重要的是控制通貨膨脹，提高農業產量。

▲控制投資和通貨膨脹 去年秋季，中共規定對商品價格實行國家控制，今年一月北京又作出一項補充規定，對主要原材料的價格實行國家控制，包括超過國家配額的商品，和以前按市場價所銷售的商品。此外，北京計劃通過緊縮銀行貸款來限制貸款的增長並要求在經濟效益上搞得較好的國營企業通過發放本企業的債券來解決按計劃擴建中的資金不足問題。付給債券持有人的利息應比付給銀行貸款的利率要低，國家也在減少在大規模建設方面的投資。北京正在控制個人消費。領導人希望企業改革將減緩人工工資及獎金的增長，從而控制需求。同時，北京希望通過提高房租從消費者手上回籠一些資金。

▲農業管理 在農業方面，北京正在採取一些重要的刺激糧食生產的措施。

▲提高按國家合同生產和銷售的糧食的價格，北京花了很多時間試圖逐步結束目前的兩套農產品價格體制，減少按合同收購糧食，增加和鼓勵自由市場的糧食銷售，提高國家付給合同糧的價格，制定按質量定價以便自由市場價格銷售高質量的糧食。

▲國家增加在肥料、農藥生產、運輸和分配網路以及如灌溉之類的農業各部門的投資。北京正在集中精力解決糧食生產方面的農業貸款及國家投資。北京也許將農村非農業企業的稅收投入到糧食生產中去。

▲允許農民購買及轉讓土地使用權，從而



有利於更有成效的較大規模的生產。北京最近延長土地的租期，從十五年到三十年，這些措施旨在給農民在土地保養上提供更多的保障。

▲鼓勵農民在生產中使用優良品種、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在過去幾年裡，北京採取了一些國家資助的措施，通過向農業地區提供訓練和資金來提高生產。

北京已感覺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它造成了糧食購買價的提高，北京正在設法盡量降低成本的符合農村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同時北京意識到不能繼續增加獎金，事實上獎金的支付已成為國家預算的一項重大支出。國家正在考慮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來取代獎金的支付，這將成為一九八八年繼續爭論的課題。

增加企業營利 在工業方面，中國官員說過，「合同制」將在一九八八年為企業的管理和提高效率奠定基礎。按照合同制，國家企業將與上級主管局簽署合同，規定最低產量，收入及稅收。中國領導人承認，為了適應由於價格改革而造成的國家供應物資價格的提高，企業必須經營得更有效。由於預算緊縮，各企業必須具備更堅實的金融基礎。

根據中國的統計報導，截至一九八七年底，中國四分之三的大、中型國家工業企業和商業已經採用了合同制。另外，絕大多數中國的小型全民和集體企業已採用了合同制和租約制相結合的型式。這種體制允許工廠經理在工廠交付國家稅收後的剩餘利潤中分享一部份，然而如果虧損，則他們必須付出抵押品或抵押款。

中國領導人相信合同制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並增加了利潤。另外，他們認為合同制有助於他們改進對未保險企業投資費用的控制。儘管中國允許企業從稅收入中扣除貸款，然而對

借戶的信用仍要求過高，合同制的倡導者還主張應減少對經理的約束，允許經理支付工人各類獎金。使工資實際增長率保持在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水平。

然而中國目前有人批評道，一九八八年以後將很難指望合同制繼續取得效益，例如：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簽了許多一年期的合同，這樣到今年下半年就要付一大筆獎金。這就使北京政府在控制通貨膨脹過程中難上加難。同時也會減少企業的利潤，批評人士認為造成以上現象的原因如下：

▲合同制不能遴選好的管理人員。中國一九八七年的統計數字表明，無贏利企業的數目沒有增加，但它們虧損的資金却大大增長。

▲合同制鼓勵經理們爭取完成低指標，而不去致力於改進生產，提高生產的效率。

▲北京政府允許大型國家企業可以人員超編，但卻僅僅生產某些特殊產品而不管這些產品能否獲利或獲利多少，也不管市場的需求。管理人員一多，在管理工作上的責任感就受到了局限。

▲北京一方面提高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及設備的價格，另一方面大多數企業生產產品的產品的銷售價却由政府規定。造成一些工廠經理對低盈利甚至虧損有正當借口。

▲由於合同一般簽定一年至五年，因此限制了對新技術和大型設備的投資，因為這樣的投資從長遠觀點來看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然而不可能在短期內見效。

還有人指出中國的改革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特別是對於必要的工資及物價制度的改革，僅依靠合同制來解決是枉費心機的。去年工業生產情況較好這可歸功於，至少部分歸功於合同制的實行。而價格改革仍面臨着新的挑戰，

只有目前的稅收及價格結構產生新的轉機，才能有力地影響已經簽定合同的企業。

中國領導人期望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新的企業法，限制黨的幹部干預工廠的生產，實行企業破產法鋪平道路。

國家企業法是目前工業政策改變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新的工業政策旨在使企業管理專業化并使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對他們的虧損承擔責任。但如同合同制一樣，新企業法仍存在着模稜兩可的條款。尤其是在新企業法中幾乎每一項要求經理和企業所承擔的責任都受到其他規定的制約。例如，受北京政府所規定的全面價格控制的制約。另外，新企業法對於工廠黨的權力範圍含糊不清，只是要求他們對「黨和國家的所有政策」的執行負責，新企業法并未減少政府行政部門的權威。他們仍為工廠制定生產指標，負責大多數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料、設備的供應和分配。

### 中國的私有工業

在一九八八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對中國的憲法作了修改。為中國正在發展的私有工業提供了法律依據。中國的統計數字說明全國私有工業目前包括三十萬個企業和二十萬個體戶。雖然根據中國新聞報導，少數私有工業僱用了幾百個人而絕大多數私人企業是由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經營。私有工業通常在國家的生產發展和產量提高上佔領先地位。中國的私有工業僱用的工人僅佔全國工業勞動力的三分之一，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量的百分之一不到。

### 改革外貿體制

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國領導人宣佈了一項計劃，將對國家的貿易體制作重大改革。這項計劃原訂一九八七年實行，但由於政治上的動蕩以及一九八七年初國際間交往的形勢比較緊張而不得不作罷。在最近幾個月裡，貿易改革在幾項重要政策中再次得以重申：

國務院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份批准了一項外貿改革草案，允許私有工廠和貿易公司在進出口貿易中擁有較大的自由權并對他們自己企業的利潤和虧損負更大的責任。

一九八八年一月在視察了中國幾個沿海城市以後，趙紫陽宣佈，中國應該採取以外貿帶動經濟發展的政策。重點放在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沿海地區投資和辦廠。這一策略注重使用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來生產價值高且要求勞力密集的出口產品。認識到國外在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可在中國的出口工業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趙紫陽的計劃旨在進一步提高對中國的投資熱。

北京政府在今年二、三月份舉辦了三次高級首長會議，專門討論外貿改革、中國的外國投資環境以及沿海地區的發展策略。討論了廣東、福建以及最近開放的海南島等特區的改革試驗。

李鵬總理在三月份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將貿易改革和沿海地區發展策略列為中國一九八八年經濟發展的優先部分。

今年中國決策人士對外貿提出二項引人注意的見解。中國領導人說過，他們相信最近世界經濟的變化導致日本、南韓和台灣貨幣的增值給中國在西方市場提供了一次歷史性的機會。因為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比亞洲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價格要低。另外中國一九八七年在貿

易方面的收益以及高價外匯儲備給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相當多的餘地。

中國至今尚未最終通過一項對外貿易方面改革的計劃。然而從有關這一課題中國領導人所提出的無數陳述中，我們相信這個領域的改革將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分散中央集權 省市將掌管全國貿易公司在當地的分公司并直接與其分公司簽訂合同（這與在全國工業系統所採用的方式相類似）、分派出口任務、分配外貿所得。更多的私有工廠。私有工廠將被允許參與貿易事務，中國對外經濟關係及貿易部（經貿部）和中央各對外貿易公司將繼續提供總的指導性政策，掌管中國與蘇聯及東歐的貿易，審批大宗購買，控制中國必須限制的外銷產品（這些受限制的產品是國內所短缺的或受外國進口限制的）。

提高外貿單位的留利率 超出按合同指標所應得的外貿收入將被允許該公司在多餘收入中儲留一定的比例。北京政府已允許輕工業品、藝術品、手工藝品和服裝出口商具有比其他企業高的多餘收入留利率，外貿留利率各個省不一，在作為經濟改革試驗的廣東、福建和海南島等地區外貿留利率高於一般地區。

放寬對流通貨幣的控制 外貿留利這一新政策帶來了一個自然產物。北京已宣佈具有多餘外匯的企業將被允許在一些大城市中設立貨幣兌換中心以額外費用交換率將外匯兌換成人幣。這實際上是一種政策的延續。北京政府已允許這一政策在外資企業以及特區中的國營企業中實行。在放寬政府對人民幣與外匯交換實行統一控制的時候，北京還準備放鬆對可變換的外幣之間互相兌換的控制。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今年三月份批准了成立代表中國企業管理可變通的外幣買賣的金融機構。這就允許

企業可以掙的某種外匯兌換成另一種外匯去購買進口商品。也可在當美元一旦貶值時，這些企業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不至於因此而受到價值方面的損失。

其他變化也很引人注目。例如，北京政府也許會調整國內的稅收制度以利用出口高價產品的企業，某些領導人還建議外貿單位職工的工資收入應與外貿所得聯繫起來，很多人建議將貿易公司改為收佣金的代理行。他們掌管進出口業務但只收服務費，這種方法使企業獨立對其進出口業務承擔經濟責任，同時亦可從中獲得應得的利潤。而不是僅作為貿易公司的一個附屬機構。

這些改革的影響力將隨着中國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通常價格之間的差別而受到限制。雖然貿易公司和生產企業將被要求對利潤和虧損承擔責任，但許多企業對因虧損而承擔責任這一點提出，造成虧損的某些因素并不在他們的管理範圍內。結果貿易權的下放也許和以前一樣地方公司的虧損由中央政府承擔，只不過少承擔一些而已。另外即使一些企業和公司將被允許開外匯帳戶，北京政府將保留對大多數國家貨幣儲存的控制權。同時保留中央對使用庫存外匯購買進口物資的審批權。

國際關稅及貿易協約組織成員國（中國正在申請加入該組織）將密切注視中國外貿改革的進展從而決定這些改革是否使中國的外貿體制與國際關稅及貿易協約組織的原則相一致。

### 價格改革的觀點

雖然現在大多數人都認為需要用價格來精確地反映經濟上相對的物資短缺；中國領導人尚未對何時及如何對中國不合理的價格結構作

出進一步的改革達成一致意見。不實行價格改革，中國的企圖使企業對市場需求承擔更多的責任，同時利用破產法對經營不當的個人追究更多責任的做法均將付諸東流。經營得當并生產市場需求產品的企業會出現虧損，這僅僅是因為生產成本大於產品的價格。同樣北京或許會意識到如果不靠增加收購價格來鼓勵生產市場所需的農產品以及增加由國家標價的非必須的消費品（北京政府企圖控制這類需求）的價格，中國的農業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

如何在不干擾經濟，不引起消費者報怨以及不增加國家額外負擔的前提下完成所需的價格調整迄今尚未制定出一項切實可行的方案，很明顯，中國領導為了減少混亂，寧願放慢步伐。北京政府正在努力彌補許多商品（包括糧食和原材料）計劃價格和市場實際價格之間的差別，同時增加市場短缺商品的生產。逐步減少按國家計劃所銷售的部分而增加按市場價所銷售的部分。

見附錄一

### 對北京政府改革的評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座分水嶺。這次會議宣佈了鄧小平的上台以及北京政府有關經濟改革政策的制定。現在距當時快十年了。中國改革的核心是實用主義。北京已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理論，正在通過作群眾政治動員來支持理性的發展策略，包括經濟決策權的下放，增加物質刺激以及加強與西方的經濟接觸。許多改革對中國來說並非新鮮，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已經試用過，至少討論過。但是一

九七八年以來這段時期是這些政策第一次在沒有如同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干擾的情況下得以執行的。

變化來自農村，並且在農村得到最快的進展。祇有在偏遠地區仍舊保留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在這一制度下，地方黨的幹部對農村生產的決定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具有絕對的控制。現在農業生產實行包產到戶，由單家獨戶向國家訂立長期合同，租用國家土地進行生產。農民除了按協議必須向國家提供一些糧食外，對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有較大的選擇餘地。在過去幾年裡，幾百萬農民離開了農業生產崗位到農村工業、運輸及商業單位去工作。然而，政府仍在農村經濟中保持重要角色。例如，農民仍然依靠政府提供的商品，如自行車及電冰箱。儘管出現一些改善的跡象，農民仍對於住房困難，污染以及如交通擁擠之類的不充足服務提出抱怨。再者，一些農村屬民在最近幾年裡的實際收入已經下降。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屬民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仍處於最低水平。最後，有關對企業破產法及增加勞力流動的政策之討論將可能增加工人對工作不穩定性的阻礙。

### 對改革的解釋

鄧小平及其他力主改革的人士認為，當今中國從改革中獲得的成就遠遠超過改革所帶來的某些副作用。他們堅持認為改革中所出現的缺點錯誤只能靠政策的完善來加以糾正。儘管如此，改革仍受到政治上的長期論戰以及經濟上未曾預料到的發展的打擊。為了回顧和評價迄今為止改革的進展，我們將中國的改革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農業方面的成功（一九七八—一九八四）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中國國內改革的主要項目是貫徹執行新的農村經濟政治。這一階段始於在某些地區對「包產到戶」政策的試點。按照這一政策，農民單家獨戶控制土地，作出耕作品種的決定，在幾乎沒有外部權威干擾的情況下自耕自作。這種試點最早在趙紫陽領導的四川省以及萬里領導的安徽省進行。到一九八四年底包產到戶的政策代替了生產隊。五十年代中期幾乎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的集體制模式。由於國家對農產品收購價的提高，自由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再加上天公作美，這一階段的改革給一九八四年的糧食生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到一九八五年中國成爲糧食輸出國。

國內在其他領域的絕大多數改革，包括工業管理、財政和科技也在這一階段開始萌芽。例如四川省重慶市被當時作爲給工廠以較多自主權的試點城市。國家挑選了一些研究機關作爲企業直接與工廠簽定合同，通過提供新技術以及使科學爲整個經濟服務來改進生產，提高效率。但是直到八十年代初，這些非農業領域的改革相對農業領域的改革來說還很有限。這一階段中國國內的改革伴隨着一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更爲開放的經濟政策。北京政府特別努力吸引西方國家對中國工業進行投資和技術輸入。為了使投資者相信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將永久不變，北京政府在一九七九年通過了中外合資企業法，並開始了大規模的技術進口項目，其重點放在向日本美國及西歐購買整套工廠設備。到一九八〇年，北京政府已經

在中國南方開闢了四個經濟特區，通過提供低稅率及理想的投資方式來招徠外國投資者。北京政府企圖使這些特區成爲中國學習外國管理和生產技術的窗口，同時可以適當地去除了由於開放而帶來的資本主義思想及生活方式的侵蝕。特區的建立還有一個政治目的。它顯示了中共對非共產化經濟形式的容忍以求實現鄧小平在香港和台灣的歸統上所制定的「一國兩制」的政策。

### 第二階段：城市改革（一九八四—一九八七）

基於農村改革的成功以及抵制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有關西方「精神污染」威脅中國社會結構的挑戰，改革派領導人在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將改革的重點轉移至在城市工業部門執行以市場經濟爲主的政策。趙紫陽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及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黨的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演講是這一階段的標誌也是改革問題上的樂觀主義者的全盛時期。

儘管如此，胡耀邦的講話發表以後，改革者遇到了未曾預料到的經濟上的困難和嚴肅的選擇。首先，經過連續四年的大幅度增產，一九八五年糧食產量下降，從而開始了生產下降的階段以及新農業政策是否要繼續下去的辯論。

更有甚者，改革者在城市改革開始時，錯誤地估計了他們控制微觀經濟的能力。一九八四年下半年開始的增加工資、多發獎金和擴大進口之風使得一九八五年的經濟出現畸形繁榮，從而迫使北京政府在人民面前失去信用，推遲價格改革，再次對對外貿易實行中央控制以

求解脫由於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壓力以及中國貿易平衡的嚴重失調。

當經濟特區特別是深圳受到批評時，改革政策在一九八五年經受了又一打擊。儘管北京政府在絕大部份的開支均有上升，特區却沒能吸引生產性投資，而僅僅成爲房地產中心及貨幣兌換地。特區也同時成爲從事贏利而非生產性的進、出口交易的皮包公司的基地。深圳更成爲高要求消費品及微型計算機以低關稅進入中國的通道。單獨貿易商亦通過過出口然後再進入中國商品而賺錢，他們在這兩次交易中均可得到中國政府的補償從而可以彌補中國商品國內銷售價及出口價之間的價差。一九八五年初夏，中國南方海南島的一樁汽車進口中貪污和受賄的案件激起了老百姓極大的憤慨。這對於對特區幹部管理不當以及貪污腐化的指控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中國在發展特區，預防特區幹部貪污腐化中花了大量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投資，然而一九八五年事件的產生沾污了特區以及當地幹部的名聲。

這一時期的改革有其成功之處。北京政府成功地增加了紡織品及其他產品的出口從而彌補其石油出口中的損失。農村企業的突趨繁榮在吸收多餘的農村勞力方面作出了進步。經濟作爲整體來看，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在發展。然而在主要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國營企業中情況令人失望。早期的農村改革給某些國營工廠帶來了不良的影響。他們增加成本，使管理人員過多地關心工人的福利而不是無心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批評家還發現中國大量引進技術這點，存在問題。他們發現由於缺乏合格的技術人材，能源及其他資源的限制，工廠管理人員沒有足夠的刺激以及技術選擇稀少而使中國進口的許多昂貴的外國設備束之高閣，碌碌而無

爲。

這一階段還出現了對於合適的改革策略的越來越公開的辯論。鄧小平在主張大膽改革者及主張放慢改革步伐，縮小改革範圍的人之間小心謹慎地安置自己的位置，企圖維持領導層意見一致的表面現象。但是社會上的干擾，包括一九八六年末的學生示威遊行，增強了某些領導對於改革進展太快，甚至會削弱黨的權威的恐懼。

一九八七年一月黨的領袖胡耀邦的倒台是由複雜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勾心鬥角所造成的。胡耀邦的倒台使改革者在加快政治自由化中失去了言論最有力的，最有權力的支持者。同時也失去了經濟發展受消費者需求所決定的政策的最大靠山。雖然在幾個月內，隨着胡耀邦的下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接近尾聲，通貨膨脹的增加，糧食產量的下降縮小了近期中中國經濟方面領導人對於政治選擇的範圍，從而限制了政策辯論的範圍。

### 第三階段：強調穩定（一九八七至今）

中國目前的形勢對改革的倡導者來說是一只裝有混合物的袋子。「改革」仍舊是一句政治口號。主要的改革領導人趙紫陽代替胡耀邦而當了黨的領袖。其他一些年輕的改革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擔任委員及常委。一些頑固抵毀改革的黨的官員破有力地逐出政治局。事實上，現在已經不再有可能簡單地說某人是一「改革領導人」。所有中國領導人現在都成了改革者。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說，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擴大範圍。

然而同時由於經濟上的不景氣使得中國領導人推遲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項目，包括價格改

附錄一

中國：經濟指示表（選）  
八年階段內變化百分比微觀經濟指示表

	1978	1986
農業生產毛值（億元）	180.1	301.0
糧食（百萬噸）	304.8	391.0
水果（百萬噸）	6.6	13.5
豬肉/牛肉/羊肉（百萬噸）	8.6	19.2
工業生產毛值（億元）	439.6	1,031.0
原鋼（百萬噸）	31.8	52.2
原煤（百萬噸）	618.0	894.0
原油（百萬噸）	104.1	130.7
電力（億千瓦小時）	256.6	449.5
化學工業（億元）	47.7	108.5
紡織工業（億元）	52.2	131.7
機器製造工業（億元）	101.8	235.1
鄉鎮工業（億元）	18.3	128.1
工業生產毛值（按所有狀況分）		
國家（億元）	356.0	711.0
集體（億元）	84.0	299.0
私有和個體（億元）（少）	1.0	10.0
進口（億美元）	11.0	88.0
出口（億美元）	10.0	64.0
高等教育畢業生	164,581.0	392,800.0
工程師	1,571,200.0	3,581,200.0
科學研究人員	90,500.0	365,800.0

附錄二

生活水平指示表

	1978	1986
國民經濟人均收入		
農民（元）	134.0	424.0
城市工人（元）	614.0	1,329.0
人均儲蓄（元）	21.9	211.0
人均住房面積		
城市（平方米）	4.2	8.0
農村（平方米）	8.1	15.3
人均食品消費		
糧食（公斤）	195.5	255.9
豬肉（公斤）	7.7	14.3
糖（公斤）	3.4	6.1
消費品擁有情況		
自行車（百萬）	74.3	258.0
電視機（百萬）	3.0	92.1
縫紉機（百萬）	34.0	109.4

革，讓領導人利用行政大權來維持對進口的控制以及在通貨膨脹中胡作非為。這一階段一件值得引起注意的事情是拉長改革所需的時間。改革領導者及經濟學家現在說中國的改革需要花幾十年時間才能達到初步的改革目標。這一拉長時間的趨勢或許正是當中國朝著更以市場經濟為主而努力時中國所必須經歷的一步。目前這一階段的另一個特點是喪失了一個明確的目標以及達到既定目標的適當途徑。這與十年前不一樣，當時明確地提出了改革這一議題，制定了一些較實用的政策。另一種對目前改革狀況的評價是，在通往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中國正在冒半途而廢之險。這樣的評價在很

多方面有所反映。一些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目前處於半改革，半計劃經濟的狀況。趙紫陽說，改革中的停頓可能導致倒退。另外有人否定改革的目标是實現市場經濟，相反，是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這種制度下市場力將與國家控制共同存在。因此，雖然現在所有的中國領導人都認為自己是改革者，但却缺乏對改革後中國的最終形象的一致看法。

見附錄二

中國的外商投資政策

最近幾年來，西方投資商公開表達了他們對進入中國市場的有限通道感到不滿。他們要

把在中國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寄匯回國，用以維持自己國內的生產，然而要換成外匯却是十分困難的事。另外材料和工資價格的上漲，官僚機構層層設障，交通、交流及動力資源的不足，使他們對在中國的投資前景擔憂，許多人對中國無健全商業法，特別是無專門的有關投資的條款而感到不安。

在前一年半時間裡，北京政府在一九八六年十月頒布了一些國家法令，其中對於外商投資作出了較多的原則上的規定。新法律如下：

中國的中外合資企業有權僱用和解僱中國工人。

對於中外合資企業進口的用於生產出口物

相 同 性	不 同 性
農 業 包產到戶	蘇聯：包產到戶只是農業勞動組織的一種形成。 中國：包產到戶為主要形式。 蘇聯：保留集體農莊及國營農場。 中國：廢除人民公社制。 蘇聯：農產品的三分之二由國家征購。 中國：糧食生產的百分之十五由國家硬性收購。 中國：農民有較多地選擇種什麼東西及從事何種農村工業。
企業管理 企業對每天的生產有較多的決定權  企業可以提取較多利潤	蘇聯：國家計劃經濟仍佔主導地位。 中國：相當程度取消了中央計劃。  蘇聯：經理由工人選舉，上級部門「確認」工廠領導。 中國：上級主管局指定經理。
價格、工資 增加將支付與生產聯繫起來的機構  允許部份產品接受市場影響的價格銷售	中國：早已放棄了對許多物價的定價權，然而許多主要產品的價格仍由中央決定。 蘇聯：計劃給予企業以有限的定價權。 中國：將作進一步的價格改革。 蘇聯：計劃對批發及零售價的中央控制作些修改。
對外貿易 嚴格的中央控制 允許部份單位直接與外商貿易 允許合資企業	中國：已開放了對外國投資者有較大引誘力的經濟特區。 中國：允許外資企業，已批准了幾千個合資企業。 蘇聯：限止外商的股份在合資企業中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出現較少合資企業。
破 產 用來作為一種威脅來促使效率提高  並非旨在迫使大量工廠關閉。	中國：在一九八六年通過破產法，將於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或一九八九年初起執行。 蘇聯：去年通過破產法。
私人企業 鼓勵一些小型的個體企業，主要是服務性行業	蘇聯：局限於學生、家庭婦女及退休人員。 中國：在農村較為普遍，佔城市勞力的百分之三。

品的零部件免除進口關稅及牌照稅。  
 允許中外合資企業按下列方法在外匯不足情況下獲取硬通幣：出口非該企業生產的中國商品；利用多餘的人民幣向別的中外合資企業購買外匯。  
 外商將其在華所得匯寄回國，免稅。外商將其所獲利潤再投資則不再交所得稅。對於在生產中採用先進技術的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降低收稅率。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所得稅只要交一半。  
 允許中外合資企業向購買該企業生產的產品的中國客戶征收外匯，因為否則的話這些產品也是用於出口創外匯的。  
 北京政府允許各省市試驗，增加鼓勵外資流入自己地區的附加條款，大多數省市都試行了，並與其他地區競爭對外資的吸引。一九八八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外合資企業承包法旨在鼓勵外資在不公平的情況下從事合作生產活動。雖然北京政府在一九七九年通過了一項利益均等的合資企業法，一九八六年通過了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企業承包法中對於外資能否享受平等待遇未作明確說明而給簽定條約的初級階段留下較多的協商餘地和不同的解釋。然而即使沒有這一新法，事實上在中國中外合資企業中的外商已與中國簽定了五千多份契約，中國所得到的外商投資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於與中方簽定合約的中外合資企業的外商。  
 這些變化為外商在中國環境下進行投資的情況改善提供了法律基礎。然而還存在許多不定因素，這些規定如何實行尚在不可知之列。例如，為了享受優惠稅率及其他待遇，外國投資者必須證明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是用來生產出

(下接八十三頁)

# 亞·索爾仁尼琴

—應美國勞聯—產聯之邀—

## 在華盛頓的演說

(一九七五年) 鄭月華譯

今天在座的多數人是勞動者，是從事創造性勞動的人們。我本人也曾經做過石匠、翻砂工、雜工，因此有資格代表和我一起，在「古拉格」做過苦工的全體囚徒（包括你們剛才在這裡見過面的兩個人）以及所有的今天仍然在我國受壓迫作苦工的人向你們講話。

弟兄們、勞工弟兄們！

在座的還有許多貴賓們、女士們、先生們

！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誰不知道這個口號？（鼓掌）這個口號在地球上響徹雲霄已有一百二十五年啦。……今天這個口號被印在蘇聯出版的每一本小冊子裡、每份「真理報」的頭版上。然而在蘇聯，共產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們從來沒有真心實意地、自始至終地去執行這個口號。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謊言實在太多了，以至於人們不容易記起哪些是最原始的、最主要的。這個主要的謊言好比是樹根，而其餘的只是樹葉，但是這的確是已想不起來的往事，即使想起來也難叫人相信。不久以前我專門重新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是一九一八年的版本。這本小冊子是在俄國被稱為革命搖籃的那個城市——彼得格勒召開的該城市各工廠工人代表會議的詳細記錄。事情發生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十月革命以後才過了四個月，可是出席那次會議的彼得格勒各工廠的工人代表都異口同聲地咒罵共產黨欺騙了他們，所有的諾言一個也沒有兌現。共產黨把遭到嚴重飢餓和嚴寒襲擊的彼得格勒拋棄不管，自己却跑到莫斯科去了。不僅如此，他們用機關槍對聚集在廠房前面要求選舉獨立工廠委員會的工人群眾進行掃射。我再說一遍，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份的事。今天很少有人還記得它，以及其他類似的往事。一九二一年彼得格勒的工

人罷工遭到了鎮壓，同年在科爾平諾城鎮對工人開了槍，造成嚴重流血事件。……當時的領導、即革命初期的共產黨中央頭目，多半是些長期居住在國外的知識分子。他們回到祖國為的是趁俄國已經爆發了工潮這個有利形勢來搞共產主義革命的。這些領導者當中有一位却是真正的工人，他一直當高級旋工……他的名字叫亞歷山大·施利亞伯尼科夫。今天誰還曉得他的名字呢？在共產黨領導人當中唯有他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是他而不是列寧在俄國革命前夕領導了全黨。列寧當時還在國外。一九二一年施利亞伯尼科夫成了工人反對派的首領，他的派別試圖證明：俄共的上層已經背叛了工人的利益，壓制了無產階級。後來他被捕，英勇不屈，在獄中被殺。今天他的名字在這裡對許多人是陌生的。可是，前面已經說過，在革命前夕正是他而不是列寧領導了俄國共產黨。

自此以後，我國工人階級再也沒有能夠維護住自己的權力，只得到了一些小恩小惠。這和西方國家是不同的，我國的工人階級無法起來維護自己最起碼的生活利益，任何一次為增加工資或改善生活條件的罷工，都被稱為反革命行為。由於蘇聯的制度對外封鎖消息，你們大概誰也沒有聽說過一九三〇年伊萬諾夫市的紡織工人罷工，一九六一年亞歷山大羅夫、穆洛莫兩大城市發生工潮的消息吧。就是在一九六二年，赫魯曉夫上台後，出現了不少標誌着解凍的趨向之後，諾沃契爾卡斯克市還爆發了較大的工人罷工。關於這次事件的詳細經過，不久將要在美國出版的我著的書中有所敘述。這本書就是「古拉格群島」第三冊。這次事件，工人進行的是和平的示威，他們高舉列寧像走到了市委所在地，提出了改善惡劣經濟條件

的要求。迎接他們的却是機關槍和自動步槍射出的子彈，還有坦克。倒下去的傷員和死者遺體都不許家屬帶走，被官方秘密地處理了。：

在我國革命以後根本不存在什麼自由工會。這一事實恐怕不需要再加更多的說明了。但是英國的工會領導人却搞了不光彩的把戲：接受邀請到蘇聯去訪問他們所謂的工會組織，而且還邀請對方回訪英國。這當然是他們的事。而美國的勞聯——產聯却從未上過這個當。（鼓掌）美國的工人運動從來都沒有把奴隸制度當成自由制度。為此我代表我國所有被壓迫者感謝你們！（鼓掌）正當西方的某些學者和持自由主義思想的人發誓說，蘇聯已不存在集中營一類東西（可見他們對於「自由」這一詞的涵義忘却得一干二淨了）的時候，美國的勞聯却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一本說明蘇聯集中營分布情況的地圖。為此我代表當時在押的全體人員向你們致謝！（鼓掌）

我們和你們都感覺到，我們是同盟者。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同盟存在。：：：初看起來，那是一個奇怪的、不平常的同盟。然而稍加思索就不難看出，這個同盟是有根有據的，也是不難理解的。它就是我們的共產主義首領們和你們的資本家之間的同盟（鼓掌）：：：這個同盟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至今尚健在的有名的阿曼德·哈梅爾早在列寧時代，俄國革命後不久首次作了這方面的嘗試，開辟了新起點。這個嘗試成功了。從此五十年間我們所看到的乃是西方的實業家們爲了支援共產主義首領們，用他們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支援了蘇聯的落後的經濟。沒有這個援助，蘇聯的國民經濟不可能克服它所面臨的重重困難。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個主要建設項目，完全是依靠引進美國的技术和裝備完成的。斯大林自己也承認過這樣的事

實，即當時建設所需要的材料，三分之二是來自西方的。今天的蘇聯，盡管用現代化標準來衡量，仍然是一個窮國，然而它擁有強大的軍事和警察力量。它把這些力量用來鎮壓蘇聯國內爭取自由的運動。因此所要感謝的人，就是西方的資本家。

還有一件事，可能在座的諸位，有人在報紙上已經見過，有的人却不一定知道。就是不久以前，根據你們實業家的倡議，在莫斯科舉行了美國的「警察技術展覽」，把你們國家用來追捕犯罪分子，進行竊聽、監視、照相、跟蹤、鑒別等最新技術成果運往莫斯科展覽。：：：（鼓掌）：：：給了蘇聯克格勃人員研究這個新技術的極好機會，至於克格勃所要追捕的都是些什麼人，誰還不明白？：：：蘇聯政府對這個技術展覽表示了很大興趣，決定購買所有的展品。你們的實業家欣然答應了。好在美國國內頭腦清醒的人發表了反對意見，這樣才使這筆生意沒有做成。但是你們要知道克格勃的機靈動。不要說展覽了兩三周，就是展覽品擺在那裡兩三個晚上，只要是它們陳列在蘇聯的房裡，又是由蘇聯的警衛人員守衛，那麼這已足夠讓克格勃人員來得及把它們一個個仔細地加以研究并畫成圖紙。：：：今天在我國用來追捕人的技術手段可算是最先進的了，爲此今天我也要感謝你們西方的資本家了！

一般人對一種利欲熏心和一心要發財的事是難以理解的。這種追求利潤的欲望不受理智和個人意志的約束，爲了賺錢它可以完全喪失良心。（鼓掌）：：：應當承認，這一切，列寧早就預見到。列寧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在西歐而不是在俄國度過的，他對西方的瞭解勝過他對俄國的瞭解。他不止一次地，書面或口頭說過，西方的資本家爲使蘇聯的經濟得到鞏固而盡

心竭力。他們將激烈地相互競爭，以便低價向俄國賣貨，以求賣得比別人快。爭先恐後地和蘇聯簽訂各種貿易協定。列寧還說過：他們（西方的資本家）會把一切都送上門來，至於他們自己的前景，他們是根本不會去想的。當俄國處於困難時期，有一次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他又說過：「同志們，不要驚慌失措。當我們遇到最困難的時刻，我們將把一根繩子交給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會用這根繩子絞死它自己。」在那次會上有一位名叫卡爾·拉得克的人——一位愛說俏皮話的人——插話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哪裡來那麼多的繩子來絞死所有的資產階級呢？」，列寧立刻回答說：「資產階級自己會賣給我們的。」：：：（鼓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這幾十年時間裡蘇聯所有的報刊都一直在嚷嚷：「西方的資本主義，你們的末日到了！我們即將消滅你們！」，然而資本家好象一點也沒聽見似的。他們不能夠理解也不能夠相信這種宣傳。尼基塔·赫魯曉夫來美國時曾經說過：「我們即將埋葬你們！」他們并不相信，以爲赫魯曉夫在開玩笑。當然，現在有人說：「緩和」：：：（鼓掌）：：：其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沒有改變，它的目的跟過去一樣，只是代替信口開河的赫魯曉夫來了一個「緩和」。

爲了弄清這個問題，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談一談在不同時期被稱之爲貿易、局勢穩定化、承認現實、緩和等等的那些關係，它們的實質究竟是什麼？這些關係的發生和發展至少已有四十年的歷史了。不妨回憶一下，這些關係從一開始是以什麼樣的制度（社會體系）爲其對象的。這個制度用武裝改變的方式取得了政權；它解散了立憲會議；它向當時的共同敵



人——德國投降了；它採用了在沒有法庭審判的情況下鎮壓手段，搞了肅反委員會（契卡），它的懲辦是避開任何法院的；它鎮壓了工人罷工；在農村裡令人髮指的掠奪引起了農民的暴動，這些暴動都遭到了血腥的鎮壓；這個制度毀滅了宗教；在這個制度下俄國二十個省遭到了空前的飢荒襲擊。一九二一年伏爾加河流域發生了聞名於世的特大飢荒。共產黨的一貫作法：就是爲了把政權弄到手而不惜一切；縱然生產力下降了、土地荒蕪了、工廠停工了、飢餓貧困發生了，他們全不在乎，而一旦發生飢餓和貧窮，他們就向講人道主義的外部世界求援。今天北越是如此，葡萄牙也走上了這樣的道路。俄國却早在一九二一年所有這些都發生了。當俄國由於共產黨發動的三年內戰（「國內戰爭」）這個口號是共產黨的號召，是列寧提出來的目標，列寧著作裡可以讀到這個任務和口號）而遭受破壞的時候，他們就向美國求救：「美國呀，救濟我們飢餓的老百姓吧」。事實就是這樣，慷慨的美國使挨餓的俄國人有了飯吃。美國專門成立了美國救濟總署（A.P.A.）。已故的胡佛總統擔任這個總署的領導人。這個機構拯救了幾百萬俄國難民的生命。然而你們得到了什麼樣的報答呢？蘇聯千方百計地把這段歷史從人民的記憶裡抹掉，蘇聯的報刊裡幾乎找不到關於美國救濟總署是個什麼樣的組織的記載。相反，後來有人指責說什麼，美國救濟總署是一個狡詐的特務機構，它所進行的活動完全是美帝國主義的陰謀，目的是要在俄國部署特務網。

我繼續講這個制度：

它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集中營；它在二十世紀最早就開始用人質制，就是說要逮捕某某人的時候，并不一定去抓他本人，而去抓他的

親屬或甚至是逮捕和槍決毫不相干的人。



無所不在的暴君斯大林

這種人質制度和迫害家屬的作法，至今仍然是對付人的最厲害的手段。因爲即使是勇敢的、不怕犧牲個人的人，也可能會因家裡人受到威脅而發生動搖。

這個制度早在希特勒之前就搞了所謂的假登記通知單。把通知單寄給某某人，通知他要到指定的地點來登記。按照指定地點來登記的

人，結果是一個個地去送死。縱然那時由於技術落後，毒氣室尚未發明，可是在我們那裡曾經把幾百個、上萬個人，趕上木船的船艙裡，而後把這些船只擊沉入河底。

這個制度，它的一切法令，諸如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廠法令、出版自由法令統統是爲了欺騙勞動人民的。

在這個制度下消滅了一切異黨。請你們不要認爲：這些異黨只是作爲組織被取締了、解散了。不是的，這些黨的成員從肉體上被消滅了，所有的成員統統都被消滅了。

這個制度，它在農民中搞了大屠殺。被移居到遠方去的一千五百萬農民實際上是去送死。

這個制度所採用的「公民證」制度，事實上是不折不扣的農奴制。

在這個制度下，在烏克蘭，在和平時期，人爲地造成了大飢荒。一九三二、一九三三這兩年在烏克蘭這塊處於歐洲邊緣的地區裡，餓死了六百萬人。這六百萬人的死亡是在歐洲發生的，然而歐洲却不得而知，世界也沒有人知道……這六百萬人的死亡！

這些舉不勝舉的事實還可以講下去，但是我不得不停下來。所以不得不停下來是因爲我已講到了一九三三年。正是在這一年裡，盡管我上面所列舉的一樁樁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你們的羅斯福總統、你們的國會却決定給予這個制度以外交上的承認，並給以友誼和援助。必須提醒大家一下，偉大的華盛頓曾經不同意承認法國國民議會，因爲那個議會犯下了許多殘酷的罪行。一九三三年你們國家也曾經有人反對過承認蘇聯。但是最終還是承認了。開始建立了友誼，爲後來建立軍事同盟开辟了道路。你們還記得，一九〇四年美國人民、美國的報

刊，爲日本在日俄戰爭的戰場上步步得勝而歡欣鼓舞，都希望俄國失敗，因爲俄國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可能也還記得，一九一四年有人曾經指責過法國和英國，因爲他們竟和俄國這個保守的國家建立了同盟。

我今天的發言，從篇幅和內容上都不容許我更多地談俄國的過去。我只是告訴你們，西方得到的關於革命以前我國情況的情報都是從並沒有權威或不很誠實的人那裡得來的。在這裡我僅僅列舉幾個數字以作對比。這些數字可以在「古拉格群島」第一冊裡找到，這本書在美國已經出版，可能不少人已看過它。據有關統計，最客觀而確切的數字表明，十月革命以前的八十年間，俄國每年平均經過判決處死的有十七人。盡管那個時代也發生過革命運動，有人還曾經陰謀刺殺過沙皇。聞名於世界的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掀起的鎮壓高潮，每月處死人數達十人左右。我所寫的「古拉格群島」引用了登載在一本由蘇聯契卡（肅反非常委員會）出版的書中的材料。書的作者爲了能夠總結契卡所完成的革命工作而深感自豪，並且因爲所統計的數字還不完全而向讀者表示歉意。他在這本書中寫道：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兩年裡，契卡在毫無法庭審判的情況下，每個月平均槍決一千人以上！契卡人員在發表這些數字時未曾考慮過它們在歷史上會有多大的反響。到了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恐怖達到高峰時，被處死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致若按月平均來計算，每月處死達四萬人之多！如果把上述數字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爲什麼民主的西方同俄國建立同盟越來越困難了。

然而即使如此，一九四一年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民主力量：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許多較小的國家，他們却都和蘇

聯訂立了軍事同盟。

這將如何解釋呢？又如何理解呢？可以提出幾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世界民主力量即使聯合在一起也不足以戰勝希特勒德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太可怕了。這對於今天來講是異常不吉利的征候。因爲如果說在當時所有這些國家加在一起也未能夠對付一個小小的希特勒德國的話，那麼今天，面對着已經在大半個地球上漫溢着的極權主義，他們又將會如何呢？

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在德黑蘭



我個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解釋。第二種是：那不過是當時那些國家領導人一時的害怕和驚慌失措。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喪失了志

氣而不得不和蘇聯的極權主義結成同盟。這樣的解釋，對西方來講，也是很光彩的。第三種是：那時候的同盟是一種策略。西方要打敗德國的極權主義，但又不願意親自出面，所以想借助另一個極權主義的力量去保衛自己。暫且不去評價這種策略的意義上的意義，以後再說也不晚。但是就簡單的策略邏輯而言，也是太欠考慮了。實際上是一個深刻的自我欺騙罷了！俄國有句成語「防狗安能呼豺狼」。當你遭到一群狗狂咬時，趕快打狗吧！要打狗而不必叫狼來幫忙！（掌聲）因爲如果狼來了，即使他趕走了狗，也會吃掉你。

全世界民主力量本來完全有可能把德國和蘇聯的極權主義一個一個地打敗。可是它却促成了蘇聯極權主義的鞏固，並且使第三個極權主義——即中國的極權主義誕生了。這些事實的發展導致了今日的世界局勢。

今天在西方有人開始責備美國了。很多人說：瞧吧！都是美國的過錯。我倒是想爲美國說些開脫的話。在西方各國當中，美國可算是最無辜的了，況且要說誰爲阻止上述事態發展作出些努力的話，美國比起別的國家來是遙遙領先的。美國幫助歐洲贏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美國曾經兩次使歐洲從戰後廢墟上得以復興。在戰後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裡，當歐洲許多國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盤的時候，美國却一直是作爲歐洲的後盾。有的歐洲國家一邊在翻來復去的算自己的銅板，一邊在想：若是可以以不付軍餉的錢，那該有多好！寧肯不要軍隊了。若是可以以不付武器裝備的錢，又該有多美呀，若是可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的話……反正有美國的保護。這些擁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就是這樣帶了頭。當然啦，他們生活在另一個洲上，可能從那裡看得清楚些

很早以前，美國就以世界上最大方的、最慷慨的國家而聞名。無論什麼地區發生了水災、地震、火災、天災，是誰首先提供救災物資呢？是美國。是誰的援助數量上最大而又是無私的呢？是美國的援助。（鼓掌）可是美國得到的報答又是什麼呢？譴責聲和咒罵聲——「美國佬，滾回去！」放火燒毀了美國在各地設立的文化中心。在聯合國的會議上，第三世界的代表們紛紛爬上桌子去投反對美國的票。

然而，盡管如此，也不能減輕美國的重任。歷史的進程、歷史的發展把你們的國家推向了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不管你們願意還是不願意，對你們的國家來說，不容許僅僅從局部的情況出發。對於你們的政治家來說，不容許他們僅僅考慮到本洲的事情或本黨派的利益，或者僅僅關心是否能夠得到政府裡的一官半職。你們應當想到整個世界。一旦世界上出現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機的時候（依我看，一個很尖銳的政治危機剛剛結束，下一個危機又隨時可以到來），作出決定性的政策的重任，無論如何將要落到美國的肩上。

到了美國以後，我就聽到有人對一些事情的種種議論。譬如有人講：「不應該保護那些喪失自衛志氣的人啦。」這一點我也同意。這是對南越而言。然而今天在半個歐洲和佔地球四分之三的土地上，自衛的志氣比在南越還要差。

有人講：「不應該保護那些沒有能力依靠自己的人力進行自衛的人。」可是面對着極權主義的優勢兵力，究竟誰有能力單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進行自衛呢？沒有這樣的國家。譬如日本，它根本就沒有軍隊。

有人說：「不應該保護缺少完全的民主的

人民。」這句話確實太妙了。在你們的一些報刊上和政治家的演說裡，這句話已成了主要調子啦。然而請問，處在極權主義面對面的前綫時，誰還能夠維護住完全的民主呢？就連世界聯合起來的民主力量，你們自己不也是沒有能夠維護住嗎！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在一起都未能夠維護住！希特勒剛一開始威脅你們，你們就立即向斯大林伸手了。這能說是維護住了自己的民主嗎？不能！（鼓掌）

還有人說（這類言論曾經連續有人發表）：「假如蘇聯將利用緩和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便……」你們便採取什麼措施呢？蘇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利用緩和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譬如他們，還有中國，他們一起使勁搞緩和時，就把印度支那三國順手奪過去了。當然，似乎還有個希望。中國可能會派乒乓球代表團來進行慰問。（笑聲）蘇聯派來了飛行員組成的訪美團。其中不少飛行員曾經飛過北極。有的人和你們的宇航員一起參加過宇宙航行。

你們的總統尼克松最後一次訪問莫斯科時，美國記者用他們慣用的方式組織了所謂的「莫斯科街頭實況報導」。帶着傳聲器的美國記者，毫無拘束地同過路的人攀談。請他們談談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會談的感想。結果回答的都是一樣：「好極了，我感到滿意，很高興！」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該怎樣理解呢？其實很簡單。如果我在街上遇到携帶着傳聲器的美國人，他同我攀談，那麼我立刻會想到在我身邊很可能已經有了一名克格勃的密探。他身上肯定帶着錄音機，它會把我的每句話錄下來。稍不留意，我便會被捕入獄。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會回答：「是的，好極啦，再好沒有了。」（鼓掌）那些想要把西方通常的新聞報導的作法、生搬硬套地運用在蘇聯的土地上的人，實

在是不高明。

多年來，美國的租借法案（LEND-LEASE）給我們不斷提供了援助。但是蘇聯那裡想方設法要抹掉這個援助的歷史意義。使人民根本不去回憶它。在今天答應來參加這次會議之前，我一再改變來華盛頓的時間。因為我想多瞭解一下美國，打算去幾個州和普通的美國人談一談。從這次和美國人交談裡，我第一次得知，戰爭時期美蘇友好協會在各州都曾經舉行過捐獻運動，捐獻出很多的冬季衣物、食品等拿來支援蘇聯人民。然而在蘇聯，我們根本就沒有看見過，也從來沒有得到過這些贈品。不僅如此，我們連聽也沒有聽說過呀。所有這些物資都曾經在特權人員的小圈子裡被分掉了。這一點我在美國才得知。

關於美國的一切辛辣的語言在斯大林時代早就都說夠了。人們心裡留下沉沉的不快之感。然而這類語言任何時候都可能重新出現。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再在報紙上，再一次地會登載醒目的大標題「血債累累的美帝國主義渴望征服全世界」，於是過去的那些毒害人們的沉淀物會再次浮上來，使很多人相信你們是侵略者。這就是我國所搞的緩和。

蘇聯的制度封鎖的很嚴密，以至於你們想要瞭解它是異常困難的。你們最博學的理論家們寫過不少書，企圖解釋蘇聯國內發生的事情。我可以舉例來談談幾條這樣的解釋。它們都顯得很幼稚，蘇聯人聽了會感到可笑。譬如有人說：「現在蘇聯領導人已放棄了他們那種仇視人類的理論。」不是的！絲毫也沒有放棄。有人說：「克里姆林宮有『左派』同『右派』之爭。我們所作所為應該有助於『左』派。」這純粹是幻想。什麼「左」派呀、「右」派呀。權力之爭無疑是存在的。但是在重要的問題

上他們是一致的。還有一種理論說：「隨着技術的發展，今天的蘇聯已經有了自己的技術管理階層。有了工程師，他們已經管理經濟了，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將會決定國家的命運。」我可以告訴你們：關於工程師將要決定國家命運這一說法，如同關於我們的將軍將要決定軍隊的命運的說法一樣，都是些廢話而已。一切都是黨說了算。這就是我們的制度。你們可以對它做出個評價。在這個制度下，四十年來，從來未進行過名符其實的選舉。所進行的完全是個兒戲、滑稽戲而已。也就是說，在這個制度下根本就不存在立法機構、不存在獨立的宣傳機構和獨立的司法機構，在這個制度下人民對於國內外政策毫無發言權，任何與官方不同的意見都會被鎮壓下去。順便提一下，電子竊聽器在我們那裡是極為普遍的。你們這裡發生了一次竊聽事件，就哄動了整個國家達一年半之久。可是我們那裡類似的事情習以為常。幾乎每間住房、每個機關都安裝了竊聽器，我們也不再感到奇怪了。

在這個制度下，已經被揭發出來的殺害了幾百萬人的劊子手，如莫洛托夫之流，他們從來沒有受過公審，而是領取了很高的养老金，過着舒適的生活。在這個制度下，至今仍然對外國旅游者預先做了精細的安排。外賓要參觀時總有幾個專門的人員隨行。在這個制度下，現行的憲法一天也沒有真正執行過，所有的決策都是經過秘密醞釀後，被一個小圈子裡的不負責任的人們通過。這些決策對於我們和你們一樣，都是如同晴天霹靂來得突然。像這樣的人，他們簽了名又能有多大的信用呢？怎麼能夠相信他們在裁軍文件上簽的字是靠呢？你們可以問一問你們的專家，他們會告訴你們，蘇聯近幾年來已製造出了比美國優越得多的化

學武器和火箭。

有無真正的緩和，只要看是否具備了主要幾條標誌，就能夠做出判斷。依我看，主要有三個標誌。第一，不僅必須在軍事上實現裁軍，而且也要排除一切暴力手段，不僅要消滅戰爭機器，而且也要消滅暴力機器。就是說，不僅要消滅對付鄰國的武器，而且也要消滅鎮壓國內同胞的武器。（鼓掌）若不是這樣的話，而是當我們和你們在一起愉快地交談的時候，在那裡却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呻吟，在遭受迫害，在精神病院裡，醫師一天給他們三次注射有損於大腦和整個身體的藥物的話，那就談不上什麼緩和。第二，我認為緩和和應當建立在微笑和口頭讓步的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如同磐石一樣可靠的基礎上。福音教說道：修房要修在磐石上，不是砂土上。這就是說，緩和必須有個保障，不至於在一個晚上或一個早晨便宣告結束了。（鼓掌）為此參加緩和的各方都應該接受監督——社會輿論的監督，宣傳機構和自由國會的監督。沒有這樣的監督就談不上什麼保障了。（掌聲）第三，很簡單，豈能在別人大肆進行仇視人類宣傳的情況下搞緩和？蘇聯把這個宣傳叫做意識形態論戰。友誼必須是誠摯的，緩和必須是真正的，意識形態論戰必須終止。

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都是些談判老手。他們深知談判是怎麼一回事。先是久久不讓步，而後來作些小小的讓步，這樣就一定會有人興高采烈；他們讓步了，可以簽字啦！三十五個歐洲國家的談判就是如此。談判進行了兩年，却毫無進展，簡直成了折磨人的心靈的會談了，後來終於讓步了，容許共產黨國家的婦女和外國人結婚，容許部分外國記者去訪問蘇聯國內的某些地區。這本來是無需談判的，是人

的無可非議的權利。他們却只答應了其中的千分之一。西方却有不少人立刻歡呼起來了：他們讓步了，可以簽字啦！

這兩年來，一邊舉行談判，一邊却對東歐各國國內有增無減地施加壓力。連南斯拉夫、



蘇軍坦克在布達佩斯

羅馬尼亞也加劇了國內鎮壓。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奧地利首先說什麼：「要盡量抓緊簽訂條約，是時候啦！」這個條約究竟是個什麼貨色呢？今天，他們提出的條約意味着要埋葬東歐。也就是說，要西歐同意讓東歐各國被鎮壓下去而在文件上簽字。奧地利也許認為只有東歐國家才會被埋葬，至於處在墓穴邊緣上的奧地利，仍然會安然無恙，能避免被埋葬掉。生活

的經驗却告訴我們，誰要是想在暴力面前站穩腳跟，他就必須表現出剛強的意志！必須懂得共產主義的本性。共產主義思想以及列寧的教導，一貫認為：誰要是對於眼前的東西視而不取，他無疑是個傻瓜。只要有機會就應該去拿，只要有機會就應該進攻，只有碰到牆壁的時候，才容許退却。共產黨的領導們所看重的，那就是剛毅和力量，他們藐視和譏笑那些一味退讓的人。如今你們有人說，「有實力而無和睦相處的願望，將會導致世界性的衝突。」這句話是我今天引用你們國家領導人言論的最後一句。我却認為，有實力而一味地讓步等於喪失實力！（鼓掌）經驗告訴我們：唯一能夠在極權主義進攻面前站得住腳的，就是堅強的決心。歷史上有不少事例可以借鑒。一九三九年，小小的芬蘭由於依靠了自己的力量而沒有倒下。一九四八年，由於美國表現出了堅定的立場，柏林才得以保住，從而避免了世界性衝突。一九五〇年，也是你們堅定的立場才保住了朝鮮，又一次排除了世界衝突的發生。一九六二年，由於美國強有力的態度，才迫使他們（蘇聯）把駐在古巴的火箭撤走，世界衝突的可能性再次未成為現實。已故的阿登納，在和赫魯曉夫進行會談時，表現了強硬的態度，所以在發展真正的緩和方面作了良好的開端。赫魯曉夫不得不讓步。假如他沒有被趕下台的話，那年冬天他還打算去西德繼續搞緩和。

今天的世界正在發展的有兩個重要的過程。一個過程，我在前面已講過，就是三十多年以前開始的，由那些害了近視病的人們，一再讓步和姑息的過程。他們一讓再讓，希望總有一天狼會吃飽肚子的。第二個過程，我認為是個關鍵性的過程，就是共產主義鐵壳裡面人們的心靈正在走向解放。這個過程在蘇聯已有二

十年的歷史了，在別的共產黨國家裡它的歷史可能短些。正在成長着的新一代人，他們和那惡作鬪爭的時候表現得百折不撓，絕不會拿原則做交易。爲了不出賣良心，他們寧肯失去一切：工資、起碼的生活條件、甚至於生命。（鼓掌）這個過程已發展得如此的廣泛，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今天蘇聯的地位降落萬丈，幾乎成了笑柄、人間的耻辱了。在那裡幾乎找不到人，就是在大學生和中學生中也沒有人嚴肅地而不是帶着幾分玩笑或譏諷地去談馬克思主義。當然，盡管走向解放的過程將來必定要導致社會變革，但是它的進展比起第一個過程要緩慢得多。我們在觀察西方所做出的一個個讓步的時候，感到迷惑不解。爲什麼讓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一年之內讓出幾個國家來，這是爲什麼？一開始我就講過，你們是共產黨各國內部解放運動的同盟者。我向你們呼籲：讓我們一起想個辦法吧！並且作出必要的努力使這兩個過程的發展速度平衡起來。每當你們支援了我們這些受迫害的人，你們不僅表現出了慷慨和崇高的精神，不光是保護了別人，而且也保護了你們自己和你們的未來。……（鼓掌）讓我們想方設法制止這個到了瘋狂程度的、違背任何理智和道德的、向侵略者退讓的過程。……：終止法律界的某些人一貫的隨機應變和爲一個個國家被讓出而尋找根據的惡劣作法。在這些人看來，向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提供精密而複雜的技術裝備是完全有理由的。可是這些裝備却被用來製造武器，鎮壓國內人民。假設我們能夠阻止，哪怕不完全阻止這個退讓過程，從而爲在共產主義國家內部的解放運動提供更多的有利條件，那麼，上述這兩個過程的發展最終將要決定我們的未來。（鼓掌）……：在我們這個人口稠密的地球上，再也不可能有只涉及

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了。共產黨領袖們常講：不要干預我們的內政。讓我們隨心所欲地去鎮壓吧！……：我却要講：請你們多干預我們的內部事務吧！……：我們懇求你們來干預！（鼓掌）。正因爲這個見解在我頭腦裡作祟，今天可能無意地干預了你們國家的內部事務了。請原諒！……：（鼓掌）我在美國到過不少地方，豐富了過去從廣播和有經驗的人那裡聽到的關於美國的知識。在我本人、我的朋友、與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級階層的人們以外的蘇聯普通人的心目中，美國的形象總會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所仰慕的是你們的無限廣闊的前景和你們的強大。你們自己往往估計不到這一點。未來屬於你們美國的。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度，擁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潛力，遼闊的土地，廣闊而無私的胸懷。但是正如一個人一樣，一個國家的這些優點往往會帶來另一方面性格上的特點，譬如輕易相信別人。你們過去由於太輕信而吃過虧。希望美國今後注意自己的行動，不要讓那些哲人們得到把你們引向歧途的機會。他們借口要達到更加微妙的公道原則、在法律上達到更加細致入微的平等，以及種種的保留意見而不惜削弱你們美麗的強大的國家。他們給人以假象，似乎他們自己是維護和平和社會公道的，事實上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或因其世界觀上的毛病，或因其缺少見識而使美國在人類歷史上（不僅是美國歷史上）受到空前威脅的面前解除了武裝。因此，我呼籲：美國的勞動者和普通的美國人，你們的工會所代表的人們！不要讓那些人削弱你們，把你們引向歧途。讓我們爲使退讓過程放慢步伐，而解放過程更加迅速的發展而努力吧！（鼓掌）

一九七五年六月於華盛頓

# 家務



漸有笑容的車少莉

# 車少莉

小額捐款。其中最大的數額是二百二十八美元，最小的是五美元。有些人附了表示支持與同情的信，有些人則干脆用信封套了張支票寄過來，沒有姓名，沒有地址。對於這些好心人，我無法給他們回信表示感謝，就在這裡一併致謝吧！

捐款的總額大約是二千一百美元，加上「民聯三大」時與會代表湊了大約一千美元，共約三千一百美元，一千元付給了趙霄律師，一千元償還了以往的欠債，還有一千元捐給了「民聯」。因為「三大」後「民聯」發生了經濟危機，呼籲各界幫助。我身為「民聯中央委員」，總不能拿着大家的錢，心安理得地看着「中春」靠「義工」維持。如果我的捐款人中有誰願意幫助我而不願意幫助「民聯」，那他也大可放心，我只是把「民聯三大」代表們給我的錢給了「民聯」而其它的捐款都用來付帳和還債了。

缺時間的難處似乎沒人能幫我很大的忙。這次收拾出的機票存根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丟掉的不算，剩下的居然還有七、八張。而且每張都是來回機票。去年加今年，全美各地大概也很跑了些地方。看到這些機票，資格考試後的沮喪心情略有好轉。盡管我只是「PASS」而不是「PASS WITH HONOR」，似也情有可原。一天到晚飛來跑去，心不在焉。「PASS」也夠便宜我了。

更何況在六月份準備考試期間，還去了亞特蘭大和華盛頓。去亞特蘭大是爲了參加美國「國際特赦」組織年會。去華盛頓是爲了「楊巍月」在國會門前的和平示威。儘管每次都小心地帶着「細菌學」和「病毒學」，但到了地方，還是不由自主地被「民主」、「人權」所淹沒。這些，老板和考試委員會的教授們都不知道。否則，他們決不會認爲我「經過認真準備」了。

我努力在每一封回信中告訴關心我和楊巍的人，由於大家的關心，楊巍的命運要比魏京生的命運好多了，但信多，實在無法把要說的話表達得恰好處。說楊巍現在很好當然荒唐。無緣無故被抓去坐了兩年牢，不管怎樣是壞事一樁。如果我說很好，豈不是應了共產黨宣稱的「中國人民享有黨領導下的民主」？可要說壞到什麼程度，則又難以具體說明。我曾給楊巍寫過一信，裡面提了十六個問題，都是極具體的問題。比如，吃得飽飯不？可不可以晒太阳？房間裡有無電燈？監獄是否像電影裡的那樣？等等。但他來信以「我不知電影裡的監獄是什麼樣子」拒絕回答我的問題。也難怪，他的所有進出信件都要經過檢查，怎麼能隨心所欲地告訴我坐牢的真實感受？楊巍的父母親總對我說他還不錯，但不知道他們說的是真是假。楊巍本是他們唯一的兒子，但他們却從來未對我說過楊巍坐牢對他們的打擊。總是對我說「看上去很好」、「比上次見面不胖也不瘦」等等。不管他所處的環境怎樣，楊巍的精神狀態倒真是挺不錯的。從他給他父母親的信，我簡直不能想象他到底在幹什麼？信裡大部分內容是關於他要的書。五花八門，其中包括「經濟秘書班」作業、「擒拿與反擒拿」、「少林內勁一指禪」、「氣功」、「推拿」、「

前天通過了資格考試，昨天還強打起精神去圖書館翻了幾篇論文，今天就再也不想幹了。家裡亂成了一團。本來就不長於家務的我有考試作爲借口，就更懶得收拾。考完了，反正幹不成什麼需要智商的事了，收拾收拾屋子吧。我把論文分類放好，又清理了一些信件，有一些專門放在大信袋裡的，隨着各地來的捐款的信件提醒我，應該對大家有個交待了。

自從去年十二月，在長達近一年的關押後，楊巍案子終於要開庭審判了，我有許多事要做，但既缺錢又缺時間。爲解決缺錢的難處，我終於向大家求援了。在這之後，我陸續收到全美各地、加拿大、香港、蘇格蘭等地寄來的

「圍棋」、「圍棋」、「文化史方面」等等。下面摘錄兩段楊巍最近從監獄的來信，是講圍棋和文化史方面的，內容很為其「雜食性」作了點辨護：

……  
如果能借到圍棋理論書，也可借一兩本。不過現代的圍棋書就棋論棋，單純講技術，而古代的圍棋書是講棋道的，也就是講心理和哲學的關聯。把圍棋作為一種心理訓練或修身之道，從而體現了它和中國文化的血肉關係。據說有「圍棋十三經」之書，仿孫子兵法的寫法，着重講道，不知借得到否？

文化史方面的書，着重借道家的。我覺得中國文化中，還是道家思想跟現代的趨勢合拍。道家并非無為，他是兵家的祖宗，而兵家被日本人奉為至寶。而在氣功、武術、醫學中，道家比儒、釋等高明。所謂無為，實際上是講放權，合於自然，符合現在的大趨勢。西方國家中眼下最成功的德國黑格爾文化（辯證法，凡存在皆合理等）似也暗含道家思想。從歷史上看，德國人是有了黑格爾以後才開始利害起來的。

……  
信的最後，還不忘糾正我上次信中寫的錯字。說我把「釣螃蟹」寫成了「調螃蟹」。可是他自己在同一封信中也至少寫了一個錯字。把「厲害」寫成了「利害」。我當然也去信請他糾正。

上面所說，就是我們「家」人的近況。最後，再次謝謝大家的關心和幫助。

**VIP 名人**

VIP  
ORIENTAL  
INC.  
旅遊公司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FLUSHING, NY. 11354

### 特廉機票

↔上海  
紐約 ↔ 北京  
↔廣州

美國付錢  
中國國內取票

台北 · 香港 · 北京 · 上海

※美國國內各種廉價機票，電腦訂位。  
※代辦各國簽證，機場接送。

- 巴士旅行團，華盛頓DC，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大西洋城，天天出發。
- 佛州迪斯奈樂園，三天二夜旅行團。

紐約市區遊覽 ● 紐約近郊遊覽

## !! We Need Computer Programmers In Australia !!

We have openings for SOFTWARE ENGINEERS.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ies and stock options.

- M.S. or higher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 Unix/C experience required; DBMS & network experience a definite plus.
- We will help you immigrate in Australia.

We have only a few positions open so respond today. Send your resume to:

Job Opportunity, P.O. Box 967, Boulder, CO 80306.

# 「天熱起來了」

——記六月初胡平

在密執安州的演講活動

齊光

六月三日和六月四日，中國民聯主席胡平應邀在密執安州立大學和密執安大學進行了兩場演講。

胡平在密執安州立大學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在密執安大學演講的題目為「中國的民主與改革」。這兩場演講是由中國民聯在密執安地區的成員及民運支持者贊助、籌劃和安排的。

星期五晚上八點鐘，密執安州立大學的威爾士大樓裡陸續來聽胡平演講的有一百廿余名正在期末考試期間的中國留學生，其中大陸留學生占了一百多位。

胡平在演講中指出，在大陸人民普遍對中共失去信心的形勢下，趙紫陽的新經濟政策已無法有效地進行，改革也無法有效地推動，如果要改革，首先必須改變專制制度。胡平反駁了那種認為只要經濟和科學搞上去，民主就會自然地水到渠成的論點，他指出，這兩者在邏輯上並沒有必然的聯系，他說，假使中共把經濟搞上去了，中共就更會有理由對人民說只有他們（中共）才是中國的唯一救星，那麼，什麼「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運動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天經地義的了。胡平也同時提醒大

家，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去年的反自由化，都不是在中共經濟搞得最糟的時期發生的，而是在中共經濟搞得不錯的時候發生的。

演講中間和演講後，大家提出了許多問題，許多同學圍着胡平，氣氛是熱烈的。之後，很多人又到他們的宿舍和胡平談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胡平又在國際學生中心和許多關心中國命運的同學一直談到下午，到了胡平不得不出發要去密執安大學了，才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

密大的會場是在商學院，在走向會場的林蔭路上，一位同學問胡平：「你是去聽胡平演講的嗎？」當他發現他問的就是胡平的時候，就一見如故地和胡平談了起來。一位胡平在國內的老同學老遠見到胡平就大喊：「胡主席，好久不見了。」情緒馬上就變得熱烈起來了。胡平帶的一箱「中春」雜誌旁圍了一大幫炎黃子孫，不到五分鐘，箱子就空了。會場不大，但座無虛席，有幾個來得稍晚的同學只好坐在地上。在近兩小時的演講中，大家不時被胡平的風趣的比喻所感染，會場中不時爆發出大笑和掌聲，與會者不時向胡平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胡平以他慣有的從容和幽默回答了這些問題。

胡平在演講中強調指出，在中國實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先決條件。在公民基本權利沒有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單方面施行經濟改革的中共國策，已經陷入無法前進，也無法後退的兩難境地。胡平重申了真正的民主不該是由當政者給予。他舉了鄧小平在香港問題上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為例，他說，讓你五十年不變，這個「讓」字本身就說明了他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人們往往在共產黨說讓的時候被蒙蔽，可很少去想假如共產黨不讓的情況

下人們對共產黨有什麼辦法。

演講後，留學生們又提了許多問題，問題是尖銳的，也是嚴肅的，讓人們想起兩年前王炳章和朱嘉明的辯論，其中包括民聯對西藏問題的態度。胡平說，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人權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兩者不可混淆。提問繼續到晚上十一時，然後還是有許多熱心人留了下來，和胡平一直討論到深夜。

第二天，胡平又走訪了許多同學，和他們坦率地交換了許多對中國的民主和改革的看法，胡平認為在中國施行民主政治的前景是樂觀的，他認為任何一種政權，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而中國的民運分子應該看到，中共現在已經無法完全控制輿論和信息。所以，爭取到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並不是不可能的，只要獨立於官方的民間輿論刊物一旦在大陸合法出現，就是中共的阿基里斯的腳踵被射中的時候。在走訪中，有的同學說，如果他將來無論留下或回去，他都會以各種方式幫助民聯。有的同學說，如果胡平能指出如何去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我們就馬上加入民聯的行列。有的同學坦率地對民聯和中春雜誌提出了相反的看法。爭論是激烈的，可謂唇槍舌劍，但態度却是誠摯的，可謂推心置腹。

有一位同學和胡平共同討論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即，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是否可能？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關係到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關鍵問題。胡平說他會就此問題寫過一篇長文（尚未發表），他希望那位同學把他的想法寫出來。胡平對這幾位非學文科科學經濟的同學對政治經濟問題的深刻思考非常贊賞。這場討論進行得十分深入。可惜當場沒有錄音，否則將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 出國歸國 魂繫蘋果

摘自《青年導報》

中爲他們送別，合影留念；市外辦主任更跟隨到北京送行。

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他們滿懷激情，登上了飛往日本的客機。日本人的生活節奏是相當緊張的，到達北上市的第二日，他們便被送往離市區三十多公里的各個農戶，和農戶一起每天要在園藝場幹近十個小時的農活，北上市政府爲中國研修生在日學習給予了大力支持，先後讓他們到日本最大的蘋果基地、產量占全國百分之六十的青森縣，日本最大的蘋果加工基地二戶市和最大的蘋果市場東京都宮市進行考察，還派專車接送他們到蘋果栽培技術指導站聽講座，觀看現場指導。身在異國，他們沒有辜負祖國的重托，以驚人的刻苦精神邊勞動邊學習，從品種培育到疏花疏果、病蟲防治、果園管理，基本上掌握了日本蘋果栽培的全面技術。不過，他們也有難言的苦衷，除了在園藝場勞動外，農戶還要他們到菜園、畜牧場幹雜活，每天工作時間遠遠超過十個小時。漸漸地，原來每周一次的技術講座也不再安排他們去聽了，經向農戶請求征得同意後才得以騎自行車往返二十多公里去聽課。每天像僱工一樣無償爲農戶幹活，農戶僅負擔食宿，而北上市政府每月支付的零花錢只占日本普通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十。他們莫名其妙却無處訴說，再苦再累也得學好技術回國。他們擠用勞動間隙，每人翻譯了一本書。

## 五個幸運者入選

他們是幸運的。百裡挑一，楊增樓、郭民生、黨金勝、郭丁娃、趙書華從當地林業技術人員中脫穎而出，被挑選成爲三門峽市第一批派遣出國深造的研修生，到日本北上市通過實際生產勞動，學習蘋果栽培技術。市長在百忙

## 男兒有淚不輕彈

在一次渴望已久的聚會之後，他們聯名給三門峽市政府和外辦去信，希望通過自己的政府補充協議，改善在日的學習、勞動狀況。遠在異邦天天盼，誰知，「寄意寒星荃不察」，三封信都杳無回音。

暮回首，一年學習期滿。家書未到歸期到，他們恨不得把日本的先進技術全部帶回故鄉，衣服裡不約而同地藏着許多蘋果品種。回國，他們夢想着三門峽的新優蘋果從他們手裡生根、開花、結果，滿山遍野，譽滿全球，早把一肚子的委屈忘得干干淨淨，也沒問及那三封石沉大海的信，就將在日本學習期間的零花錢按規定如數上繳市政府。他們在原定的集中時間，都帶着各自的研修報告和回國後的規劃設想鄭重其事地來了，呈上報告後却不見有任何動靜，更不見有哪位領導來聽取他們的彙報。他們急着請示詢問，外辦負責同志竟「大惑不解」：「錢繳了就行了，還來幹什麼？」他們嘆息着。又回到了原單位？人浮於事，無所事事，按部就班地上班、喝茶、看報紙……可他們感到無法適應這種生活了！

## 一個認真的自殺

黨金勝太「認真」了！他從日本回來後就像變了一個人，整天郁郁寡歡，愁眉不展。鄉裡把他當成了寶貝，讓他搞技術講座，可他離開蘋果園就像魚兒離開了水。他不願也無法紙上談兵；他需要實驗基地，承包了幾畝蘋果園。無奈三門峽市升級以後需要基建，眼看着這幾畝蘋果園也在征收之列，他心碎了，到哪兒去搞實驗呢？夜深人靜，他拿出在日期間的信件、日記、書籍和翻譯的手稿，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回憶着，想着，又一張一張地撕下來點燃——整整燒了半個月。妻子覺得蹊蹺，推門進來。他對妻笑笑：「沒用，真的，沒用才燒的。」妻子不放心，整天提心吊膽，小心地把家裡菜刀、農藥都藏起來。誰能想到，他竟真的好端端地自殺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四日凌晨，他把自己吊死在心愛的蘋果樹上！鄉政

府領導聞訊起來，向死者家屬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惋惜。他們說鄉政府已準備為他建立一個實際水平的蘋果實驗基地。然而他死了……

#### 四個活着的嘆息

楊增樓——縣園藝局副局長，赴日研修生領隊沉痛地嘆息：「對我來說，去日本學習，技術並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工作效率，能認識這一點是最大的收穫。只有認識了現實，才能有足夠的精神準備，下決心去改變它！這很難很難。我在局裡是抓業務的，可舊的觀念、體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人際關係，時時刻刻都會碰到阻力。如果有實驗基地多好啊，馬上就可見成效！」——「黨金勝死前一個多星期，曾對我說，『在日本雖然艱苦，可想到能學到技術，心裡很踏實。沒想到一回來，啥也弄不成！』」

郭民生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南京林學院，去日本研修歸來後更不甘心在庸碌的環境中把自己廢掉，極想建立一個蘋果基地。他找到有關領導，領導都連聲贊：「好」，可基地、資金、人員，全都沒有着落。局裡給他指定了一個距市區二十多公里的峪里村蘋果園作為蹲點果園，他也無權實施自己的管理辦法。他曾多次打電話請求拜見市長，可得到的回答全是「不在」。他有點絕望了，對自己苦苦翻譯的長達幾十萬字的「矮化蘋果技術」也失去了拿出去發表的興趣。

郭丁娃，歸國前拒絕日本農戶主人的高薪聘請，回國後從鄉裡調到了縣局，可調到局裡後什麼事也幹不成，還不如在鄉裡能更多接觸蘋果園。縣林業局有位領導在郭去日本前夕曾巧妙地告訴他：「我最愛照像，很想有架日本

產照像機。」現在歸國了，調局了，局領導交代的「特別任務」沒完成，上下級關係越來越尷尬！他更痛心的是，在日本研修時特地寫信建議鄉裡千萬別毀掉那五十畝老蘋果園，只要管理技術得當，老果園將煥發生機，可偏偏在他歸國後不久，這個蘋果園就被毀掉了！

汝南林校畢業的趙書華因為人地兩生，被分配到了最艱苦的寺河山園藝場；老婆、孩子也跟着上山。他現在「榮升」副場長，每到蘋果成熟季節，小轎車、工具車絡繹不絕，白吃白拿的不計其數。從白吃白拿到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誰也得罪不得，且不說推廣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技術，這副場長就夠嗆的了。

#### 但願舊符換新桃

新的一年開始了，舊符換新桃。但願人們別忘了這五位研修生曾經有過的經歷。四個活着的沒有忘記已死去的黨金勝，他們已經商量好一道去看望死者的遺孀。悼念，不僅僅是對死者的憑吊；他們還有一樁心事：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上市代表團訪問三門峽市時贈送了二十一棵矮化蘋果樹，如果採用矮化蘋果栽培技術，三年後就該見果了；可苗圃工人按中國式的喬化大冠方法修剪和管理，這二十一棵蘋果樹至今還沒有一絲即將掛果的跡象。郭民生、郭丁娃一起去看過，想幫助動手改一改修剪和管理方法，可苗圃工人說外辦主任和林業局領導會多次強調：「這是中日友好的象徵，要絕對保密，非指定人員誰也不能動！」

唉，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改革開放搞活，學習先進管理技術！若不改變舊的意識，觀念、傳統和機制，只恐多少人才仍將在「絕對保密」中「誰也不能動」！



地點：深圳海關。

一個回國探親的大陸留學生站在深圳海關的大廳裡。他面前有兩股隊伍，一股隊很短，檢查得很快，效率很高；另一股隊很長，海關人員效率很低。他選擇了前一股隊伍，排在後面。

輪到這位留學生過關了。海關人員拿起他的護照一看，不耐煩地把手向另外一股隊伍那邊一指，道：

「站到那邊的隊伍中去。」

「為什麼？」

「因為你拿國內的護照。這條隊是台灣同胞的，他們優先。」

大陸留學生憤憤地離開了台灣同胞的隊伍。突然，他轉過身大聲喊道：

「台灣同胞們，你們千萬別讓共產黨把台灣統一了。一旦你們成了共產黨的屬民，看！

他把手向身後那條又長又慢的隊伍一指：「這就是你們的下場！」

# 老馬領事與小劉領事

司馬徹

(美國)

從大陸來美國才幾天，不是從中國之春，而是從許多留學生朋友的口中，聽說了著名的「馬領事」其人其事。朋友們，在對馬領事嘲諷鄙夷之際，深藏於心的是一份氣憤，一種哀怨：「光榮、正確、偉大」的中共政府，怎麼竟派馬領事這種自身教育尚不過關的人來美國做留學生的工作呢？！

當時我心裡也相當氣悶。但立即又聽說，馬領事已經不做領事了，而改當留學生，到俄亥俄州立大學去攻讀英語了。於是我心裡又輕鬆起來，默默祝願新來的領事比老馬領事好一點。

一月八號在俄亥俄大學，果然聽說紐約領事館有一位新領事要來俄大看望同學們，傳達國內信息，并放十三大錄像。雖然我自己剛從國內出來沒幾天，但出於對新領事的某種期待，仍然和幾位朋友去參加了會見。

通知說會見七點開始，整整等了一個小時，新領事才出現在大家面前。先是不知誰放的話來，說他自己一人開車來俄大，也許路遠雪大不好走。不料領事一登場就向大家連連抱歉道：「在學生會同學那兒吃飯，聊天，不覺就誤了時間。對不起，對不起！」

新領事姓劉，與馬領事果然不一樣，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長得好英俊，聲音也嘹

亮，並且會說英語。領事面對大家，說：「我是來和大家見面，交個朋友，讓大家可以：：：：：，KNOW MY FACE。」

大家對領事的現代氣質和幽默感發出一陣友好的微笑。領事接着說：我今天來，花兩分鐘講一下國內情況，請大家看十三大錄像。現在先看錄像。說完連忙坐了下去，隱沒在人群中。

留學生們有點失望，大家最想聽的是有關國內的各種消息，尤其是與留學生有關的政策等等。一個同學在身邊幾個人的聳息下，站起來發問道：「可不可以請你說說國內留學生政策有什麼變化？」

領事一聽連忙站起來，說：「那好，我可以多講幾分鐘了。關於留學生政策，根據一〇七號文件，教委制定了一個對出國留學生的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即將運到，到時大家都會有的，至於具體條文，我也還不太清楚。」

不知是出於誤解還是故意迴避，領事沒有回答提問者想要瞭解的國內向國外派留學生的政策這個敏感問題。出人意外的是，劉領事講到這兒突然話鋒一轉，談起了楊巍問題。領事說：「至於楊巍嘛，大家都知道了。這次對他的判決，與其說是對他的懲罰，不如說是對他的教育。因為才判了他兩年嘛，從去年算起

，他到明年此時就可以出獄了嘛：：：：：所以，這是對他的教育：：：：：我們之所以逮捕楊巍，是為了表明，我們與中國之春的鬭爭，是一種政治鬭爭，不是一般問題，：：：：：。」

又有同學問關於限制延長留學年限的規定，劉領事說：「我們要求大家讀完原定學位回國服務一年（兩年？），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可以再出來深造：：：：。」劉領事說到這兒有點不自信，因為底下有人對這番話發出吱吱之聲，領事頓了頓，強調說：「這個問題，大家可以放心。我可以向大家保證，保證大家到時一定出得來，你們可以相信我（！）。」

大約就回答了這兩個問題，領事就匆匆宣布放錄像。放了錄像他好輕鬆些。但同學們眷念祖國的情緒湧在心頭，紛紛擁上前，圍住領事問這問那。

我因有事，沒有圍過去，但當天夜裡，又聽一位同學告訴我，說他當時擠上前問劉領事，國內是不是有政策限制向北美派留學生的數額？為什麼？領事聽了一楞，但立即否認說：「沒有，沒有此事，至少我沒有聽說過。」這位同學追問了一句，領事却反問道：「是誰告訴你的？」我那朋友看看話不投機，就擠出了人群。

這就是劉領事那天晚上給我留下的全部印象。這些時回味他說的那些話，越想越不是滋味。又想起老馬領事，比比小劉領事，反倒覺得老馬領事粗魯語言相比之下倒顯得略為可愛一點！

劉領事在無人發問的情況下，主動提起楊巍，當時他顯得相當緊張，生怕有人就這個問題發難。大概他也知道楊巍案是一個十足的醜聞，無法向留學生解釋。但當他說到對楊巍的審判時，語氣頓時變得柳暗花明，他輕鬆地說

：「只判了兩年……」好像在告訴大家楊巍是在國內旅遊度假過蜜月。這語氣與語調，與何東昌副主任訪美時說的「只開除了三個」的警句簡直是異曲同工。逮捕兩年，開除三個，在大陸官員們的心中，真是何其無所謂啊。人是一個可以隨便捉弄、隨便踐踏的物品。劉領事或何副主任們的潛台詞不外乎是：我們完全可以判得更長，開除得更多……從這種仁慈的口吻裡，我聽到殘忍；從這種「寬宏」的姿態中，我聽到嚴酷。處在那個沒有法治的社會裡，知識份子的命運，只能在「黨」的隨心所欲中，如漏船載酒，風雨顛簸，一輩子驚恐地看着政局的動盪，隨時處於被整肅的恐懼之中。

劉領事向大家保證回國後可以再出來。這種保證簡直有點戲弄小孩子的味道。我黨政策之多變，政府官僚機構之不守信，早已是聞名遐邇了。胡耀邦在英國向世界拍胸脯保證說不變不變，曾幾何時，連他自己也都成了變數，被他的老一輩們做了除法。區區劉領事，憑什麼可向留學生誇口「我可以保證」？劉領事的保證，至少在我個人心中引起的是對這個言而無信的政府的種種回憶和陣陣反感！

至於劉領事說沒有限制向北美派留學生一事，那更是撒謊。這個新文件，十三大前夕在北京就已秘密向各大學管留學生的校長作了傳達，也許制定政策者做賊心虛，竟嚴禁在十三大之前向下傳達。我本人親耳聽本單位主管外事事的副校長講過此事，十三大之後，這個新的文件就傳了下來（比六月份公佈的一〇七號文件更為苛刻），一下子斷了許多即將出國的自費生的出路，據說僅北京大學就有八十多個研究生失去出國學習的機會，為此北京大學生出現了一張大字報，怒斥國家教委那幫僵化派是「民族的罪人」。大字報一出來，就遭到專職

人員的撕毀。但這個新文件的陰謀，却在各校廣為流傳，在大家心中，投下更深的陰影。這麼一件有關國內外青年學者的重大事，管留學生的劉領事居然聲稱不知道！簡直像種瓜的說自己不知瓜情、打魚的說自己不懂魚汛，顯然，這又是在騙小孩子。應該知道而說自己不知道，相信中國官僚機構在用「內部文件」整人治人方面效率向來一流，絕不會腐敗到這種程度。知道了却說不知道，并還追問消息來源，就令人不得不對劉領事的人格與使命有所懷疑。

劉領事就這樣離開了俄亥俄大學，不知猴年馬月還能再見到他？但他那天晚上貌似瀟灑其實拙劣的表演，却會久久在熱愛祖國的留學生心中留下虛偽蒼白空洞的餘響、留下苦澀的嘲笑，使人們對政府僅有的一點希望又一次破滅，最後的僥倖又一喪失。繼承馬領事未竟事業的劉領事，非出本願地用事實證明，在那樣一個黨和政府下，不僅愚蠢如馬領事這樣的人可以爬上高位，在家整人，出國丟人；更可悲的是，年輕有為如劉領事這樣的我們同代人，也不得不在個人奮鬥的道路上，為三房一廳，為晉升處級局級而出賣靈魂，泯滅良知，誘騙無辜，在迫不得已的艱難使命中破綻百出地扮演一個連他自己也深為厭惡的角色。

（劉領事講話時，有朋友讓我起來向他發難，我婉拒了，我不願當面傷害他。因為我知道，在國內，一個青年人要爬上他這樣的位置，如果沒有過硬的老子岳父，他裝孫子得裝得何其久，拍馬屁拍得何其響！作為青年人，劉領事你怎麼可能不厭惡那個政權的所作所為和你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國內，你若想要「前途」要「事業」，你又能有什麼選擇？嗚呼！醜陋是我們這個政權！悲哀是我們這代青年！）



啓顏

毛澤東把劉少奇和周恩來召到他面前，給他們出了一個難題：

「你們有沒有辦法讓一隻貓把胡椒吃下去？」

劉少奇最擅長的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對付一隻貓當然不在話下。他說：「那太容易了，把它四肢捆住，把胡椒塞進嘴裡不就完了嗎？」

毛澤東聽後搖搖頭，轉向周恩來，問：「總理高見呢？」

周恩來是隻長於手腕的笑面虎，他的招術自然不會像劉少奇那麼野蠻，他說：「我會把這隻貓餓三天，然後將胡椒摻進白糖，誘它吃下去。」

毛澤東聽後仍不以為然，道：「你們二人，一個用強力，一個用欺騙，這是雕蟲小技，不足為謀。」

劉、周二人聽後，誠惶誠恐，忙問：「主席有何高見？」

毛冷笑一聲，道：「我會讓這隻貓心甘情願地把胡椒吃下去。首先要把它摻在懷裡，輕輕撫摸它的毛皮，讓它覺得舒服舒服，感恩不盡。實際上我把胡椒粉摻在手裡，在撫摸時，胡椒粉逐漸滲入毛皮。一段時間之後，胡椒辣味發作，這隻貓會覺得十分難受，它會用舌頭把身上所有的胡椒紙干淨。我既沒強迫它，也沒欺騙它：在吃胡椒的時候它是自覺自願的。」

劉、周二人聽後，敬佩不已，自認淺薄。從此對毛五體投地，忠心不二。

# 故園鴻書

「中國之春」編輯部：

你們好！

剛接國內同學的來信，心情很是沉重。今把信摘抄給貴刊，希望你們能刊登。國內不是專門有人研究你們的貴刊物嗎？不知他們看了有何感想？

L君：

來信收到了，這一段時間挺忙的，評講師有五條規定，其中一條本人夠不着，即要在省級刊物上發表過文章。只好請你幫忙弄篇東西來翻翻，能否發表就不知道，碰碰運氣吧！

……

你們出了國的人對國內人民生活有體會，我那美籍華人教師也一樣，她在學校一切都好，好吃好住好待遇這兒的人生活得「困苦不堪」，聽了心裡真不是滋味！現在當官的還是老樣。整風嗎？不說別人，我不了解。就說我們那位，他們團委裡要是有哪級的人來，或他們到別處去，都是互相請客吃飯，一頓四、五百元是少的，吃的是學生的助學金。這叫什麼事兒？我說你們一個個喝得大醉，學生知道不會有意見嗎？他們說都是這樣，不回請不好。不說他們，最上邊也是這樣吃，一開會就是吃，烏龜、甲魚，什麼最好的菜只管上，國庫券一個勁地扣，現在手上一疊國庫券，不知何時能回來錢，物價一飛漲，回來也不知能買什麼了？！

且不談這些不愉快的事。國家政治非本人

發發牢騷所能左右，還得靠風雲人物，這股歪風很危險。提高學校教師地位是喊喊口號，窮教師還是窮教師。為爭個講師、副教授的職稱，勾心鬪角沒意思，評了講師也沒有工人的錢多。本人相信：「堤內損失堤外補」這句話，可以搞些副業，這就是為什麼本人要學縫紉去賺錢。何時當教師的工資能保證本人的生活過得下去，本人再一心搞本職工作不遲。「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盼國家昌盛，當官為民做主，本人也理當報國，別無二心了。現在搞副業只是權宜之計。說句心裡話，眼看那些小攤販花錢大把大把地扔，真覺憋氣。我們學院後面住了個跛子，中學時打架被開除，進了廠又被解僱，無奈只好販賣布匹。現在可腰纏萬貫，蓋上了小洋樓，還洋洋得意要我給他張羅個美女做老婆。橫財來得太快，連他自己也轉不過彎來，現在是越發地富了。

我開始當他是朋友，因我們是中學同學。可後來有的事我都覺着這種經濟上的差別給做教師的丟面子。他出言要本人給他做秘書什麼的，真有意思。本人當初是中學青雲直上到大學當教師的，他呢？可現在……也許我的面子觀念太可笑！本來教師沒什麼了不起，可我就是轉不過彎來。這幫「小財主」給的工資是很高的，何況跑生意多去幾個地方我也喜歡，但我情願不幹，不為他們那樣的人幹！我氣的是，大學教師在他們眼裡根本是難民，他竟有勇氣跟本人開這樣的口。我雖窮，但情願去外邊兼課，甚至去舞廳賣唱。怎麼樣，這叫「人窮志不短」吧？！

以前我天真，太簡單，一切都想像得那麼美好，那麼玫瑰色。現在除了要為生活而奮鬥外，還加上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不愉快，才知人生道路的坎坷，可也只是一步一步走下去了

。你知道嗎，我的生活不像你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充滿簡單的樂趣和安全感，我一直在掩飾着什麼。可我願意這樣做，至少從虛榮心角度出發。小狗、小貓、小鳥、小花，這些樂趣都是為了排擠掉心中的不平衡。這些給周圍的人造成了一種錯覺，他們都覺得我是那麼地超然，超然的背後有可怕的需加掩飾的一面。這些不愉快不是我自己造成的，而是社會和他人強加的。所以我并不是不坦然，但坦然并不意味着就能長久這樣下去。……好了，相信人人都有了一本難念的經。一切都會過去，快樂總會到來，牛奶、麵包都會有的，相信嗎？

來信多談談你自己和太平洋彼岸發生的事，我想知道。

信到此為止，可我不知道怎樣給她回信。談這邊難免扯到一些政治方面的事。而這些是我雙親堅決禁止的，看看他們來信怎麼說吧：「你為何老不理解爸媽的心呢？假使你現在在我身邊，再講多些媽也不會說你的。紙寫筆載的東西就要慎重，萬一人家看了，會說什麼？國內的人最會做文章。我知道你是爸媽的好孩子，什麼事都不瞞我們，可這些政治上的事不要發表個人高見為妙。什麼事爸媽心裡都知道，都有數的。幾十年的生活經歷難道不比你看得多嗎？還是一句話，好好學習，努力奮鬥，將來能站得住腳將你弟妹都帶走，爸媽都老了，已沒有什麼想法了……」

我悲哀，我嘆息，窗下川流的車輛，街上紛紛的行人，我不知跟誰去講這些事？我并不喜歡美國，可我却不得不為留在這兒而努力。為什麼中國反留不住她的兒女呢？

祝你們成功！

李力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於美國

# 我所了解的讀者對「中春」的評價

石磊

我一來美國，就在報攤上買到一本「中國之春」，這以後我每期都看，也曾給「中春」寫過稿。由於我有很多機會接觸華人社會和留學生，所以能了解到各種對「中春」的看法，現整理如下，希望大家能就各種一面之詞，通過背景分析，作出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和判斷。

看法一：「中國之春」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是推進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政治，多元化領導的先驅力量，我們應該廣加宣傳，積極支持，擴大它在海內外的影響和力量。

持這種看法的人，大部分已是公開或秘密的中國民聯的盟員了。

看法二：「中國之春」是來自大陸的留學生辦的政治理論性雜誌，文章主要是討論中國前途的探索性學術論文，利用美國的自由環境暢所欲言，批評共產黨很尖銳，主要影響在大陸留學生中間。這份雜誌的觀點不錯，但不夠新，不夠活躍，所以有待提高。

持這種觀點的人，來美多年的華僑居多，他們經常讀到「中春」，但都以旁觀者的立場居之。

看法三：「中國之春」是大陸民主運動積極分子，通過各種途徑出國以後，在國外自由世界滙合起來的民運組織。民聯在大陸內部上、中、下各階層，有廣泛的聯係與秘密組織，通過揭露共產黨的機密與醜聞，暴露內幕消息，為其特長；配合理論文章，旨在激發民衆起

來對抗共產黨的專制與獨裁，認清共產黨的真相。所以，「中國之春」是一份很有份量的雜誌。民聯這個組織，共產黨是不敢輕視的。但「中國之春」應該着重把發行對象轉向大陸的知識界與工人中去，民聯應該多一些觸動共產黨神經的活動。

持這種看法的人很多，但也耽心「中國之春」與民聯在大陸內部活動，會遭到破壞與犧牲，更耽心會牽涉到許多無辜的知識分子與大學生。另外，要使秘密組織活動有效且靈活，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這一點「中春」似乎正有點自顧不暇。

看法四：「中國之春」及民聯，是大陸政治流亡分子在美國的反共組織，其宗旨是推翻共產黨。但要推翻共產黨，即使民聯同其他反共力量聯手，也難以達到目的。但「中春」與民聯的願望是值得僑胞同情與支持的，至少民聯的活動，「中國之春」的發行，正在給大陸受共產黨壓迫統治的同胞們，以一種精神力量，以一綫光明與希望。

持這種看法的人，多數還認為，如果大陸政治變化到了危機的程度，中國民聯以海外為基地，又在大陸內部有盤根錯節的聯係與組織的政治團體，會迅速龐大，其作用也不可忽視。

看法五：「中國之春」是大陸一批不得志的文人學士所搞的一本政治雜誌。他們一方面尖銳地批評共產黨，明確表示共產黨不可能領

導人民走向四個現代化，改革也必將失敗。但另一個方面，他們却對共產黨抱有幻想。這可以從「中春」上某些作者明白或流露出來的觀點上看出。他們認為假使共產黨能夠開明些、寬容些，聽取與採納他們關於民主、法治、人權、多元的意見與方案，共產黨就能夠改革成功。

持這種看法的有兩種人，一種認為他們所描繪的「中春」是切合實際的政治態度，這樣可以不造成混亂，又有助於共產黨逐步演化。另一種則認為他們所描繪的「中春」太幼稚，這無異於想訓化老虎改吃素。

看法六：「中國之春」是國民黨幕後操縱的反共組織，所以專門與共產黨搗亂，你怎麼做他都說你不對，都罵你，有時還造點謠來討好國民黨。其經費原來都由蔣經國親自批的，現在經國先生逝世了，李登輝先生不這麼繼續做了，所以「中春」發生了經濟困難。

持這種看法的人有一定的數量，但大多數講不出證據，回答：「聽別人這樣說的。」為多。而且有的人從來沒有看過「中春」，只是聽說過，但他們的確有興趣看一看。

看法七：我很喜歡看「中春」，可以知道許多在大陸無法知道的事情和觀點。但我不想卷入政治。既然到了美國，可以擺脫政治的糾纏了，又何必再鑽進政治的羅網呢？再說家眷都在大陸，誰知道共產黨哪天會報復我們呢？所以看看就是了，適可而止。



這些人都承認，他們早被大陸的政治運動搞怕了，也目睹了許多民主人士的悲惨結局，患上了無法醫治的政治恐懼症。希望在美國生活好點，給家人創造出國條件或改善生活，就很滿足了。

看法八：「中國之春」是一本牢騷雜誌，略帶一點政治性。但觀點不清，立場不穩。大多數人沒有膽量明確提出反對并推翻共產黨。我感興趣的是在有生之年，看到罪行累累，草菅人命的共產黨完蛋。

這些人，都是親屬慘遭殺害或親身受過嚴重迫害，死裡逃生的人士。

以上歸納了八種比較多的看法。為什麼各人的看法如此不同？這是一個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問題。大家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因素來思考。例如各人的經歷不同；對「中春」的了解程度不同；對「中春」的理解角度不同；個人的立場不同；也有可能某些人有自己的政治背景等等。

但我認為，「中國之春」本身，應該有責任將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與目標，明確地、具體地向廣大讀者解釋，這也是「中國之春」與中國民聯實現其宗旨的必不可少的步驟之一。同時，也可以防止和堵絕對「中國之春」與中國民聯別有用心之謠傳和抵毀。 ■

## 加拿大移民服務中心

1. 提供各種加拿大移民資料
2. 代辦加拿大移民手續
3. 幫助聯系加拿大聘用單位

- 有知識技能
- 有加籍親屬
- 有足夠資本

均可移居加國

本公司優待留學生，

收費僅為一般律師的一半

Tel: 718-476-3700 Mon-Fri 10a.m. - 6p.m.

通訊處： 84-02 Roosevelt #28 Elmhurst, N.Y. 11373

請來函來電詢問手續及費用

# 你們真傻！

## ——某位留學生的獨白

徐之

寒假閒來無事，翻翻沒花一個子兒白撿的「人民日報」吧。喲，大陸一幫大學生不在學校好好讀書，却跑到大街上去鬧事，要什麼「民主」、「自由」，真是一群蠢不可及的蠢驢！「民主」、「自由」這些玩意兒，值幾個錢？能當飯吃？能當衣穿？過去中國是老毛當家，日子越過越窮，確實不像話。幸虧他老人家過世得早，不然我還在農村「臉朝黃土背朝天」，哪能來美國吃洋麪包喝洋牛奶住洋樓坐洋車？不過，現在中國是「鄧青天」掌舵，比老毛可就好多了。雖然他也叫嚷「四個堅持」，其實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您瞧，農村的責任制不就是單幹嗎？這跟「社會主義」沾什麼邊？無論是馬克思、列寧，還是斯大林、毛澤東，哪位老祖宗的書裡也沒有「責任制」三個字。至於城市改革，那花樣兒可就多了。鄧小平一心想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我一百個擁護。有他老人家掌舵，我一千個放心！你們這些大學生要搞什麼「自由選舉人民代表」，那不是要奪共產黨的權嗎？不知道「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一種擺設，裝樣子而已，跟窗台上的花瓶、牆上貼的畫兒是一樣的，你們倒拿起棒槌認起真來了。共產黨是鄧小平掌權的命根子，他豈能容忍你們胡

鬧？當今世界上哪個共產黨國家不是一黨專政？就憑你們這幾個學生，手無寸鐵，居然要跟共產黨較量，未免自不量力！鄧小平調一點武裝警察，就可以收拾你們，何況他還有三、四百萬解放軍！造反也不挑個好時候！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們怎麼不識時務，硬拿鴨蛋往石頭上碰？拿敵人來說，雖不敢自稱「俊傑」，但頗識時務。文革初期，我年幼無知，也當了幾天紅衛兵，瞎折騰了一陣子。後來發覺風頭不對，趕緊收手，當上了逍遙派，一日三餐，悠哉遊哉，到文革後期，平安無事。那幫紅衛兵頭頭，坐監的坐監，下牢的下牢，沒一個有好下場！這就叫不識時務。六九年我下了鄉，大隊支書逢年過節，辦生日娶兒媳婦，哪次我都要提兩瓶酒送兩條高級煙。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頭？農村日子雖然不好過，但只要不得罪大隊支書，倒也不會吃大苦頭。七七年恢復高考，靠原來的老底子，做人變成了名牌大學的學員。一進大學，我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科技書。七八年的西單民主牆，八〇年的「自由競選」，都跟我沾不沾邊。您瞧，魏京生、王希哲鬧了一陣，有什麼好果子吃？至今還在監獄裡喝陰風。我們學校那幾個搞競選的，一個二個，畢業時全都「充軍」到邊遠

地區去了。您看他們是不是犯傻？八一年我考上了研究生，八四年得了碩士學位，跟着又出國，再過兩年，洋博士頭銜篤定，不比魏京生強一萬倍？俗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誠哉斯言！我才不會跟着王炳章他們去瞎鬧呢！人生一世，名利二字。說到底，只是一個字——「利」，因為有名必有利。拿到博士學位，再唸博士後。中國雖好，畢竟沒有美國富裕。只要在美國多待一年，至少淨掙三千美金。實在待不下去，回國去當副教授再升正教授，日子雖比不上高幹，那也比一般人強得多。

噢，還有個叫方勵之的，也在鼓動學生鬧事。你怎麼比那些大學生還愚蠢？又是教授，又是科大副校長，還是科學院學部委員，這不是相當於蘇聯的科學院院士了嗎？乖乖，這麼多頭銜，這麼高的地位，我這輩子做夢都不敢想！我要有您那種地位，一定大唱共產黨的頌歌，堅決擁護「四個堅持」，不混個人大副委員長才怪呢！您瞧人家錢學森，老毛在時拍老毛馬屁，文革中跟四人幫，文革後跟華國鋒跟老鄧，一點虧都不吃，反而步步高升。您再瞧瞧宋健，原先不就是個副研究員嗎？現在當上國家科委主任啦，比部長還高一級。你竟敢公開說「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這可犯了共產黨的大忌。儘管現在沒有幾個中國人（包括共產黨的黨員和幹部）相信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這些東西，但決不可講出來，更不能在公開場合講，因為共產黨起家的招牌就是馬克思主義。你否定馬克思主義，就是否定了共產黨本身。就等於挖了共產黨的祖墳，人家豈能饒過你？要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講一句類似的話就要殺頭。這次共產黨對你客氣，沒抓你去坐牢，算你運氣。你還鼓吹「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



，這哪能成？這種事，只能幹，不能說，要說也只能說「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中國人歷來講面子，反對崇洋媚外。比如胡適當年鼓吹「全盤西化」，不是被人家罵得狗血噴頭？共產黨引進西方人發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不叫「全盤西化」，而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當然，現在中國落後、貧窮，一點不學西方也不行。西方的科學技術要學，牛仔褲、迪斯科、時裝表演也可以學，唯獨不能學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果在中國搞自由選舉，老百姓早就對共產黨那幫狗屁不通、專門整人的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一選不就會叫他們下台嗎？我要是鄧小平，我也不幹

。老子辛辛苦苦打來的江山，豈能送給你？方勵之呀方勵之，你這套是行不通的。不光行不通，你自己也要倒霉。您瞧，副校長也撤了，黨籍也沒了，何苦來着？你爲什麼不汲取五七年反右的教訓？蘇聯有個薩哈羅夫，也是個科學院院士，也公開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結果被「流放」到高爾基城，一去就是一、二十年。我看，你跟他一樣，也是個大傻瓜！放着陽關大道不走，偏偏要過獨木橋。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你趕快作個檢查，認個錯，可能還有官做。檢查做得好，檢討得深刻，說不定共產黨還會給你更大的官做。方勵之先生，千萬不要繼續犯傻了！

說了別人這麼多，我還是考慮一下自己吧。目前可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先給「人民日報」寫封效忠信，再向大使館遞份入黨申請書，附上一份散布「民主、自由」言論的中國留學生名單，很可能撈張黨票。這事可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不然會得罪大多數留學生。哼，管它呢，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且慢，這事還得掂量掂量。黨票在這年頭的行情，比美元兌換率還跌得快。再說，萬一真有那麼一天，方勵之和那幫大學生鬧成了氣候，我可不能不留條後路。你看菲律賓賓馬科斯總統，雖然有那麼多軍隊，給阿基諾夫人一鬧，說垮就垮。我還是坐山觀虎鬪吧，高！

## ●留學生園地●

# 簡言鄧小平的寫傳觀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音

「我從未拒絕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些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大躍進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事，甚至是錯事，所以還是不寫的好。」

這是鄧小平在八六年九月二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邁克·華萊士採訪時講的一段話。（詳見八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此言不失爲鄧小平的肺腑之論。粗略讀來似乎是自謙之辭，用心品評又別具一番滋味。

傳記本是記錄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古今中外，傳記如林。真正好的傳記必定是敘事翔實，立場客觀，持論公允的。有道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既然傳記要如實地再現某人一生的經歷，就難免會接觸到他失敗、錯誤、消沉、痛苦的東西。無論他是多麼了不起的偉人、名人、大人物，都絕不能滿身光彩得沒有一點黑斑，因爲他畢竟是人。

傳記不是「評功擺好」的鑑定書、虛報成績的流水賬，更不是樹立「高、大、全」人物的「样板戲」一樣的東西。爲什麼自己一生中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就不願寫進傳記裏去呢？可見鄧小平的寫傳觀是帶有很大

的局限性的。這局限性就在於只能寫「過五關斬六將」，而不能寫「走麥城」，只可樹立一個會抓老鼠的「好貓」形象，而不可揭牠曾經偷吃魚的事情。

鄧小平的寫傳觀，在中共領導階層是具有普遍性的。這就是爲何長期以來中國寫不出中共當政的領袖人物傳記的原因。然而，日本作家却寫出了「毛澤東傳」、「鄧小平傳」、「周恩來傳」等等中共許多領袖們的傳記，擺在書店中出售。中國的領導人要外國人爲其寫傳，而本國的作者却懼怕執筆，這諷刺意味是深長的。

對於人的評價問題，特別是對於大人物的評價問題，其實不在於他是否有傳記。千秋功過，誰予評說？當然是人民大眾。十億人民的頭腦早已準確而客觀地記錄下一切他們認爲應當記錄的人和事，這是永遠不能泯滅的最公正的歷史與傳記。終有一天它會公諸於世，接受真理的裁決。

# 贖買中共的一招

申一帆

今年七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評議會卅四名委員提出了「海峽兩岸共同成立『國家實業計劃推行委員會』」的建議，而且願以百億美元以低利貸給大陸，條件是「中共放棄武力犯台，以中國文化替代『四個堅持』」。（可簡稱爲「兩個放棄」換百億）。

歷史是無獨有偶的。如果說三十多年前中共對資本家的和平贖買是悲劇的話，那麼今日國民黨對中共官僚資產階級（毛前主席教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和平贖買（百億主要換取放棄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是一場喜劇。

也真是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老話。命運作弄人，風水輪流轉。國共兩黨雙方在中國的戰略態勢，在民衆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於各自的口號（策略王牌）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來了個顛倒，而且老師和學生還「教學相長」，處境互相轉換。譬如今日國民黨的贖買辦法，是學之於共產黨，現回饋反哺給乃師，而且頗有點「青出於藍」了。

共產黨人可有點兒難爲情？近四十年來，以台海爲分野兩岸分治，基本上是屬於和平競賽。歷史是檢驗實踐成敗的唯一標準。現在海內外（大陸開放，十億老百姓便「思苦望甜」，一股勁走海外，不要命地往台灣飛）都已

明白：中國共產黨輸了，各國共產黨也已基本輸了。妙的是贏家還來「賠款」給輸家，要求不要動武（死的都是老百姓）。「不戰而得人錢者，上之上也」，按孫子兵法，本來是極有面子的事情。但在實質上，共產黨的面子是掃地以盡了。當然，如果赫赫武功能唾手而得，毛氏早已爲之，何用今日老鄧爲「統一情結」發愁；所以，「放棄武力」本可默默接受。可惜，還有第二個放棄：「放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四項基本原則毫無道理，早已被大陸人民厭棄，中共幹部學者也已不信並多有非議，但其核心的一條「共產黨的領導」，却是放棄不得的。

從第二個放棄的條件來估測，國民黨人顯然是嘗到了和平競賽的甜頭。現在覺得隔海賽不過癮，還要登陸來賽，以博大陸老百姓的滿堂彩。他們滿懷了信心，要想在和平競選中再得個冠軍。與之相反，共產黨人全無志氣，充滿狐疑，更害怕老百姓把用腳投票（往外跑）變成正統的用手投票。這樣，中共黨官可能連亞軍也撈不上了，失去特權統治地位；不僅洋房司機特別護士要丟掉，說不定會「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將來大陸人民要求開「訴苦大會」，如何了得？放棄明載於法（這樣才能以刑求來保障位置）的「黨的領導」，萬萬不行！

賈寶玉的命繫於通靈寶玉，共產黨的命就繫於「四項基本原則」。國民黨中評會的提議，貌似委婉，無劍拔弩張（干脆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不提了！）叫人聽了合情合理；實際是釜底抽薪，要人老命，「何其毒也！」

來，丟掉「三不」，要「通」一下款。中共不接受吧，如何向海內外輿論交待？豈不供先前宣傳的虛偽？萬一引起連鎖反應，對改革開放大局，對香港「九七」安定，皆極爲不利。中共如接受吧，錢實在燙手。就眼前而言：大陸就可能誘發從政治經濟到社會關係的大雪崩（至於見馬克思時的老臉往哪兒放，已經顧不上了），對將來而言，很可能會丟掉執政黨的地位。奈何？

有人不以爲然，說：中共言而無信，劣跡昭著。今日盡管大膽答應放棄四原則，待百億美元上手，賴帳豈不了事？以此肯定中共會接受中評會提案，此言大謬。

鄧小平名言：「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頭頭說話可以不算數）。你不信首腦，但要相信群眾的偉力。中共一向「無法無天」，就是生怕「作法自斃」。需知，時代已不同，人民已覺悟。今日統治者一旦立法，就會作繭自縛。失了法統上的領導地位，就師出無名，「人民戰爭」便會以「麻雀戰」的形式鳴鼓而攻之，豈不從鄉村到城市的各級官僚都可能地位不保？況且幹群萬衆一心「向錢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來「挖社會主義牆腳」，大搞私有經濟，必定形成新的經濟基礎，產生新的政治承擔者。屆時休說搞共產覆辟，就是剝奪也會是水中撈月。欲賴帳，豈可得乎？

對國民黨來說，和平贖買中共的執政地位有百利而無一弊，其理由并非信賴中共的「黨德」、領袖人物的人格擔保，而是將勝利的希望植根於對中國社會大趨勢的認定上。至於該提案在宣傳上的好處外，將來能獲得的政治資源，更不在話下。所以已贏了一招。

共產黨是否肯「爲了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的繼承權」？人們將拭目以待。

# 發人深省的 幾件小事

大陸訪問學者 · 肖昆珠

北京城裡有個老字號——「協和醫院」——老北京對它都很熟悉。將近七十年前，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北京建立了這所科研、教學、臨床三結合的醫院，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傑出的醫學人材，也治療了成千上萬的病人。中共在大陸掌權以後，老毛為了顯示其功力非凡，一切都得除舊換新，協和醫院自然也不例外。首先是由共軍接管，改名「中國協和醫院」，在醫院實行軍事管制。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裡，紅衛兵小將砸爛了舊招牌，在鞭炮聲中換上了「反帝醫院」的牌子。一九七二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夕，中共怕「反帝」這個詞過於刺眼，遂改名為「首都醫院」。前年，老街坊們來信說，這家醫院的名字經過三十五、六年的幾經易名，又改回到原來的「協和醫院」。據醫院的醫生們私下透露，這次恢復老字號的原因，是爲了要重新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經濟支持。這不，外科張大夫去美國留學、放射科的CT機器、生化科的氣相色譜儀等等都是美國付的錢。這回協和醫院又抖起來啦！

其次，近年來中共派出大大小小的代表團，出國爭取資助。前不久，作者應一美國朋友之邀參加一個晚會。宴會上大陸某名牌大學（恕作者暫隱其名）的秘書長，向美國某基督教

基金會負責人申請資助，幫助該校設立一個三十多人的殘障人大學生班。當前，且不說大陸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健康高中畢業生都上不了大學，更不說大陸有大量殘障人衣食無着。該大學爲何靈機一動，要設立什麼殘障人大學生班呢？無非是巧立名目，爭取洋人同情，搞點外匯而已。至於洋錢到手之後，誰是真正的受惠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會後，與會某君問道：秘書長先生，中共早在五十年代初即有明文規定，中國基督教必須執行「自立、自傳、自養」的所謂「三自革新運動」，絕不允許貴國教會接受任何外國教會的資助。貴校要求我們美國基督教會捐款，豈非觸犯貴國政府規定。另外，即使我們教會同意捐款，貴國政府怎能違反自己的規定允許貴校使用這筆經費呢？秘書長先生臉色微紅，訥訥無言，把雙手一攤、雙肩一聳，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

最後，再看大陸境內，成立校友會、同鄉會蔚然成風。一時間燕京大學、輔仁大學、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金陵大學、黃埔軍官學校、中央大學等等同學會相繼成立，邀請信雪片似地飛向國外，邀請海外校友返校，有的並贈桂冠。其實這些大學絕大部份早在五十年代初都已合併、關閉了，它們的名字也早已在大陸上絕跡。然而，爲什麼在四十年後的今天，

中共又熱衷於成立這些同學會，並抬出某些頭面人物如劉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之流以廣招徠呢？猶憶當年，中共初掌大權，即詔令全國：所有同學會、同鄉會一律限期解散，不得有任何活動，否則以反革命組織論罪。難道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共領導人真的對鄉情、友情有了大徹大悟？非也，然則爲何。原來當年這些學校的畢業生，現在有不少身居海外，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經濟上有一定實力。中共認爲通過友情、鄉情拉攏海外人士可以名利雙收。其實不然。作者有一摯友，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現任美國某國家機關總工程師。當他得悉校友會復活，邀其返校共襄盛舉的消息後，朗聲大笑道：中共當年把我們掃地出門，沒收了我全部財產，如今又變着花樣到海外向我們討錢來了，這回任你中共說客花言巧語，說得天花亂墜，也休想我再上你的當了。

上述三樁小事從不同側面，如實地反映了大陸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共黨內到黨外，從軍隊、機關、學校、企業到個人，大家都向錢看。除了貪污、盜竊、走私、行賄之外。另一條途徑是以各種不同方式、方法向洋人、向華僑伸手要錢。只要錢能到手，還管它打的是什麼旗號？

近年以來，中共在大陸數次實物價改革，造成大陸物價飛漲，許多城市的肉、蛋、糖等生活必需品再次憑證定量供應。目前大陸上所出現的經濟困難，伸手向洋人要錢是解決不了的，要求大陸同胞「苦戰」也是過不了「關」的。這在中共建國以來已有無數的例證。當今之計，中共必須深刻反省，認清關鍵之所在，徹底改革，方能奏效。對此，海內外早有許多有識之士做過論述。

# 葉夫圖申科的反思

劉康

「我們得坦率地承認，有罪的不僅是當權者，而且包括了人民，讓當權者隨心所欲。容忍犯罪就是與犯罪同流合污。有史以來，我們慣於對罪人卑躬屈膝。而現在是停止把一切歸罪於官僚統治的時候了。倘若我們容忍罪惡，我們就罪有應得。……」

「在改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有一大批人在觀望。這批人無時無刻不在發牢騷，抱怨沒糖吃，缺這少那，但誰都不會伸出一個指頭來制止扼殺改革的企圖。人們該明白，物質上與政治上的改革絕不可分開。如果不起來捍衛民主，就無法伸手要民主。……」

「我們再也不能容忍我們的容忍了。……我們使我們自己蒙受恥辱。」

——葉甫圖申科  
一九八八年五月

我們聽過白髮蒼蒼的巴金作良心的遺責，反思他文革十年時期爲了保命，跟着屠夫們搖旗吶喊。我們聽過方勵之滔滔雄辯，激勵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站起來，喊出自己的聲音，特別勇敢地實行。我們熟悉劉賓雁親切感人，而不屈不撓的呼籲，呼籲人的勇氣，良心的覺醒。葉甫圖申科，蘇聯當代最著名的詩人，向他的人民呼籲，他的聲音與巴金，與方勵之，與劉賓雁何其相似。

葉甫根尼·葉甫圖申科今年五十四歲。三十多年前，他的青年人的熱血與勇氣，引吭放歌，抒發蘇聯人民在斯大林暴政統治下的憤怒與怨恨，謳歌俄羅斯民族頑強不屈地追求自由的精神。一九八八年五月，這位最受蘇聯人民尊重的詩人在蘇聯「文學報」上疾書（美國「時代」周刊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登載了英文譯文）。

葉甫圖申科進行「俄羅斯式」的反思。在沙皇、斯大林……新沙皇的殘暴統治下的俄羅斯民族，對其文化與道德意識，從來就未停止過深沉的反思。這傳統代表者，就是俄羅斯勇敢的作家、科學家和思想家。今天的薩哈羅夫、葉甫圖申科、索爾仁尼琴……都是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繼承人。他們的反思，從來是將自由、人權的要求，提到道德與哲學的高度。「罪與罰」的罪人與法官，都是良心與道德意義上的形象。葉甫圖申科告訴蘇聯人民：容忍罪惡，是使自己受到羞辱，是犯罪的同謀。人們抱怨糖不夠吃，挖空心思，鑽營一套寬敞的公寓，把兒女送到高水平的幼兒園，千方百計地套購廁紙、尿布……無休止地牢騷，牢騷，牢騷，同時，無限制地容忍，容忍，容忍。

葉甫圖申科告訴人們他反思的結論：容忍便是恥辱，容忍便是犯罪！  
我們中國人不比俄羅斯人更善於容忍嗎？更會發牢騷更會鑽營嗎？俄羅斯人也許沒有中

國人那麼實際，他們運氣也差一點，沒有那麼多（上萬名青年人）從鐵幕中走出來，從貧困裡脫身。可是我們這些更會容忍、更爲聰明、運氣頗佳的中國人，在忙於鑽營自己的安樂窩，埋頭「金元夢」的時候，有沒有葉甫圖申科的犯罪感呢？是不是覺得實際的、眼前的利益，比「自由」、「人權」抽象而且玄乎的東西更重要呢？

葉甫圖申科說：我們在街頭排隊，我們在後門裡做交易，我們爲吃、爲喝、爲多抓住眼前的幾個盧布奔忙，一舉一動，無不是在犯罪。因爲我們以牢騷、以容忍代替了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行動。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他還活着，一定要加上一句：我們喪失了道德良心，喪失了人性，因爲我們錯把盧布看得比自由更實在具體。

我有時常常在想：我們衝出了專制與貧困，而我們的心靈却往往還禁錮在專制與貧困裡。否則，如何解釋我們比俄羅斯人更無以復加的容忍和牢騷，觀望，而不願伸出一個指頭來制止那扼殺我們已得到的自由與富庶的企圖？

「反思」這幾年在中國十分時髦起來。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反思，都是在發霉的故紙堆裡，在玄而又玄，抽象了再抽象的古董裡，找尋心理的，哲思的，潛意識的，無意識的「積淀」。我們的反思家們，會不會像葉甫圖申科那樣，先反思一下他自己離開了書齋，走出了研究院，加入鑽營、屈膝、爾虞我詐，爭奪一張出國機票與爭奪升職加薪之時的犯罪行爲——即他爲了實利而非加入不可的牢騷與容忍？

也許這便是我們的思想裡「自由」、「人權」之類的字眼常常顯得模糊遙遠而抽象的原因之一？我們的反思家們，如何會承認這點真理：把對「積淀」之類的「反思」行動，當成

# 錢共國拿 事民主辦

阿修伯

毛始皇說：「八億人民不鬪行嗎？」阿修伯接觸過不少大陸來美人士，發現他們很多人確實是特別喜歡鬪爭，比港、台等地華人尤為厲害。就以「中國民聯」為例，前前後後加入退出的以及其他大陸來美的「民主人士」對「民聯」的揭發攻擊等故事已經有好多件。其中最大的題目就是王炳章的私生活，其次就是說「民聯」拿國民黨的錢。關於私生活部分不值一駁，現在我想專談一下拿國民黨津貼的事。

我們都是食人間烟火的血肉之軀，要生活要做事要推行一個理想或者運動，沒有相當的資金是不行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也。「中國民聯」的人雙手空空來到美國憑的是什麼能造成一種聲勢一股壓力，使得專制獨裁兇狠狡猾的中共為之皺眉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呢？「民聯

」的人矢口否認拿國民黨的錢，按照中國人的「泛貞潔主義」來說，如果拿了國民黨的錢那就等於是「失身」於國民黨，以後講的做的再有道理也沒有人會響應他們同情他們了。不過，阿修伯却另有看法，今日的國共兩個政權都沒有達到民主的標準，為了中華民族的民主前途，海外華人未嘗不可以利用國共的矛盾對立分別加以壓力促進雙方的民主。說得更明白一些，如果國民黨肯出錢支助大陸民主人士，促進大陸民主，共產黨肯出錢支助台灣民主人士，促進台灣民主，大陸和台灣的民主人士都不應拒絕，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對中華民族大有益的事，應該理直氣壯受之無愧才對。

由於中共的官僚腐化造成一場黑龍江森林大火，其損失可以成立多少個「台灣民主支援會」？由於台灣電力公司購煤不當，每年損失十億元（見「時報周刊」六六期），可以成立多少個「大陸民主促進會」？拿國共的錢（其實是中國人民的錢）辦促進中國民主的事，一點也不損害「貞潔」，是很值得鼓勵的。

以前阿修伯批判台獨，台獨人士在道理上無法辯駁，於是大造謠言進行人身攻擊，一會兒說阿修伯拿國民黨的錢，一會兒說阿修伯拿共產黨的錢。阿修伯如果真有那個本領向國共兩邊拿錢，我會覺得很光榮很得意，絕不會否認。可惜阿修伯本領太差，今天成百上千甚至上萬的海外華人接受國共招待津貼都沒有我的份，還想向國共兩邊拿錢，做我的白日夢吧！其實阿修伯批判台獨人士，促進台獨人士反省、改良、開明、進步，對台獨的貢獻最大，應該拿拿台獨的錢才切合實際呢！雖然台獨人士否認他們是中國人，其言行却是典型的「中華文化」模式！

（接上頁）

了發牢騷，容忍現實的「手藝」。其結果，一是安然地將自己的工作與爭取自由、人權、民主的鬪爭絕緣開來；二是給國人的腦筋裡再灌一點玄秘塔的迷魂藥，讓「自由」、「人權」的概念與現實生活越離越遠。

無怪乎，我們「反思」來「反思」去，難得「反思」到我們自己每時每刻的犯罪行為，不會想到我們每天都在讓我們自己蒙受耻辱。然而，我們畢竟有巴金，有方勵之，有劉賓雁，還有那不一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葉甫圖申科那樣深沉，但同樣有勇氣的楊巍。我們有這樣一批人，當我們站起來為民主，為自由而疾呼的時候，就會驕傲地說：為了不再讓我們自己蒙受耻辱，為了不再犯罪，伸出我們的指頭，伸出我們的雙手和雙臂，制止扼殺民主、自由與改革的企圖！這難道不是我們反思的目的嗎？

● 中央情報局關於中國的調查報告（上接六十頁）

口產品或技術上是先進的。精確地說，北京政府是怎樣作出這些決定的，無人知曉。對於「進口代用品」即允許對內銷的外銷產品收外匯，以及價格中百分之幾能按硬通幣回收下定義時，北京政府確有較大的隨意性。

再者，北京政府繼續對提供給外資企業的原材料以及合資企業產品內銷定價。隨着目前在中國出現的價格頻繁浮動，外國投資者常常感到難以對他們的投資者常常感到難以對他們的投資能否獲利及獲利多少加以預算。盡管法律規定合資企業可以僱用和解聘中國員工，實際上，中國人普遍認為在中外合資企業工作比較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缺乏安全感。因此許多外商發覺難以吸引真正有本事的人到合資企業就職。

# 不速之客的來訪

(法國) 張 諄

因為是「不速之客」，這樣的來訪，予人的印象也特別深刻。

在發表了《爲了忘却的回顧》一文的上篇後不久，我就接到一個年輕朋友的電話。他告訴我：大陸來的一位公費留學生，看了那篇《回顧》後，很想見我一面，有些東西希望得到交流。我也很願意和他見面，因為我老是以爲，中國民主化的前途，實際的擔子不是在我這樣居住國外、紙上談兵地要「變革祖國」的「二洋鬼子」身上，而是在一些將要回國工作的、好樣的中國留學生身上，這是一群值得尊重和交結的人。

一個巴黎的冬日，不溫暖的星期天，這位姓曲的留學生來到了。請進，讓座，互相又通報了姓名和學歷，於是，他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我讀了你那篇回憶中國監獄犯人、死囚生活的文章，很有感觸，我這次來，想和你談三點。」

我本來想去廚房準備飯，邊吃邊談，看他這樣地迫切，於是就找張竹椅坐下了。



「第一，我覺得妳寫得挺好，我很贊成妳表現出的那種人道主義精神。」

這是客氣話，我聽了頗不自在，似笑非笑地在椅子上動了動，來個不吱聲，做掩飾，總比說幾聲「不好，不好」，再用客氣話去回敬他那些俗套爲好！

「第二，我建議妳把它改變成話劇或電影劇本，加強它的影響力，讓外面的人也知道一些監獄裏犯人的真實生活。另外，也可以把它們送給國際大赦組織。」

我聽了心中有幾分慚愧，我是學習劇本劇作出身的，可至今雜七雜八的寫了一點了，偏偏沒寫過一個劇本。

「好，我試一試。」我答應下來了，還順便提到與國際大赦組織有些聯繫。

「第三，我也想和你談談我過去的一點經歷和我所知道的事情。」

「好，」我想我是很真誠的，因爲他，這個大個子，配着副學生氣十足的白邊眼鏡的小伙子，是帶着一顆很樸素的心來到的，既不是爲了我，也不會是爲了他，這裏面沒有個人的

感情和利益，我知道他是爲了別人來的，或者說是爲了他心中那個正義的什麼標準而來。

他顯然是不會涉世的人，連做客也露出了一點羞赧，沙發本來是給人倚靠的，他却挺直着身體，規規矩矩的樣子，透出他淳厚天然氣質，給人一個可信可愛的好印象。

「我在國內讀大學的時候，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像這樣的事情，我希望也有機會發表出去讓大家知道。」他開始講了，我仔細地聽。

「有一次，我們大學的學生會收到了一封信，是從北方的一個監獄裏寄來的。我們都覺得奇怪，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犯人寫來的。在那封信的開頭，這個犯人就先承認自己因爲沒有好好學習，革命覺悟不高，所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爾後說他目前正在服刑「有期徒刑×年」，爲了幫助自己改造思想，提高覺悟，他請求我們這些大學生幫他一把，給他寄一些有用的學習資料，使他能積極地利用服刑期進行改造。」

我們當時覺得這個犯人很不錯，有上進心，是應該給予大力支持的。我爲此就從省下的生活費裏拿出錢，自費給他買了一些有關政治、哲學、文學和理工科方面的書籍，這對一個學生來說已是個很大的開銷，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是值得去做的。

書寄出後，很久沒有回音，我狠不放心，特別是我也給他寫過一封長信，鼓勵他學習，不知爲什麼就沒消息了。

有一天，學校領導突然把我找去，到了辦公室，出乎意料有兩個警察也在那裏。

你是××嗎？

我是。

你是不是給××監獄一個叫××的犯人寫過信？

是的。  
你可以回憶一下信的內容嗎？  
我大概地復述了一遍信的內容。  
你不說也可以，我們已經拿着你的信的原件，這只是爲了對證一下。另外，你還給××寄過什麼？  
書，我寄過書。  
爲什麼你要這麼做？

我回答了事情的經過和我的思想動機。  
你的動機是好的，可是你不能太輕信了。  
你知道××是個什麼人嗎？是個反革命分子，在監獄裏不服從改造，和看守人員爭吵，我們五、六個人也吵不過他一個，反動氣焰十分囂張。他在獄裏學好幾門外語，又研究什麼哲學、政治、科學知識，就是爲了今後再向無產階級專政反攻。你寄書給他，就是支持了他的反革命行動。  
我聽了，感到很不理解知識和反革命的關係。

你知道嗎？警察又告訴我：  
因爲他這一系列拒絕改造的反動行爲，我們已經給他由有期徒刑改判爲無期徒刑了，他也送到青海的勞改農場去了。  
這是你給他買的书，我們帶來了，還給你吧。

警察把我買的那一大包書，推到我的面前……  
他講到這兒，我和在座的別人就忍不住開罵了：

「什麼道理？」  
「中國就是愚民教育。」  
「讀書也是加刑的理由嗎？」  
「人在中國是不能有思想的，在監獄裏更不行，犯人都得變成傻瓜笨蛋。」

「可恨可恨。他媽的。」  
「中國監獄只管懲罰，不准教育。」  
曲姓的留學生朋友說：

「我真是不理解，我真是很難過我給他寄書的結果是這樣的，我覺得他是很不幸的，同時，我也覺得他們對犯人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的尊重。這真是非常荒誕和可悲的事情。我想，這種事情我是一定要說出去的。」  
他說出來了，我，做爲一個旁聽者，我也要說出去的。

這個話題，引起了大家好久地議論中國的法制、自由和人權等問題，直到來了幾個學術的姑娘，氣氛才慢慢有點兒改變。姑娘們談愛情、談人生、談藝術時，學物理學的姓曲的留學生，沉默地聽，偶而表示出自己對它們的一些陌生。

這算什麼，一個未來的科學家，不精通女性，不瞭解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不懂得畢加索，但他懂得愛人，他懂得這個世界上只有人是最重要的。那麼，駕着他科學的翅膀，同樣可以飛翔在美好的世界上。

他走了以後，我始終忘不掉他，在許多中國留學生中，心裡裝着別人，可以爲了別人憤怒、不安、奔走的人是不是很多呢？

這樣的不速之客，去年在北京時，我還遇見一個，他是位藝術家。

那天他來看我時，正在我準備返回法國之前，和曲同樣，他來不是爲我，也不是爲他。大熱大熱的七月天，他穿着一條美國兵式的「偽裝色」花短褲，頭上頂着個同樣花色的小布帽，呷着才開瓶的水鎮汽水端端正正地坐着，其外表的現代化，與他臉孔上祖傳下的天生樸訥的神態相映成趣，給人一個張冠李戴的感覺。

「老徐（徐文立）的獄中日記在外面發表之後，日子就更難過了。」  
他很嚴重地對我說，語氣的沉重，讓我不

得不斂起待客時嘴角必須的笑意。

「我前幾天見了他的太太，他太太老是哭，說自從文章登了後，她有一年見不到老徐了，又聽說把他關在小號裏，一個人熬，就耽心老徐的精神上承受不住，別把人鬧瘋了。」  
我聽了點點頭，根據經驗，這是不難理解和想像的。

「他的小女兒身體也不好，跛，最近又進了醫院動手術。徐大嫂整天愁，老的在獄裏，小的又有病，她一個人要操全家的心，又要用她一個人的工資養三口人，真夠苦的。」

他是個好心腸的男人。

「我也不能做什麼，最多是去看看她們娘兒倆，安慰幾句，在經濟上給她們點幫助，別的，也幫不上。」

說完淡然一笑，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

而除了唉聲嘆氣，我也想不出辦法來。

「我來是聽說你就要回法國了，那邊你能有認識的人，你能不能把老徐和他家的情況告訴別人，讓人們也替他呼籲呼籲，老這麼關着，人不關壞了才怪！特別是他女兒，孩子特別受刺激，人家都說她有個反革命爸爸在監獄裏，看不起她。孩子身體有毛病，又加上這些刺激，沒爸爸真是可憐呀！」

我知道，他不是搞政治的人，我見過他一面也只是在他的畫展上，那次是經人介紹，點頭握手而已，從未交談。這次找我，全因爲他好心好意地同情別人，有用無用地想個法子幫朋友一把，我是個無權無勢之人，他竟來抱我的「佛脚」了，可見他心焦之真。

「你放心，我出去後一定見人就說，我儘



量把這情況告訴一些民主和人權組織。」

明知自己做不了有效果的營救工作，但我覺得這麼回答痛快大方，要不說不過去。

他離開我家後，我就站在陽台上送他的背影，總覺得那背影比他來時有勁了，步伐也是輕快的，興許這就是那些自以為完成了點使命的人與旁人的不同吧。

素不相識，只從文章上找到對我的信任；或是一面之交，但希望我是可以囑托的對象，這實在是對我的看重了。

很慚愧我一點實際的忙也幫不了，我心裏想過請他們找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去，不待轉念，就知道這也是沒用的。因為這都是發生在最高法院眼皮底下的事，沒準兒是他們慫恿的呢？！

關於人的良知，曲和這位畫家，保留的比法官、警察先生多得多，能為正義和被壓迫的人不安，是起來反抗的序幕。

我希望有更多的「不速之客」四方奔走，不是為了我，不是為了他，而是為了別的人們。人的生存和尊嚴，是需要用人們滾熱的愛心，互相溫暖，互相扶持，互相拯救的。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巴黎

##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_\_\_\_\_

\_\_\_\_\_

\_\_\_\_\_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香港九龍三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訂費 (每年)  
寄達地區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	96 港元
學生訂戶：20美元	84 港元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啟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  
我們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  
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

本會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恩蜀(會長)(已獲得政治庇護)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Jackson Heights 朱永祥(理事)(已獲得政治庇護)  
New York 11372 TEL:(718)898-9700 劉翔(理事)(正申請政治庇護)



(紀實小說)

# × 磐

——「北京人」系列速寫之三

張潤

前兩位「北京人」都是滿嘴粗話俚語，把打架鬪毆當成家常便飯的男子漢，這一篇則說的是一位駭世驚俗的奇女子。

您不妨想像這樣一個場面——

……一九六八年初春時節，正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走向全面勝利」（報紙上天天這樣宣傳）的歷史性關頭，在「全世界革命人民日夜向往的地方——北京天安門廣場」（報紙上天天這樣鼓吹），一個眉清目秀、面帶憂戚的小姑娘，被一伙衣帽不正的流氓纏上了，他們用胸脯和肘彎將這個小姑娘頂到自行團聚的圈子中央，肆無忌憚地動手動腳：

為首者是長着絡腮胡子的青年大漢，顯係為非作歹的慣家，他用藏在袖中的尖刀抵住小姑娘的胸口：「小妞，識相點兒，跟咱爺們兒一塊堆兒蹦蹦，你敢不依給你破了盤兒(1)……」

小姑娘毫無懼色，伸手從那漢子胸前揪下毛主席像章（那是紅色恐怖年月，不戴毛主席像章休想出門，連流氓地痞也不例外），狠狠地摔在地上，復又踏上一隻穿着方口布鞋的腳！

這伙流氓登時吓白了臉！小妞膽大包天，幹這個是要株連九族的！他們一哄而散，像逃避瘟神似地拔腳飛奔……

小姑娘平平靜靜地把毛主席像章踢進馬路旁的水溝，然後若無其事地走開了……

她就是×磐。其時，芳齡十四。

×磐出身於京城名門之家。其祖父×炳文，係中共建黨初期的黨員。其夫人、戰友，亦是中共資深幹部。×炳文當年與周恩來、朱德、李富春等同屬於中共旅歐支部。後於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中蔣介石下令處決。這些

舊事在各種版本的中共黨史資料、汗牛充棟的革命回憶錄裡均有記載。×炳文最光榮的事跡，當屬曾與朱德一起被德國當局短期拘留，嘗過洋監牢裡的囚糧——苦咖啡、黑面包。

×磐的父親×決原為朱德的機要秘書，後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炳文死後，×決及幼妹×維世作為故人之後，受到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百般照拂，猶如己出。

按照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是一個革命家庭，滿門忠烈。其中，有資格上得共產黨「凌烟閣」的高幹名士就有好幾位。舉×維世為例：她自幼生活於革命聖地延安，後來又被送到蘇聯深造導演專業，漢語俄語，兩皆出色。一九四九年終毛澤東借斯大林七十壽辰之機赴俄，兩位獨裁巨頭舉行面對面的討價還價，×維世即是隨行俄語譯員之一。

×維世貌美如花，多才多藝，曾將意大利十七世紀著名劇作家哥爾多尼的主要代表作「一僕二主」、「女店主」等介紹給中國觀眾，并親任導演。爾後，又不顧周恩來、鄧穎超的大力反對，毅然下嫁才華橫溢、穢聞遠播的大明星×山（此君曾在三十年代影片「夜半歌聲」中飾演美男子宋丹平）。她是文藝界屈指可數的「小老革命」之一。

×家人丁興旺，旁系血親及姻親甚多。其中包括許多社會名流。最著名者為哲學界泰斗×友蘭教授及其女兒、作家×宗璞。如果將×家近親遠戚的大名及成就一一載錄於此，至少要用去一兩萬字……

十二歲之前的×磐，不過是特權之樹上結出的一枚普普通通的果實。她就讀於香山慈幼院小學，同學們多半來自高級民主人士、大資本家等統戰對象家庭，×磐混在那些有錢無勢人家的孩子裡，倒也自得其樂。她幻想長大後

成爲著名學者或電影明星。

一場平地而起的文革風暴粉碎了×磐養尊處優的金色童年。

×決是首都重點高等院校負責人中最先死於非命的一位。×決之死有着複雜的政治因素及個人恩怨。文革結束後，×決追悼大會的悼詞中，把一切歸之於「林彪、四人幫的直接迫害」，未免過於籠統。

×維世在×決死後不久即被捕，不久亦死於獄中。當然，她被安上了一個「通外國」的政治罪名，而致其於死地的真實原因，却像人類本身一樣古老：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妒恨。

當年，×維世曾與林彪有過一段戀情，雙方均許下海誓山盟。後因戰爭等陰差陽錯的原因，成爲林彪夫人的是另一個女人——葉群。葉群雖是情場上的勝家，却因各方面不及×維世而耽憂這勝利來得不實因此心存芥蒂，而暗生妒恨。她視×維世爲不共戴天的仇人。文革初期，進入更年期的葉群與江青暗中勾結，弄死了三十年前的情敵，了結了這筆情場宿帳。

在莎士比亞那裡，有一些因情欲而鬧得天翻地覆的歷史劇目。我們中國之所以未出現這樣的劇目，並非缺乏同樣的素材，而是沒有莎士比亞。

「……我爸死後，我想我以後只能靠維世姑姑了。人家都說我們倆長得相像，維世姑姑特別喜歡我。可是她也死了。鄧穎超奶奶一提起維世姑姑的死，就老淚縱橫……」這是一九七一年暮夏時節×磐對我說的話。我們坐在米市大街的「冰室」（冷飲店的別稱）裡，望着對面「紅樓電影院」散場時的人流，促膝攀談

「以後，你打算怎麼混呢？」我用筷子夾起一個可可球，放在×磐面前的碟子裡。她的臉色透着虛青，顯然營養不良。

×磐黯然搖頭：「誰知道……我現在成了插隊的農民，混到社會最底層啦。想當初，我爸和維世姑姑星期天帶我出去玩兒，隨便一頓飯就花去一百多塊……」文革之前，物價低廉，一百多塊是個不小的數字。

是年，×磐尚不滿十七歲。雖然遭逢厄運，却依然出落得豐滿而勻稱，猶如一枝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然而，談話之間，她却像一位飽經憂患的百歲婦人，流露出無可奈何的幽怨和淡淡的哀愁……命運的鐵拳一次又一次地將這個荏弱女子擊倒在地，而她竟然掙扎着活了下來！

×決被關入校辦「牛棚」(2)後，十二歲的×磐成了一家之主。因爲×決夫人宣佈與丈夫劃清政治界限，躲開了。×磐挑起了重擔：一面給失去自由的父親送湯送飯，一面照顧兩個不滿十歲的幼弟的飲食起居。

她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兼天資聰穎，因而比同齡人早熟。這位小學五年級女生經常與人民大學本科生展開激烈辯論，她隨口引述毛澤東、列寧甚至馬克思的語錄，證明×決是革命幹部而非走資派……

大學生們往往被小學生駭得啞口無言。於是，人民大學校門口矗立起一張巨幅漫畫：歪鼻斜眼的×決頭戴耳機，守着一台發報機，手按電鍵；而×磐則手執紙筆，緊張地記錄着電報內容……

大學生們以此報復×磐……  
×磐用勺子攪着牛奶杯裡沒有化開的糖塊，傷感地道：「……後來戚本禹(3)來人民大學點了我爸爸的名，沒多久他就不清楚地死了

。戚本禹的級別還夠不上我爸級別的零頭，居然也算是中央首長？！呸！……還好，我總算看見戚本禹的下場了，也算解了心頭之恨。」

×決死後，×磐簡直沒法出門了，總是有年齡不等的「革命群眾」啐她、罵她、打她。×磐無處訴苦，只能委委曲曲地將這一切寫在日記本上。

不知怎地，這本日記簿落到了人民大學造反派手裡，成了「反革命變天帳」。×磐被扭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從此，×磐踏上了少年政治犯的痛苦生涯。小小年紀，就在各種各樣正式的、非正式的監獄中周轉，與三教九流的人物打交道。她好學深思，又具有一般女孩子所缺乏的膽氣，終於成爲北京城裡人人側目的一怪。

本文開篇時的那件事，僅是×磐生活中的小小插曲而已。

×磐的親友們仿佛有了默契似的躲得遠遠的，不肯伸出援手。她飢一頓、飽一頓地打發日子，以致於後來被人民大學家屬委員會帶到江西實行群眾專政一年，於她反倒成了一種福分。至少，每天按時開出三頓飯，雖然不足量，雖然很粗劣，畢竟有保障。

我說道：「×磐，你了不起，佩服佩服。不過你幹嘛不自殺呢？一死百了，多麼輕鬆！……」

×磐凄愉地微微一笑，這微笑使得她那白嫩的脸龐顯得柔美動人。「我死了，不能使這個世界清平一分毫。我爲什麼要去死呢？……」

我又問道：「那你幹嘛不去當流氓呢？收入好的很咧！……」

您聽着這番對話可笑又可氣是不是？——別忘了，當年我們還是孩子，又趕上亂七八糟

的年月，一切均不能以常理論之。

×磐果決地把手一揮：「不行！我現在除了這個清白的身子，什麼也沒有了。我寧死也不去當流氓……」

沉默了一會兒，她問我：「以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胸有成竹地說：「過幾個月招兵期就到了，隨便找個後門當兵去。我還想入黨，爬一爬……」

×磐傷感地笑說：「你行。我若想在政治上翻過身來，只有嫁人這條路……我媽媽是地主出身，嫁了我爸爸不也沒事了？」她從塑料夾中取出來一張中年女人的照片，那眉眼酷似×磐，是她的母親。「現在，她可沒好日子過了，×決的老婆嘛。」

×磐的語氣有些刻薄。不過，聯係到她的不幸遭遇，也是情有可原。

而後，×磐透露她和社會上的一些異端分子有來往，還談起了「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說是有人在遇羅克被處決一周年那天舉行了秘密紀念儀式，她也參加了。

我那時候滿腦袋官司，不悅地說：「×磐，咱們不管怎麼說也是革命後代、黨的女兒……別跟那些『狗鬼子』(4)來往，他們不是好人。」

×磐正色道：「你不懂。遇羅克代表着真理，他活在許多人心……」

我倦於爭論，不再言語。心裡並不服氣。於是轉了個話題，與×磐相約有時間去昌平農村看她。

七一年九月的一天，我來到明十三陵附近的一個小村子。在村口嬉鬧的幼童引我找到了一個小院子。在村口嬉鬧的幼童引我找到了一個小院子。在村口嬉鬧的幼童引我找到了一個小院子。在村口嬉鬧的幼童引我找到了一個小院子。

×磐是個聰明人，爲了躲避沉重的田間勞

動，就專門給社員們縫做衣服，以此糊口。

×磐對房東張寡婦宣佈我是她的表哥。顯然是懼怕那些專門針對女孩子的流言蜚語。

張寡婦抽吸着化膿的鼻子，說：「您這妹妹攤上我這戶人家，是她的好命……我那丫頭也沒爸爸，她們就算是姐倆啦。」

我以×磐兄長的身份謝了她。

×磐住的小廂房，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說法，就是「一間屋子半間炕。」不過，她把這個有限的空間裝點得像是小家碧玉的閨房：素色衣被整齊地疊列在炕角，牆上掛着布老頭、布老太和一把鴻運扇。窗台上，端立着夾在玻璃框裡的×決與周恩來、朱德、李富春等中央要員的合影。

×磐指着照片道：「這是鍾馗，能鎮妖避邪。多虧有了它們，大隊和公社的那些大鬼小鬼才不敢進門。」

那年月，社隊幹部是刀俎，女知識青年是魚肉。摧殘女知青的事件屢屢發生，早已算不得新聞。×磐掛出上方寶劍，嚇得當地那些色膽包天的土霸王不敢造次。

她還取出家庭照相簿來讓我欣賞。昔日的榮華富貴蕩然無存，只剩下這樣一點點實實在在的遺迹了。

×磐又拿出一本亡父的日記，告訴我這一段故事：「……有個人大中文系的男生，是『新人大公社』(5)的，想趁火打劫到我家偷點東西。值錢的東西都光了，他賭氣拿走這個日記本。看完我爸的日記他哭了，他說想不到世上還有這樣高風亮節的老革命，就悄悄把日記本還給我……」

(文革結束以後，×磐把這個故事寫了出來，發表在吉林省的一家月刊上。)接着，×磐却又對亡父有許多刻薄的批判

：「什麼高風亮節？我爸是個大傻瓜！文革前朱德要把他安排到外交部去當大使——他是個部長級幹部嘛——他不去，偏要去搞什麼高等教育……結果自己丟了命，害得子女跟着遭殃，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只比死人多一口氣，只多一口氣……」

那天中午，×磐招待我吃西餐。我們從村供銷社買來奶粉、咸魚、麵包。不一會兒，奶油豌豆湯、奶汁燻咸魚、烤麵包就端上了四方方的炕桌。還有不搭配的刀、叉、勺。

×磐下廚時，換了一條短裙，露出的雙膝上各套着一個運動護膝。九月天，秋老虎，這可有點不尋常。

×磐淡然地解釋：「我在市公安局拘留所裡睡水門汀，睡出了關節炎。」她退去護膝，在膝關節處按了一下，那裡隨即出現一個小坑，久久未能復原。

她在牢房裡吃了很多苦。同監有個七機部的女孩子(綽號「黑玫瑰」)因破壞軍婚在押，自認爲高過「反革命分子」一等，處處欺負她。

「不過，有些預審員水平不低，正經八百的政法學院本科畢業生，學過全套馬恩列斯毛。每次審我，我都故意挑起辯論，讓預審員運用正統觀點批評我……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有時候興致來了，我就進行反擊，搬出南斯拉夫德熱拉斯的「新階段」，支持自己的觀點。那些預審員根本不知道德熱拉斯是何許人也，只能干瞪眼……」×磐回味着鐵窗生涯，彷彿那是一次理論學習班、一個社會科學大講堂。

×磐的烹飪手藝好極了。我們吃得津津有味。×磐的記憶力好極了，她講了許多監獄內外的真人真事，令我眼界大開。

「共產黨的監獄真厲害，天下第一。」×磐眼神猝然變得幽暗，「我受的那些罪就不談了，說說別人——你知道有個陳里寧吧，一個鷄毛蒜皮的小職員，却吃了熊心豹膽。文革前，他用毛選為武器批判劉少奇，折(6)進去了。文革初期，這個寶貝被中央文革從監獄裡挖出來，到處做報告，罵劉少奇……沒兩天又把他送回去了，「二進宮」(7)。誰讓他不知天高地厚，把監獄看守逼他吃屎吃尿那些事抖出來呢。共產黨的刀把子還要不要了？……」

×磐追憶着鐵窗生涯，仿佛那是一次蛇湖之行、一次煉獄之旅。我看見她的胳膊上凸起一層鷄皮疙瘩。

她時喜時悲，情緒很不穩定。若干年後，我才懂得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抓進去，放出來，一抓一放之間，人往往被弄得身心俱傷。

×磐依然熱衷於地下政治活動。他透露和白洋淀地區的一個秘密學習小組掛着鉤。而這個小組成員清一色皆是北京的知識青年，學習目的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批判毛澤東思想」。

她盤腿坐在炕上(×磐的坐功極佳，顯然是監獄生活養成的習慣)，指手劃腳，滔滔而言，仿佛是在發表向整個世界挑戰的宣言書：「……我們認為打倒劉少奇不對頭。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老毛(她使用這一稱呼時帶點女性的親切與柔媚，就像是提及自己的大伯或者大叔)有一條政治路線，直接繼承了空想共產主義，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周總理是個實幹家，有了他，老毛的路綫才得以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制度下，官僚機構變修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劉少奇當權走向修正主義道路比較快，老毛當權變修變得慢一

些……而周總理則是隨風倒，文革前支持劉少奇，文革後支持老毛。他主要是致力於加強物質基礎，拉長走向修正主義道路的時間。我們這些人個個崇拜德熱拉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觀點放之社會主義陣營(如果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陣營的話)而皆準……」

×磐這番話使我有一種興奮，更有一種恐懼！原先，我只知道帝俄制度造就了被列寧稱之為「自由先驅」的貴族革命家，却未曾料想身邊還有×磐這樣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者！只是，政治這玩意兒太骯髒也太可怕了，除非爹死娘嫁人，誰敢挺而走險？！

我說：「×磐，我看你早晚還得進局子(8)，早早晚晚。」

×磐的端麗的臉上浮現出聖女貞德式的甘心受難的表情：「爲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願把這牢底坐穿……」

這是「革命烈士詩抄」裡面的著名詩句。文革前的「紅領巾」(9)幾乎人人皆會背誦。而今，×磐竟然擎着它走上了反叛之路。

幾天後，便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戲劇性地消失了。是年，我參軍了——雖然與局勢混亂的一九六七年一樣，全國征兵工作暫停一年，但「後門兵」不在此例。

不久，我聽說×磐也入伍了。消息說，×磐的未亡人再做新娘，嫁給××艦隊的一位副司令員。這位握有實權的繼父念及×磐小年紀在農村生存不易，便通過關係把她安插在某部隊醫院通訊班。爲避「走後門」之嫌，是陸軍而非海軍。爲了不受×決問題的牽連，還換了個威武的、男性化的名字。這套戲法，在當時挺時髦的。

如果換個平庸的女孩子，其生活軌道將是這樣的：以海軍將領的繼女自承，運用繼父的

關係(不用白不用!)入黨、提幹、上學……有好事情盡可能攬到自己身上。然後找個門當戶對的良機出嫁，坐享清福……

×磐畢竟是×磐，不同俗流。她婉言謝絕了支部書記的入黨邀請，依然和社會上持不同政見的異端分子交換書信。由於上面有人，×磐選被「推薦」到北京醫學院上學去了。可是入校沒幾天，亂子鬧起來了：新的通訊處未能及時通知那些危險的筆友，幾封沉甸甸的、超重的信件被部隊醫院的人錯當情書偷拆了，原來裡面全是攻擊「批林批孔」運動的不遜之詞……

這一下，×磐成了「混入工農兵學員隊伍中的階級敵人」。被校方開除了。文革中期幾次入獄的老底子也被端了出來，有關當局認爲足見其「一貫思想反動」。

×磐轉眼間淪爲兵不兵、民不民的社會閑散人員了。

這年冬天的一個傍晚，我在北京動物園外面的三十二路公共汽車總站與×磐不期而遇。她穿着軍便服，嘻嘻哈哈地訴說着自己的遭遇，全然不當作一回事。

「我看，你蠻可以把我的事情寫篇小說。」×磐隨便便地道。

我被她的樂觀情緒所感染，笑着說：「什麼時候寫？十年以後還是十五年以後？……」

×磐達觀地道：「也許十年，也許十五年……寫作的先決條件是：活着！」

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地活着靠着繼父的關係，×磐又調換了一所部隊醫院。這次是在山溝裡。據說，那位繼父費了好大周折才把×磐檔案裡的亂七八糟的材料清理出去。

×警避過了初一，却没有躲過十五。丙辰清明，她因軍務在身，未曾前往天安門廣場赴會，算是又逃過一劫。打倒四人幫後，×警利用返京探親的機會，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串連，油印了一批呼籲鄧小平東山再起的傳單：

一共五千份。薄薄的小單張。×警用兩個皮捲包將傳單裝起來，搭上行馳在東西長安街上的大路汽車，沿行車路綫撒了半天……

群衆瘋搶傳單，街面因之騷動……

×警在京期間倒也沒有遇上意外。回到山溝裡，她才被跟蹤而來的魔爪擒住了。深更半夜，×警被本院的一個男性指導員喚醒了。那人將她引到院長辦公室裡。這裡燈火通明，聚着幾個陌生的男性軍人。這些人表情輕鬆。

一個自稱李參謀的中年男人微笑着說：「×警同志，調令下來啦，上級決定調你去北京工作……回去帶上你的隨身用品，馬上就開車啦。」

這些人很客氣地把×警送上一輛越野吉普。車上有兩個大塊頭女軍人，一左一右將她夾在中間。

車行兩小時，駛入北京衛戍區大院。×警開始覺得情形不對頭。這不像是調動工作。北京衛戍區醫院是塊風水寶地，自中共中央新主席華國鋒數起，中央大員爭相把親屬安插進去。這裡早已人滿爲患。繼父沒有能力把自己塞進來。那麼……

有兩名身着官衣的女警察在此恭候×警。她是軍人。逮捕軍人較之逮捕老百姓要多一層手續。

經過簡單的問話，兩名女警察挾持着×警重新上車。這次是去宣武區右安門大街四十四

號——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入內，先撕去紅色的帽徽、領章，然後搜身。又發給她一床臭烘烘的被褥。看來，至少有四、五年沒拆沒洗，其髒無比。

×警冷冷地問：「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回答也是冷冷的：「你心裡明白。」

×警冷冷地笑了一下。她多次出入正式的、非正式的監獄，這種居心不良的套話，聽得多了。

×警被關入一幢太陽型小樓的單人牢房。她曾來過這裡，而今是舊地重游。所不同者，是四人幫已下台。她有一種輕鬆感。橫堅睡不着，便就着牢房裡的長明燈，面壁而坐。久而久之，竟然在斑駁的牆壁上漸而透視出野獸派的圖畫，大有莫奈、馬蒂斯之風……

清晨，看守送來牢飯：棒子面粥，咸菜疙瘩。監獄的伙食，十年來並無變化。只是隨着物價上漲，粥更稀，咸菜更粗。

上午八時，第一次提審。太師椅上坐着個胖大的預審員。還有一些不明身份的旁聽者，共十三人。

預審員提來一台在當時——一九七六年底——尚屬罕見的單喇叭錄音機（這顯示出當局對本案的重視程度），開始審問——

問：「（例行的驗明身份問話之後）×警，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無罪。」

問：「我們跟踪你長時間啦。再一說，你是我們這兒的老號（……黨的政策你很清楚，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撤過傳單，但並不構成犯罪行爲。」

問：「傳單有什麼內容？」

答：「三項要求。（一）爲天安門事件平反。

（二）建周恩來總理紀念堂。（三）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問：「（出示一份傳單）是不是這張傳單？」

答：「是。」

問：「哪兒來的傳單？」

答：「我自己刻的、自己印的、自己撒的……與任何人無關。」

（以下是有關印製傳單的技術性問題的爭執，從略。）

問：「爲什麼要撒反動傳單？」

答：「這不是反動傳單。（她談及天安門事件中大量可歌可泣的傳說）……」

問：「（冷酷地）「天安門事件是從不自覺發展爲自覺的反革命事件。這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親自定的案。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頭子，這也是毛主席生前定的案，誰也翻不了……」

答：「（舉例說明鄧小平整頓之功勞）……」

回答×警的則是一陣陣夾着許多挖苦話的冷笑。專政機關視鄧小平爲落水狗，極盡侮慢之能事。

×警被送回牢房。這地方像個冰窖，沒兩天她便患了重感冒，復又引起了胸膜炎。一個惡神模樣的老年女獄醫過來看了看，放下幾片藥，却與×警不合：土霉素她過敏，氣霉素她認爲不利於思考，拒服。最後還是打了一針才穩住病情。

後來又有幾次突擊審訊，均在夜間進行。預審員稱×警的行爲破壞了黨中央、華主席「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戰略部署。」

還引誘她交待此次行動的後台老板。

×警與專政機關打過多年交道，積累了豐

富的經驗。她知道新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襲用的無非是五十年代從蘇聯照搬來的那一套。她採用「自己不開口，神仙難下手」的辦法對付他們。

雙方僵持了一些日子。這期間天安門廣場上因周恩來總理一週年忌日惹出糾紛，又抓了許多人。打倒四人幫後，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陸續批准拘捕了八十七人。×警即是其中極少數女性之一。

利用放風的機會，×警與男監的一名政治犯互通信息。男政治犯用手勢問她為何入監，她就在空中比劃出一個「鄧」字，對方豎起大拇指。×警反問對方的案情，那位男犯用肥皂在紅皮書上寫了個「江」字……當然，這一切都是趁看守不備的空子斷斷續續地完成的。

又過了一些日子，預審員覺得從×警的身上實在榨不出什麼油水，很惱火；便把她轉入了多人牢房，準備長期關押下去。

這裡原有兩位難友，都是見過大世面的女人（市局拘留所通常不收容小角色，那是各區分局的事情）。一位是友誼商店的女服務員，因偷竊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的錢包入獄。另一位是文革初期北京財貿戰綫的造反派女司令，虔誠的毛澤東信徒，政治鬭爭的犧牲品。刑事犯管着政治犯——這是中國大陸監獄的老傳統。前女服務員是這間牢房的「號長」。她依然懷有強烈的職業優越感（搞外事工作嘛，接待有頭有臉的外賓嘛！）經常欺凌同室的兩名政治犯。

又過了幾個月，北京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那個胖大的預審員開始對鄧小平呼之以「同志」。×警利用這個機會質問對方：「你們憑什麼抓我？憲法規定保護公民人身不受侵犯！……」

胖預審員瘟頭瘟腦地道：「憲法那是憲法。我們要調查這個問題。不抓你，搞不清楚：當時的情況不同。當時你替鄧小平同志講話就得抓你，現在你替鄧小平同志講話就不會抓你——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嘛。」

沒兩天，×警被釋放了。結論：上當受騙，替反革命集團散發反動傳單。何謂「反革命集團」？有哪些成員？……市公安局根本不屑做出解釋。

×警堅決拒絕在結論書上簽字，結果被轟出了市局拘留所。

出獄後，許多年間未曾走動的上層人物把×警接到家中，好吃好住好款待，說是「故人之後，寸心難忘。」還透露中央準備於近期為×決、×維世召開追悼大會，平反冤案。

朱德遺孀康克清親切慈祥地向她透露風聲：出獄結論是劉傳新（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親自定的。市公安局在內參上刊出一篇「情況匯編」，內有「×警供認自己蓄意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的字句……

×警於是又去市公安局大鬧。沒有人接待她。最後，也只得不了了之。

這場監獄之災使×警失去了平生僅有的一次愛情。那小伙子細高個兒，白淨臉兒，模樣是沒挑了。年紀輕輕，已經是北京軍區大院裡的副營級幹部了。他和×警一見鍾情，兩人都動了真心……那小伙子頂着與父母斷絕關係的壓力投入熱戀，却頂不住黨組織的壓力，終於做了負心人。

×警痛苦欲絕。事後，她會流着淚說：「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我詛咒愛情！……」相交多年，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警落淚，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不久，×警參加了文革結束後第一次高考

，四百三十分。却因政治審查通不過，名落孫山。

翌年，×警的問題改寫了結論。她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生物系。節假日，×警常常住在北京大學燕南園哲學泰斗×友蘭教授家裡。我有时去找她，喝龍井茶，擺龍門陣。

西單民主牆消失以後，×警的政治熱情陡然降至冰點。她燙了頭髮，穿上講究的衣裙。學跳舞：探戈、搖擺、迪斯科；吃西餐：新僑、莫斯科、國際俱樂部……從此不談國事。

進入八十年代，北京城裡的各色人等借著「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東風施展身手，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警突然搖身一變，成為日本某大株式會社駐北京的常務代表，插手虎頭牌電池、梅林牌豆豉鱈魚、兔毛等等貨物的出口貿易……

北京城裡從此少了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多了一個精明過人的女商人。她在華僑大廈租下一間辦公室，名片滿天飛，花錢如流水……這時，她已經不是師範學院生物系學生的了。她退學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五十屆廣州出口商品交易会隆重開幕。北京城裡形形色色的商人、掮客們蜂涌南下，雲集羊城。商場如戰場，人衝鋒陷陣，勇不可當。

×警與我先後抵穗，分別住在東方賓館的新樓和舊樓。平時各人忙自己的那一堆「業務」，難得一聚。休會期間，我們相約在樓下新設的「春暉餐廳」見面。有勞也得有逸。

我們要了一整桌美味佳餚。我們都還記得十年前米市大街「冰室」的寒儉場面：兩杯牛奶加上三個可球，一坐就是半天……擺上這許多榮明顯地帶着祭奠昨日的意味。錦綉年華如同逝水，一去不回頭。

緊張、忙碌的生活以及連日來的宴會應酬，徹底摧倒了我們的胃口。我們只是說話，桌上的美食一動不動。

「……做完這宗兔毛生意，我就準備出國留學了。日本亞細亞大學。當然是自費。這幾年賺了幾個錢，等於是自己擔保自己……」×磐妮妮道來。她滿身綾羅，珠光寶氣，宛如香港的富家小姐。

我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說：「磐磐，說心裡話，這些年來我一直把你當作我的弟弟（！），你做生意固然有成績，只是太招搖了——你肯定被公安局盯上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找上門來……我總覺得你早晚還得進局子，早晚晚……」

（×磐臉上露出看破紅塵的深沉的微笑：「也許，我們×家的人與監獄有不解之緣……前幾天有個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導演來找我，說是要拿我們家的故事編個劇本，取名『三代囚徒』。爺爺、爸爸和我，分別蹲過德國監獄、國民黨監獄和共產黨監獄……」望着眼前這燈紅酒綠的奢侈景象，她的微笑變得又澀又冷。「爲了兔毛去坐牢，總比爲了鄧小平坐牢值得……」

我們久久不言。多少人生感慨，彼此心照不宣。

自廣州凱旋後不久，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北京城裡這些商人、捐客們被驚得雞飛狗跳牆！電視新聞播出了警察銜走幾個著名皮包公司經理的特別鏡頭，使得社會氛圍更加緊張……

×磐失踪了。她那間設在華僑大廈的辦公室也同時關閉。沒有誰知道她的下落，也沒有誰特別關注這件事情。人人自顧不暇。

像絕大多數突擊性的浪頭一樣，只消幾個

月，「緊急通知」便猶如廢紙一張，無人提起。落網者坐牢，溜網者逍遙自在。如此而已。

×磐在哪兒呢？

我找到×磐三弟×寧。他從一本日文文學雜誌上抬起視線，狡黠地微笑着：「你以爲磐還在國內嗎？……」

「怎麼，她去日本了？」

「不是日本，是香港。」

原來，×磐因套匯出了問題。未等警察敲門，她就一個筋斗翻到了深圳，從那裡冒用別人的「回鄉證」去了香港……×磐畢竟是×磐。

北京市公安局的負責人獲悉×磐非法出境的消息後，很大度地對×寧道：「算啦。×磐走就走吧。十幾年來她在我們這裡受了不少罪，也怪難爲她的，一個女孩子家。」

我和×磐從此失去聯繫。後來，斷斷續續地聽到關於她的一些消息：×磐在香港做生意很成功，引起了商場失意的「大陸崽」的嫉恨，向港英當局「人民入境事務管理處」揭發了她的非法入境的事實……×磐迫於無奈，匆匆下嫁一位印度尼西亞籍的華裔工程師，移居萬隆或者泗水（反正不是雅加達）。

傳聞說，×磐的丈夫曾經留學西德，但相貌歡佳。他們婚後有了一個女兒，偏偏又長得像乃父不像乃母；而且，×磐和婆婆的關係不甚融洽……總之，她在印尼生活得並不愉快。

我來到美國後，國內朋友們來信說×磐曾以外籍華人身份携女返京探親，十分風光……也算是衣錦還鄉。

幾天前，一封北京來信談及×磐的近況：「……磐磐兩年前離婚了。去年五月，又與一位比利時人結婚，很圓滿，苦盡甘來。現終日圍着丈夫、女兒轉。她丈夫在一家比利時公司

駐京辦事處做事。我難得找到她，她總是與丈夫外出助其做生意，要不就是回比利時過聖誕、去曼谷渡假等等……」

附注：

- (1) 盤：黑話。指面孔。
- (2) 牛棚：文革時期的民間拘留所。
- (3) 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組組員。
- (4) 狗鬼子：文革中對出身不好者的蔑稱。
- (5) 新人大公社：文革中人民大學的一派紅衛兵組織。
- (6) 折：黑話。指入監。
- (7) 二進宮：黑話。指第二次入獄。
- (8) 局子：黑話。指公安局。
- (9) 紅領巾：指少年先鋒隊隊員。
- (10) 老號：黑話。指多次入獄的犯人。
- (11) 號長：公安術語。指牢房中的犯人頭目。



- ▲中國人喜歡把錢存入銀行，但您知道存入保險儲蓄帳號的好處嗎？
- ▲在美國，人壽儲蓄保險是每個人生活的必須品。
- ▲美國人、日本人投保率很高；華人投保率却較低，乃不知其好處之故。
- ▲人壽儲蓄保險，或早或晚一定要辦。但晚辦不如早辦。

# 王炳章保險儲蓄服務

(中國之春創辦人) (擁有美國各大州營業執照)

## 專辦高盈利人壽保險儲蓄

目前利率7.5%—12%，高於銀行存款 也做個人和集體醫療保險

**原理** ● 投保人把錢定期存入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集中分散資本進行大規模長遠投資，獲得高額利潤，再回饋於投保人。

● 這是一項人們互相幫助，分散個人風險的社會計劃。

**公司** □ 您將投保的公司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

□ 大都會公司有一百多年歷史，分公司遍佈全球。僅美、加兩國計有四千四百萬人投保，總資產一仟多億，平均每分鐘付給投保人和受益人的現金達四萬多元。

□ 大都會公司不是私人擁有的賺錢公司，它是投保人共同擁有的集體所有制公司。每個投保人有投票權選舉董事會。公司盈餘將以紅利方式分給每個投保人。您投保(投資)越多，紅利就愈多。

□ 保險公司業務由聯邦和州政府立法保障。

**手續** ● 類似長期定期存款。先填寫申請，批准後，即可開辦保險儲蓄。

**好處** □ 開戶投保後，保值立即有效，全家福利即刻受到保障。

□ 急用款時，可隨時退保取出存款和利息(但要扣除行政消耗)，或是貸出存款(保險仍有效)。

□ 每年有紅利(紅利不付稅)。

□ 向銀行貸款時，人壽儲蓄保險可做為信譽和抵押財產。

□ 給兒女大學教育經費提供保障。

□ 補充退休金。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申請辦理人：姓名 \_\_\_\_\_

由王炳章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地址 \_\_\_\_\_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電話：718-639-0624 (24小時)

電話 \_\_\_\_\_



舉例 張先生，男性，卅一歲，不吸煙。開辦100,000美元人壽儲蓄保險帳號

項 目	解 釋
每月固定存入帳號：117 美元 (存金) (也可一年存一次)	●開戶後立即生效。投保人在今後以任何原因亡故(二年內不准自殺)，受益人可獲至少100,000美元現金(免稅)。 這是保險帳號的一大好處。
付清期限：六年	●如果中途每年取出紅利，則六年後仍要按月存入117美元，直至付清。 ●六年內不取紅利，其利滾利可付清今後一生的保金。
開戶二年後，如有急用，可隨時退保，取出存金、紅利和利息。但一般不必退保，急用款時，可貸出自己的存款，保險仍然有效。	
如果你一直存款下去，到65歲清算的話	●淨拿紅利加利息約達170,000美元 ●退保可取出現金約達210,000美元 ●如六十五歲亡故，受益人可領約466,300美元
八十歲時	各項已達天文數字

※男性保金較女性為高，年歲愈大，保金愈高。吸煙者適當加價。

※可開辦10,000—5,000,000元保險(或更高)。投保值愈大，每月應放存金就越多。

※紅利和利率像銀行一樣隨時浮動，但有最低保障值。

※在美國、加拿大投保，可在世界各地付款和提款。

## 當年棄醫從運為喚起千千萬萬受難同胞 今日兼職保險為解決中國之春財務困難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由王炳章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申請辦理人：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電話：718-639-0624 (24 小時)

最方便打電話時間

## 進入美國社會

# 至少應辦一個保險儲蓄

## 高盈利人壽保險儲蓄簡介

編者按：為緩解中國之春的財務困難，王炳章先生開始經營保險業。經過學習、考試和培訓，王炳章先生已拿到營業執照，正式開業。為什麼從事保險代理工作？他認為，保險代理工作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際關係。中國之春有廣泛的社會關係，給保險業的拓展提供了方便。此外，保險代理工作的時間安排比較靈活，王炳章先生仍可騰出相當多的時間參與民運活動。王炳章還指出，這幾年從大陸來美的新移民和留學生人數很多，但大家對保險業非常陌生，辦保險的人相對較少，因而吃了不少虧。入境隨俗，要打入美國社會，必須了解保險事業，把各種保險辦好。所以，王炳章先生認為，這項工作具有服務性質和知識普及性質。

這項工作能夠籌到錢嗎？能！只要熱心人士都支持王炳章的工作，沒有投保的，積極投保；已有人壽儲蓄保險的，可以再辦一個；每個人都主動為王炳章介紹客戶（包括團體客戶）。那麼，案例累積多了，王炳章先生的保險代理業就可以作大。

王炳章先生在營業之初，由於各方熱心人士的支持，成績不錯。他表示，除了自己家庭生活費用之外，他將把全部所得捐給民運事業。

辦個人壽儲蓄保險，對己有利，對民運事業有利。既然早辦晚辦，反正您都要辦，那麼，就請您早辦一下吧！既然您找誰辦都是辦，那麼，就請找王炳章先生辦，以實際行動支持他的義舉！

王炳章先生表示，他將以自己的書法小品回贈每位支持者，以感謝在民運經費困難的時刻大家雪中送炭的精神。

每個人都在抱怨汽車保險費用昂貴。每年您都要交一筆錢，汽車不出事，這筆錢就不歸你了。您每年都要交一筆錢保自己的房子，房子未出事，這筆錢也就收不回來了。您每年可能也交一筆醫療保險費，如果你未生病，這筆錢也就白交了。

但是，人壽儲蓄保險却不然，它使您有得無失。您存入所有的錢永遠屬於你，而且不斷以比銀行還要高的利率增值。辦一個人壽儲蓄保險，還相當於置了一份產業，而且是比房地產還要穩固的產業。

### 起源於人道主義

俗話講，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保險業所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不測和風險，不一定落在誰的頭上。早在十九世紀，瘟疫流行，暴亂疊起，一家之長一旦有難，全家立即陷入困境，生意也會垮台。這樣，反過來又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於是，有人想到，如果一家落難而他人群起捐助，社會問題就會大為減少。因此，平時每人都貢獻出一點錢，積在

一起，給那些發生不幸的家庭急用。這就是保險業的雛型，帶有人道主義的互助精神。

### 定期人壽保險

最早的人壽保險——定期保險，就是在「每人平時貢獻一點錢」的概念下產生的。辦法是：每月（或每年）交一點錢（如卅一歲男性，每月交九元，保十萬元）投保一年，一年以後再續。如果在一年內投保人發生不測，受益人則拿一大筆錢。如果一年內安然無恙，交的錢就取不回來了。第二年再保再交。

定期人壽保險仍然很有功用。比如，外出旅遊、野外作業和山區探險等，發生意外的基率較平時高得多，若無終身人壽儲蓄保險，則應在外出前辦一個定期人壽保險。

很多美國人仍喜歡這種傳統式的保險方式。他們每月固定撥出小量的存款給保險公司，就像每月付房租和電話單一樣。

中國人一般不喜歡定期人壽保險，因為在大多數正常情況下，這些錢都是白交的。

## 人壽儲蓄 ( 終身儲蓄 ) 保險

中國人最喜歡的是人壽儲蓄保險，又稱終身儲蓄保險。它和定期保險最大區別在於，一切存款都歸於投保人。如不發生意外，所存入的錢用於投資，以高利率增值。如萬一不測，受益人則領取巨額保金。

儲蓄保險的原理是：保險公司收到存金後，除小部份現金儲存，做為應急外，其餘立即投資於房地產，向外貸款或購買大公司股票等，以賺取高額利潤（如美國最大房地產公司——CENTURY 21就是大都會保險公司的子公司）。賺得的利潤用來支付投保人的紅利、利息和受益人領取的投保金。因此，人壽儲蓄保險既有保險的功能，又有銀行儲蓄的功能。

人壽儲蓄保險的長處及特點有：

●開戶投保後立即生效，直至終生。存第一筆錢後任何時候發生意外，受益人都可領取巨額保金。保金免稅。

●每年有紅利，紅利可以免稅。

●應急需現金時，可退保取出存款（扣除一些手續費）。但一般不需要退保，可以向保險公司低息（不超過2%）貸出存款。此時，保值仍然有效。

●不小心拖欠定額存款時，積累的紅利自動補足。積累的紅利用竭後三十一天內，保值仍有效。保值失效後，今後有錢時再補足拖欠款項，保值即刻恢復。

●退休時可領取一大筆累積的紅利。補充退休金

，並給子女提供教育經費。

當然，人壽儲蓄保險也有其不便之處，如投保的前兩年不准提款（相當於二年固定存款）。

## 影响存金 ( Premium ) 的因素

開辦保險帳戶，每月或每年固定存入的現金，叫存金 ( PREMIUM )。影響存金的因素有：

一、年齡。這是最大的影響因素。年齡越大，每年自然亡故率越高，存金也就越高。例如，投保十萬元，廿五歲男性每月只交存七十六元，而六十五歲男性每月要交五一三元。但年長者投保也有好處，因亡故時保金不交遺產稅。

二、性別。女性壽命（平均七十八歲）較男性（平均七十二歲）為長，故存金較小。

三、吸烟及投保時健康情況。吸烟者壽命短，存金高。疾病越多，所需存金越高，直至不夠格投保。

此外，職業、愛好等因素，對存金也有影響。

## 爲什麼早保爲好

投保越早越好。這不僅因爲存金需要小，更重要的是，投保後立刻就有了戶頭，以後萬一生了重病，保險公司也不能退保。但是，如果沒有戶頭而生了重病並失去投保資格，交再多的存金，保險公司都不會接保。因此，經濟條件不佳時，可以先保小值以開上戶頭，今後再加保。（王炳章供稿）

# 專辦高盈利人壽儲蓄保險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由王炳章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申請辦理人：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電話：718-639-0624 ( 24 小時 )

最方便打電話時間 \_\_\_\_\_

 Metropolitan Life  
AND AFFILIATED COMPANIES



SNOOPY: © 1958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ne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3690

*Schulz*

# 徵稿啓事

自胡平接任中國之春主編以來，我們收到很多來信，對我們的編輯方針提出很多寶貴的建議和希望，對此我們表示感謝。

最近一個階段中國之春的組稿方向將壓縮對歷史問題的批判和探討，而着重於中國大陸及海峽兩岸關係的現狀分析、前途預測及理論建樹。希望撰稿人圍繞以下幾個專題寫稿：

- 一、公有制私有化的理論問題和道路問題。
- 二、關於國內價格改革、通貨膨脹問題的現狀分析和出路預測。
- 三、關於開放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分析和前景預測。
- 四、對共產黨如何開放黨禁的建議和利弊分析。
- 五、關於海內外民主力量組黨的必要性和前途預測。
- 六、對國民黨十三全制訂的大陸政策的評價、分析。
- 七、對中國統一問題的建議及前途討論。
- 八、對鄧小平之後的中國的前途分析和預測。
- 九、對其它共產黨國家改革的現狀分析和預測。

另外，我們歡迎對中國之春的批評和建議，國內政治、經濟改革及民主運動的發展之動態消息，以及政治笑話。

投稿人身份不限，對於不願露名的作者我們將嚴格保密。但我們鼓勵作者用真名。對於用真名的作品我們優先登載，稿酬從優。（稿酬從\$25至\$30元）另外，對於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內用的稿件及來信，本刊將不再支付稿費。

##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香港》3-7710410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